# 炎黄春秋

YANHUANG CHUNQIU

抗战时期毛泽东的民主主张与实践

聂荣臻保护生物学家朱洗『过关』

江渭清抗命三保刘顺元

刘白羽徐光耀关于反右瓜葛的通信

党派我给宋庆龄当秘书

2001/6 总第111期

炎黄春秋杂志社出版

# 庆祝《炎黄春秋》创刊十周年

▲ 戴林 作

▲ 方成 作

◀ 石宾 作

# 炎黄春秋


春 秋 笔

2 抗战时期毛泽东的民主主张与实践……姜 平
10 聂荣臻保护生物学家朱洗"过关"……薛攀皋
14 江渭清抗命三保刘顺元……潘祝平
16"剿共英雄"卫立煌的人生巨变……郭广迪

陨 星 篇

22 在白色恐怖下为李大钊送葬……安 若
24 刘少奇与何葆珍烈士……张飞虹
27 不能遗忘的费巩……傅国涌

沉 思 录

28 劫后传书泯恩怨
——作家刘白羽与徐光耀通信……刘白羽 徐光耀

挚 友 情

30 回应李普《悼胡绳》的信……李慎之
33 一个晚辈学人眼中的胡绳……李向前

亲 历 记

35 留苏岁月……程斯煌
40 党派我给宋庆龄当秘书……李 云

人 海 浪

45 三个早期清华人……钱听涛
48 教育家张宗麟的坎坷一生……张 沪

遗 闻 录

55 1936 年的四川大饥荒……郑光路

群 言 堂

60 想到康生的作恶……李 庄

文 艺 苑

62"知北游"日记
——1949 年一些文化名流的心态和际遇……袁小伦
67 文怀沙与《红楼梦》研究……胡晓明

古 今 谈

69 漫说等级制、宗法制和家长制……李一蠡

古 镜 台

73 从清朝档案中看和珅……卢 经

九 州 景

78 昆明大理丽江行……孙维熙



顾　问:
费孝通　程思远　陈　沂
杜润生
特邀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光远　王俊义　王景山
冯　征　冯其庸　曲润海
李　庄　李　普　李　锐
李学勤　吴　象　宋木文
苏双碧　张　锲　张岂之
张国琦　郑　惠　欧远方
凌　云　曾彦修　廖盖隆
穆　青　戴　逸　魏久明



社　长(法定代表人):杜导正
副社长:
方　实　宋文茂(常务)
徐　孔　程理嘉
执行主编:
刘家驹　舒元璋　杨继绳
吴　思

理 事 长:杜导正
副理事长:陈　渊
理事单位:深圳市亚大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秘 书 长:徐　孔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K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
ISSN1003—1170
社址:北京雍和宫大街戏楼胡同 1 号
邮编:100007
电话:64072452 84020890
印刷:丰润县印刷有限公司
国内总发行: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订购处:全国各地邮局(所)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北京 399 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1274M
网络电子版全球总代理:
龙源网上书店
网址:www.dragonsource.com
gb.dragonsource.com
www.qikan.com
本刊电子信箱(E-mail)地址:
Yanhcq@sina.com
出版日期:每月 4 日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 0079 号
定价:**4.80** 元

# 抗战时期毛泽东的民主主张与实践

● 姜 平

抗战时期是中国共产党走过长期曲折道路并在思想上、政治上成熟起来的时期，是毛泽东思想形成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党在历史上最重视民主政治的时期之一。抗日战争一开始，毛泽东就非常重视民主问题。他说："民主是抗日的保证。""没有民主，抗日是要失败的。没有民主，抗日就抗不下去。有了民主，则抗他十年八年，我们也一定会胜利。"为了实现民主，党中央一方面在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全面地实行了民主政治；另一方面积极推动国民党进行民主改革。这两方面都进行了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和丰富的经验。1945 年 7 月，毛泽东对来延安访问的黄炎培发表了中共决定以民主政治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著名谈话，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 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全面实行民主政治

1936 年底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两党内战停止，经过多次谈判，1937 年秋，国民党政府按照与中共代表达成的协议，宣布将陕甘（宁）边区改为国民政府行政直辖区，任命林伯渠、张国焘为边区政府正副主席；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指挥，开赴华北抗战。随后，又将中共留在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由叶挺、项英任正副军长，开赴华中地区抗日。八路军、新四军开赴华北、华中地区抗战后，依靠人民群众，配合中共地方党组织，很快就在敌后广大地区开展了抗日游击战争，建立起一块又一块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并在这些根据地中，按照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指示，建立了各级民主政权，认真实行民主政治，建立起一系列的民主制度。

### （一）建立"三三制"政权

在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初创时期，共产党员在政权机关中人数较多，其他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所占比例较少，这不利于充分调动各党各派和各阶层人民共同抗日的积极性。为了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加强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1940 年 2 月 1 日，中共中央指示全党要充分认识实行民主政治的重要性，强调指出，"没有民主政治，抗日胜利只是幻想"。3 月 6 日，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写了《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党内指示，在指示中明确指出，在各抗日根据地的政权中，"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上述人员的分配是党的真实的政策，不能敷衍塞责。为了执行这个政策，必须教育担任政权工作的党员，克服他们不愿和不惯同党外人士合作的狭隘性，提倡民主作风，遇事先和党外人士商量，取得多数同意，然后去做。同时尽量地鼓励党外人士对各种问题提出意见，并倾听他们的意见。绝不能以为我们有军队和政权在手，一切都要无条件地照我们的决定去做。"为了保证党在政权中占领导地位，毛泽

东说："必须使占三分之一的共产党员在质量上具有优越的条件，只要有了这个条件，就可以保证党的领导权，不必有更多的人数。"他还指出，"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毛泽东并特别警告全党说："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共产党的这个与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原则，是固定不移的，是永远不变的。"

在中共中央实行"三三制"的政权的指示下达后，各抗日根据地都坚决贯彻执行。例如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选举政府委员时，各小组最初提出的候选人名单，共产党员较多，谢觉哉、王维舟、马文瑞等立即要求退出。正式选举结果，十八名政府委员中，有共产党员七人当选，超过了三分之一，徐特立又当即宣布退出。由于各根据地严格执行了"三三制"，结果就使许多其他党派人士、开明士绅、工商界人士、知识分子及社会名流有机会当选，参加民主政权，从而有利于扩大抗日民主政权的社会基础，充分调动各阶层人民的抗日积极性。

**（二）建立参议会制度**

1939年，陕甘宁边区及所属各县、各乡，首先建立起边区、县、乡三级参议会，制定了《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组织条例》。《条例》规定："边区各级参议会为代表边区之各级民意机关"。"各级参议会之议员，由人民直接选举之。"各级参议会有选举和监督各级政府等职权。如边区参议会有："一、选举边区政府主席、边区政府委员及边区高等法院院长；二、监察及弹劾边区各级政府之政务人员；三，批准关于民政、财政、建设、教育及地方军事各项计划；四、通过边区政府所提出之预算案；五、决定废除或征收地方捐税；六、决议边区之单行法规；七、督促及检查边区各级政府执行参议会的议案"等等职权。

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建立后，晋察冀等华北、华中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均以陕甘宁边区为榜样，纷纷制订了参议会组织条例，建立了参议会等各级民意机关。各地县以下民意机关所使用的名称不尽相同，但民意机关的性质、职权是相同的。如晋察冀边区，人民政权分为边区、县、区、村四级，民意机关亦分为四级：边区称参议会，县为议会，区为代表会，村为村民大会，均有选举和监督同级政府领导人的职权。

**（三）实行普选制度**

毛泽东指出，抗日民主政权的产生，"应经过人民选举"。"凡年满十八岁的赞成抗日和民主的中国人，不分阶级、民族、男女、信仰、党派、文化程度，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一政策，在各抗日根据地都得到了认真实行。陕甘宁边区从1937年底起就实行了选举制度，并制定了《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为保证选举充分发扬民主，在《条例》中对有关问题作了明确具体的规定。如第二条规定，"采取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之投票选举制"。第十八条规定："各抗日政党及各职业团体，可提出候选人名单，进行竞选运动。在不妨害选举秩序下，选举委员会不得加以干涉或阻止。"

在陕甘宁边区实行选举制度后，各抗日根据地均陆续实行了选举制度。为了搞好选举，晋察冀、冀鲁豫、晋绥、晋西北、山东区、苏中区等各抗日根据地均参照《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制定了本地区的选举法规，保证了各地的民主选举工作能依法正常进行。由于各根据地大多数选民文化程度不高，而且很多人不识字，为了使他（她）们都能参加选举，各地还从实际情况出发，创造出了各种投票方法：识字多的选民采用票选法；识字不多的采用画圈法、画杠法；完全不识字的则采用投豆法、烙票法等。各根据地的选举，参加投票的选民一般都在80%以上。这也反映了广大农民对于民主选举制度的热烈拥护。周恩来指出：到1944年10月上旬为止，在中共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人口共达9千万，都建立了人民普选出来的地方各级政府，其中有"民选县政府591县，专员公署85处，民选的边区政府及行署12处，以上各项统计，陕甘宁边区均不在内"。

**（四）建立保障人权制度**

敌后抗日根据地不仅重视民主政权的建设，也非常重视保障人权。1940 年 12 月，毛泽东明确指出："关于人民权利，应规定一切不反对抗日的地主资本家和工人农民有同等的人权、财权、选举权和言论、集会、结社、思想、信仰的自由权。政府仅仅干涉在我根据地内组织破坏和举行暴动的分子，其他则一律加以保护，不加干涉。"在这个思想指导下，从 1940 年开始，各抗日根据地都陆续制订了保障人权的专门法规。如《山东省人权保障条例》、《冀鲁豫边区保障人民权利暂行条例》、《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财权条例》等等。

各地保障人权的法规，都对人民（又称"国民"，包括地主资本家）应享有的各项民主自由权利作了明确的规定，如《山东省人权保障条例》规定："凡中华民国国民，无男女、种族、宗教、职业、阶级之区别，在法律上、政治上一律平等。""中华民国人民均享有建国大纲所规定的选举、罢免、创制、复决之权。""在不违害抗战范围内，人民有下列之自由：（一）人民有身体与抗日武装之自由；（二）人民有居住与迁徙之自由；（三）人民有言论、著作、出版、集会、结社与通讯之自由；（四）人民有信仰宗教与政治活动之自由。"还应该指出的是，各地制定的人权法规，还针对一些干部在工作中容易产生侵犯人权错误的若干问题逐条作了详尽具体的规定，如明确规定：公安机关或司法机关逮捕人犯应有充分的证据，依法定手续执行，不得草率从事；接受人犯的机关应在 24 小时内开始传讯，要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司法机关审理民刑案件不得超过 30 天，判决后要准许当事人按级上诉；对犯人的管教应按看守规则进行，不得虐待和随意处罚犯人；一般犯人应准其家人定期探视，患病者要尽量给予治疗，或批准其保外就医。

**（五）制定民主的施政纲领**

各根据地都用民主方法通过参议会制定了政府的施政纲领，陕甘宁边区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1939 年 1 月首先制订了《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经边区第一届参议会讨论通过后实施。这份纲领主要包括实行（一）民族主义（二）民权主义（三）民生主义三部分内容，每一部分又分为若干条，共 28 条。就实行"民权主义"来说，纲领规定政府要"发扬民主政治，采取直接、普遍、平等、不记名的选举制，健全民主集中制的政治机构，增强人民之自治能力"；"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与通信之自由"；"建立便利人民的司法制度，保障人民有检举与告发任何工作人员的罪行之自由"；"发扬艰苦作风，厉行廉洁政治，肃清贪污腐化，铲除鸦片赌博"；"建立工作检查制度，发扬自我批评，以增进工作的效能"等 11 条。

1941 年 11 月，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又对上述施政纲领进行了修改，制定了新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修改后的纲领比原来的纲领内容更加充实，政策也更加具体完善，特别是将保障人权的内容列入纲领之中。如明文规定："保障一切抗日人民（地主、资本家、农民、工人等）的人权、政权、财权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之自由权，除司法机关及公安机关依法执行其职务外，任何机关、部队、团体不得对任何人加以逮捕、审问或处罚。而人民则有无论用何种方式控告公务人员非法行为之权利。""改进司法制度，坚决废止肉刑，重证据，不重口供"等等。

在《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颁布前后，各敌后抗日根据地都根据本地区情况，采用民主方法制订了施政纲领，如《晋察冀边区目前施政纲领》、《山东省战时施政纲领》、《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施政纲领》等等，这些施政纲领的制订和实施，对于建设边区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保障广大人民的民主权利，争取抗战胜利都起了重要作用。

正是由于毛泽东和党中央在敌后根据地全面推行了民主政治，从边区到乡村各级政府的成员都由选举产生，广大干部在人民的拥护、支持与监督下工作，清正廉洁，艰苦奋斗，与人民群众同生死共患难，故而使敌后抗日根据地成为敌人无数次进攻扫荡都打不垮的钢铁堡垒，并不断得到壮大和发展，根据地从抗战初期的

一块发展到抗战胜利时的十九块，根据地人口从几百万发展到一亿。同时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也由抗战初期的三万多人，发展到抗战胜利时的 100 万人。此外还有 220 万武装民兵。党组织自身也得到了空前的壮大。这一情况，充分说明了中共在根据地实行民主政治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同时也证明了民主政治具有无比的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

## 推动国民党进行民主改革，批判一党专政

在抗战爆发前，毛泽东和党中央就把推动国民党进行民主改革、争取实现民主政治提上了重要日程。1937 年 5 月，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报告上说："争取民主，是目前发展阶段中革命任务的中心一环"。因为没有民主自由，便不能动员人民参加抗战。"没有人民的动员，抗战的前途便会蹈袭阿比西尼亚的覆辙"。因而，毛泽东提出："中国必须立即开始实行下列两方面的民主改革。""第一方面，将政治制度上一党派一阶级的反动独裁政体，改变为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第二方面，是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没有这种自由，就不能实现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革，就不能动员人民进入抗战，取得保卫祖国和收复失地的胜利。"

七七卢沟桥抗战爆发后，毛泽东、党中央又以各种方式多次推动国民党进行民主改革，如 8 月 25 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向国民党、各抗日党派和全国人民提出的十大救国纲领中就有各项民主要求：人民应"有抗日救国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武装抗敌的自由"。"释放一切爱国的革命的政治犯，开放党禁"。"召集真正人民代表的国民大会，通过真正的民主宪法，决定抗日救国方针，选举国防政府。国防政府必须吸收各党各派和人民团体中的革命分子"等等。

1941 年 11 月，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全体参议员合影。林伯渠（前排左二）被选为边区政府主席，民主人士李鼎铭（前排左三）被选为副主席

在中共的积极推动下，9 月 22 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第二天，蒋介石又发表了《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在谈话中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在此前后，国民党也基本上承认了青年党、国社党、第三党、救国会、职教社、乡建派等各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释放了一批政治犯，并准许中共和各党派公开出版了《新华日报》、《新中国日报》、《前进日报》、《全民抗战》等抗日报刊。

国共合作建立后，10 月 25 日，毛泽东向国民党发出紧急呼吁，要求其加快民主改革步伐。毛泽东说："为应付当前的紧急状态，我们提议召集临时国民大会。""这个大会的职权，应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由它决定救国方针，通过宪法大纲，并选举政府。"同时要"允许人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武装抗敌的自由。"中共的主张，得到了在野各党派的支持。国民党虽不愿召开国民大会，但为团结各党派共同抗日，表示准备召开国民参政会。

为推动国民参政会早日召开，1938 年 3 月 1 日，中共中央又致电蒋介石，指出："健全民意机关的建立已经为刻不容缓的当务之急"，并要求此民意机关，不仅有"对政府咨询的作用，而且能有商量国是和计划内政外交的权力。"在中共的推动下，国民党作出了

设立国民参政会作为抗战时期全国民意机关的决定，确定参政员总数为200名，由国民党中央聘任。6月16日，国民党公布了第一批参政员名单，中共毛泽东、董必武等七人被聘为参政员，青年党、国社党、第三党、救国会、职教社、乡建派等各抗日党派的一些领导成员共30多人，也被聘为国民参政员。

同年7月6日，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在汉口隆重召开，出席会议的参政员162人，列席会议的官员、外宾和中外记者共1000多人。会议历时十天，听取了国民政府各院和行政院各部有关军事、外交、内政、财政、经济、交通等工作报告，通过了《拥护国民政府实施抗战建国纲领案》等议案和《大会宣言》，并根据中共和各党派参政员的提案，通过了《设立省、县参议会案》，由于此案被通过，以后全国各地陆续成立了省、县参议会。大会结束前，又选出董必武、沈钧儒、张君劢、罗隆基、梁漱溟等25人为驻会委员会委员，负责处理参政会闭幕后的日常工作。由于这次会议开得比较民主和谐，在国内外都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对推动当时的全国团结抗战起了很大的作用。

但1938年底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看到中共和各党派取得合法地位后，抗日民主活动力量得到发展，便认为对自己不利，在1939年1月召开的五届五中全会上，又决定重新加强一党专政，实行反共反民主的方针，设立了"反共委员会"，秘密发布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剥夺了人民已经取得的一些民主权利。但国民党的这种倒行逆施，立即引起了在野各党派的愤慨和强烈反弹。

1939年9月，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会议在重庆召开，中共和各党派参政员以孙中山先生的民主宪政主张为武器，分别向大会提出了七项要求取消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民主宪政的提案，经过激烈辩论，最后终于在大会上通过了《请政府明令定期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行宪政案》，并迫使国民党中央不得不表示接受这一决议。国民参政会结束后，各党派参政员又立即在重庆邀请各界人士举行大型的宪政座谈会，连续召开了八次会议，影响很大。同时，重庆的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和一批青年团体、妇女团体，也分别召开了一系列宪政座谈会，一致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实行民主，切实保证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权利，严禁非法逮捕和秘密杀害。接着，各党派参政员又联合各界人士共同发起成立了重庆各界宪政促进会筹备会，下设秘书处和宣传、联络、研究三个委员会，发表了宣言，进行了大量的宣传工作和组织活动。在陪都重庆宪政运动的推动下，成都、桂林、昆明、西安、上海（租界）等城市和广东、江西、安徽、山西等省，各界人民也积极投入了民主宪政运动，纷纷召开宪政座谈会，建立宪政促进会，发表宣言和主张，编印宪政问题资料，创办宣传宪政的报刊，要求国民党早日结束党治，制定宪法，实行宪政。从而在全国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宪政运动。

毛泽东和党中央对宪政运动非常重视。自宪政运动在重庆开展后，1939年10月2日和12月1日，中共中央两次向全党发出关于宪政运动的指示。指示说：一届四次国民参政会通过的《请政府明令定期召集国民大会实施宪政案》，"不失为进步的决议，而且的确反映了全国人民目前的迫切需要"。我党各级组织应运用这一决议，积极参加宪政运动，"要求立刻实行民主政治，召集真正民选的全权的国民大会，实施宪政"。

指示明确指出："我们党的根本主张，是要真正实现新式代议制的民主共和国。"为此，在宪政运动中，我们党必须提出和宣传下列主张：

（1）立刻实现人民言论、集会、结社、出版、信仰自由之民主权利，作为召集国民大会实施宪政的先决条件，没有这一条件，所谓宪政是无法实现的。

（2）彻底修改国民大会选举法。必须保证国民大会代表真正是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各民众团体直接选举的代表，反对由政府指定圈定办法。

（3）扩大国民大会职权。国民大会应有选举和改组国民政府，决定政府各种基本政策之任务。在国民大会休会后，应设立常驻机关，以监督政府对宪法与各种政策之实施。

（4）国民政府所宣布的宪法草案必须彻底修改，使新宪法真正成为实现民主政治保障民权的根本法，而不是国民党训政的装饰品。

"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的宪政。这种根本主张共产党是决不放弃的，即使一时不能实现，将来也还是要实现的。"

指示要求全党应通过各种报刊、会议和谈话，广泛宣传本党的民主主张，"严厉批评各种反对国民大会、反对宪政、反对民主的言论与行动"。并应指出"袁世凯、曹锟、吴佩孚均曾因反对宪政而遭致灭亡的历史事实，指出没有宪政就会有亡国的危险。"

由于中共中央的重视和支持，1939 年 11 月、12 月，延安新闻界、妇女界、青年和商人，分别成立了宪政促进会，并建立了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筹备会。1940 年 2 月 20 日，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正式成立，毛泽东等 46 人被选为理事，吴玉章任理事长。这次会议后，在华北、华中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各界人民也建立了宪政促进会，并纷纷召开宪政座谈会，要求国民党政府结束党治，重选国民大会代表，制定真正民主的宪法，实行宪政，在解放区掀起了宪政运动的高潮。

国民党原先是想以假宪政来欺骗和敷衍人民，看到人民起来要求真正的民主宪政之后，他们非常害怕，先是用各种方法压制和破坏宪政运动，接着于 1940 年 9 月，国民政府又借口因各地交通不便，将原定于同年 11 月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的日期无限期推迟，并以种种规定限制宪政团体的活动，从而将一场长达一年之久、轰轰烈烈的民主宪政运动暂时压了下去。

国民党将民主宪政运动压下去后，先后发动了两次反共高潮，强化了特务组织，逮捕了许多中共党员和民主人士，设立了不少集中营，全面加强了法西斯统治。但加强法西斯统治的结果，却使得政治更加腐败黑暗，各级官吏无法无天、贪污成风，用各种手段大发国难财和榨取民脂民膏，军队也大搞走私并克扣军饷，使官兵失去斗志，从而引发了国统区的政治、军事、经济危机，这不仅引起了全国各党各派、各界人士和同盟国的强烈不满，而且人民群众的反抗也越来越激烈，这种危机到了 1944 年已经发展到难以收拾的地步。

1944 年 9 月，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大会在重庆召开，此时反法西斯战争同盟国已纷纷转入反攻，而国民党军队却在豫湘桂战役中发生大溃败。为了挽救危局，中共参政员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上代表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召集国是会议，成立各党派民主联合政府的要求。

10 月 10 日，周恩来在延安发表演讲，又进一步阐明了中国共产党要求召集紧急国是会议，取消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理由和主张。在这次演讲中，周恩来首先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制度对国家民族造成的严重危害。他说："中国现在正面战场正处在严重的失败之中。河南战役，44 天工夫，失掉了 45 个城市。湘桂战役，又连失长沙、衡阳、零陵、宝庆、肇庆、梧州等这样多的大城市，敌人现在已逼近桂林，威胁柳州，甚至昆明、贵阳亦成为敌人窥伺的目标。沿海战役，温州、福州相继失陷，从此沿海较大的港口，都不在我们手里了。"这一连串的失败绝非偶然，这是国民党片面抗战、消极抗战、制造内战的结果，也是"由于国民党在其统治区内实施一党专政、排除异己、压迫人民、横征暴敛的法西斯主义的政策所造成"。

周恩来强调指出："在政治方面，国民党当局是死死守住一党专政，个人独裁，绝不容许有多党政治、人民民主的。"在大后方，"只有党治，绝无民选。各级参政会，由县而省而全国，都是指定的。各级官吏，由保甲长直到国民政府主席，都是党部委派的。而这些指定、委派，又为国民党少数统治集团所包办，党内广大党员及民主领袖是得不到这种权利的。所以，与其称为党治，毋宁称为寡头专制。"周恩来还指出，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制度，实际上是法西斯政治，"剥夺人民自由，实行官办自治，箝制舆论，摧残文化，垄断专卖，横征暴敛，纵使特务机关蹂躏人权…… 这种政治，请问不是法西斯主义的政治是什么？"

中国共产党关于废除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尽管得到了国统区各抗日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界人民的热烈响应,但却遭到国民党的顽固拒绝。1945 年元旦,蒋介石发表广播讲话,表示待军事形势好转后,即提前召开国民大会,"颁布宪法,还政于民"。以此来进行搪塞。

接着中国共产党又建议,首先召开由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三方代表参加的党派会议,作为国是会议的预备会。这一建议又被蒋介石拒绝。

1945 年 4 月下旬,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开幕,毛泽东在向大会所作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再次严厉地抨击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制度,他指出:国民党内的主要统治集团实行一党专政,坚持独裁统治,残酷地压迫人民的民主运动,不愿实行丝毫的民主改革,贪污成风,廉耻扫地,造成了民生凋敝、民怨沸腾、民变蜂起的严重危机。现在"中国人民要求废止这个反人民专政的呼声是如此普遍而响亮了,使得国民党当局自己也不能不公开承认'提早结束训政',可见这个所谓'训政'或'一党专政'的丧失人心,威信扫地,到了何种地步了。在中国,已经没有一个人还敢说'训政'或'一党专政'有什么好处,不应该废止或 '结束' 了,这是当前时局的一大变化。"

为争取抗战胜利和战后建立一个和平民主的新中国,在报告中,毛泽东再次向国民党提出了废除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的要求。他提出,其办法可分为两步走:第一步,"目前时期,经过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的协议,成立临时的联合政府";第二步,"将来时期,经过自由的无拘束的选举,召开国民大会,成立正式的联合政府"。但这一要求又被国民党拒绝。国民党坚持于 1945 年 11 月 12 召开由它包办的"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并拟在本年七月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上,"强迫通过许多具体办法,以便实行国民党的反动决议"。

国民党的顽固态度激起毛泽东等人的极大愤慨,因此,中共中央宣布:中共参政员决定不出席七月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以示抗议。这样,国共两党的关系就变得非常紧张,内战随时可能重新爆发。

## 毛泽东与黄炎培在延安纵论民主政治

由于国共两党关系紧张,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国民参政员黄炎培、褚辅成等人担心爆发内战,便决定出面调停。1945 年 7 月 1 日,黄炎培、褚辅成、章伯钧、左舜生、冷遹、傅斯年六参政员飞抵延安访问,受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的热烈欢迎和热情接待,毛泽东等人除和黄炎培等进行了多次会谈并取得一致意见外,又请他们参观了工厂、农场、商店和延安大学等单位,让他们与延安劳动模范及各界人士会见,使六参政员亲眼看到了延安党政军民上下团结、同心同德的精神面貌和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社会风尚,给他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临别前,毛泽东与黄炎培两人作了一次亲切的交谈,讨论了我国自古以来政治成败的原因及其规律,在交谈中,毛泽东在回答黄炎培的殷切希望时,发表了他决定以民主政治来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著名谈话。

对这次谈话,黄炎培在《延安归来》一书中作了详细的记载。

黄炎培写道:"有一次毛泽东问我感想怎样?"我说:"我生 60 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 '其兴也浡焉'! '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成多数,到风气形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 的也有,'求荣取辱' 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

接着,黄炎培又说:"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

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满怀信心地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1941 年晋西北解放区离石县发动群众参加政权选举

黄炎培赞同毛泽东的看法，他说：“我想，这话是对的，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个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个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来打破这个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这段谈话表明，毛泽东当时已深刻地认识到民主政治的巨大优越性和极端重要性，认为只有建立民主制度才能使国家实现长治久安。这的确是一条重要的真理，它已被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历史实践证明是正确的。

黄炎培对毛泽东的这次谈话非常重视，当天就在日记中作了详细的记载，回到重庆后又将这段谈话写在《延安归来》一书中，并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将该书在重庆出版，后来此书又在重庆、上海等地多次再版和翻印，总数达到数十万册，在国民党统治区各界人士中广为流传，产生了极大的政治影响。

毛泽东对民主政治的这种深刻认识不是偶然产生的，而是他在长期革命生涯中不断研究、探索的结果，特别是对抗战时期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毛泽东就指出：“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的武器。”“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烦琐的礼节，经济公开……这些办法，士兵很满意。尤其是新来的俘虏兵，他们感觉国民党军队和我们军队是两个世界。他们虽然感觉红军的物质生活不如白军，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抗日战争时期，1941 年，毛泽东又深有感触地说：“中国缺少的东西固然很多，但是主要的就是少了两件东西：一件是独立，一件是民主。这两件东西少了一件，中国的事情就办不好。”在整个八年抗日战争中，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的主要领导人，又从两方面有了更深刻的体会。一方面，在与国民党的交往和斗争中，他清楚地看到，国民党蒋介石由于坚持了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结果是政治腐败，贪污成风，民怨沸腾，民变蜂起，从而造成了严重的政治、军事、经济危机，使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另一方面，共产党由于相信人民群众，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全面实行民主政治，结果是政治清正廉洁，深得民心，使根据地成为抗日的中坚并不断扩大，同时人民军队和共产党的力量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有了这两方面的深刻体会，毛泽东便自然能够得出“只有实行民主，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才不会人亡政息”这个符合历史规律的科学结论。

令人遗憾的是，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国执政党，毛泽东成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但他却未能始终重视民主政治的建设，晚年因破坏民主法制，给党、国家和人民造成了重大损失，其原因和教训是值得人们认真研究探讨的。但尽管如此，毛泽东在 20 世纪 40 年代提出的民主治国的光辉思想，是他留给我国人民的一笔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应该得到党和人民的高度重视。

（责任编辑　吴　思）

# 聂荣臻保护生物学家朱洗“过关”

● 薛攀皋

1960年初,一位中学教师写文章上纲上线批判朱洗及其著作《生物的进化》。当年“左”道横行,发表这样一篇文章很可能引起一场大的风波,甚或招来一场不小的灾难。有关方面请示负责科技工作的聂荣臻副总理,聂荣臻采取了和风细雨的方式,既批评了朱洗的错误学术观点,又保护了他的积极性,同时向批判者讲清楚如此处理的道理。风云散去,雨过天晴,事情圆满解决,有关人员都受到了深刻教育。

## 朱洗,五级车工出身的中国科学院院士

朱洗(1900—1962),是我国杰出的生物学家。1919年在家乡浙江临海省立第六中学学习时因参加“五四”运动被学校开除,去上海商务印书馆当排字工人。1920年去法国勤工俭学,呆了12年。当过洗碗工、木工、铸工、汽车修理工,当车工达到五级水平。他白天劳动,晚上补习法文和功课,终于在1925年秋考入大学。1931年获博士学位。

1932年11月,他放弃了法国的优厚工作和生活条件回到祖国,先在广州中山大学生物系执教,后到北平研究院动物学研究所工作,并在中法大学生物系任兼职教授。以后,他到了上海,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创办生物研究所,坚持研究工作。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汪精卫汉奸政权以高薪要职相诱挟,朱洗严辞拒绝。在上海已无法存身的情况下,朱洗回到浙江临海家乡,与朋友们一起办了一所半工半读的琳山农校和“合作医院”,不遗余力普及农村教育文化卫生事业。

抗日战争胜利后,朱洗重回上海生物研究所,这时北平研究院生理学研究所从昆明复员迁上海,两个研究所合并,挂后者的牌子,朱洗任研究员兼所长。

新中国诞生后,中国科学院接收北平研究院生理学研究所,并入新成立的实验生物研究所,朱洗先后任副所长、所长,直至逝世。他得到党和政府的信任和支持,工作和生活条件都有了保障,他的学识才能得以充分施展。他毕生致力于动物早期发展的研究,在卵球成熟、受精以及单性生殖等方面的探索取得卓著成绩。他在进行系统深入的理论研究的同时,努力解决生产实际问题,在引进驯化原产于印度的蓖麻蚕,以及解决家鱼人工繁殖的应用研究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还一贯重视科学普及工作,习惯于每晚在实验室写作,宣传科学思想,普及科学知识,深得老友巴金的鼓励和支持。朱洗的《蛋生人与人生蛋》、《我们的祖先》、《重男轻女》、《雌雄之变》、《知识的来源》、《爱情的来源》、《维他命与人类之健康》,以及《霍尔蒙与人类之生存》等八大本《现代生物学丛书》,就是在巴金主持工作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生物的进化》是他用力最勤,历时最久的一部书,解放以前没来得及出版。

1955年,朱洗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第一批学部委员(院士)。1962年7月,因患癌症逝世,享年六十有二。

## 瑕不掩瑜,《生物的进化》是一部好书

朱洗写这本书始于 1936 年。这是当时上海的世界书局计划出版的世界百科全书的一部分。到 1942 年,他已经写了 40 万字。因为抗日战争的关系,世界书局的计划被迫搁浅。

达尔文主义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小学生的必修课。朱洗认为自己写的讨论进化的书不合时宜,不可能发表,便放下了。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后,他一度动心,但又自认书稿增补修订量大,又放下了。不意到了 1956 年夏天,科学出版社两位编辑到上海约稿,听朱洗说起有这样一部旧作,他们欣然表示愿意出版。于是朱洗鼓起勇气,抓紧时间修改。补充和改写了一些章节,总共增加了 20 多万字。两年后,这部近 66 万字的巨著终于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了。

生物学家朱洗

这部书的第一部分是进化思想的渊源;第二部分是进化的事实;第三部分是进化原因的讨论。

朱洗说,这本书是在百家争鸣的号召下写成的。自己没有什么可鸣的新论调,只是付出一些辛苦,兼收并蓄地收集别人的论调,表达在这一书上而已。希望读者从这本书里听到世界各国学者对于进化问题的鸣声。

问题主要发生在:朱洗在三大部分和某些章节的结论中,把生物界的现象引伸到人类社会。这就是他后来所指的"多余的话"。在这总共不满 5 页的"多余的话"里,朱洗不同意达尔文所说的同种间竞争那么普遍、激烈、不顾死活。他引用克鲁泡特金在亚洲北部严寒地带多年考察动物生活的结果,认为同种个体互斗的例证很少,大都是为抵抗恶劣环境丧命的。所以,生存竞争多半是指生物与自然界的竞争。既然种内没有斗争,哪里会有因种内斗争而引起的进化呢?

关于谁最适于生存的问题,朱洗认为克鲁泡特金反对弱肉强食,用许多事实证明要先有和平、安适,才有进化;要互持、要互助,才能抵抗自然界中千万的强敌。这些强敌有的属于自然现象;有的是属于异种生物。生物中数目最多,种族最隆盛的物种,大都是合群的,如蚂蚁、白蚁、蜜蜂等,它们在团体中过着友爱美满的生活。人类既是动物的一种,当然不能例外。同种相残是退化灭种的因素;互助友爱才是进化的大道。这是由观察自然现象所得的高尚道德。

关于人类进化的事实,朱洗写道,少数帝国主义分子疯狂掠夺,忘却现代的文明是由和平、互助和创造三种要素铸成的。他们只知贪污,掠夺,投机,取巧,破坏人间的信义,摧残社会的基础。这是应该警惕的。大家如果明白过去大小战争的错误,痛改前非,那么,不但大小战争可以绝迹于人世,而且未来的和平幸福是享不完、受不尽的。

关于进化学说与人类的关系,朱洗写道,19 世纪下半期起,有人在人类中间提出"弱肉强食的口号,想在血肉拚杀之下寻找人类进化的光明。50 岁以上的我们,痛受战争的祸患,痛定思痛,是决不会赞同的。生物界中,有凶残无情的一面,也有慈祥恺悌的一面,慈爱的一面。应该充分学习,作为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道德基础"。

朱洗的这些话,当然是值得商榷的,有错误予以批评指正,是学术讨论的应有之意。问题是对于总体上看很有学术价值的这样一部著作,

出现了某些错误，应该怎样处置。

## 聂荣臻说：不要全盘否定《生物的进化》，更不要把朱洗一棍子打死

1960年2月，上海一位中学生物学教师，写了一篇题为《反马克思主义达尔文学说的<生物的进化>》的文章，批判朱洗及该书的错误。这位中学教师认为朱洗的书是一本“散播反马克思主义、反达尔文学说毒素的巨著”。说朱洗“坚定地站在错误、反动的立场”，以“马克思主义真正的敌人——无政府主义者的观点，来否定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作为历史观的阶级斗争，攻击作为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自然科学基础之一的达尔文学说”。他批判朱洗引用许多克鲁泡特金《互助论》的观点，笼统地提倡人类之间的互爱和互助，并从此出发反对包括正义战争在内的一切战争。文章说朱洗热衷于无政府主义学说，是因为他在解放前就是克鲁泡特金小集团的为首分子。文章还揭发朱洗偏爱西方学说，没有用专门章节介绍苏联的米丘林学说；在参考书目中，“没有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的著作”。

1927年，吴稚晖、李石曾在上海召开了一次有五个人参加的会，决定办一所学校和出版周报，在青年中传播无政府主义思想。当时朱洗还在法国，与这些活动无关。所谓朱洗是无政府主义小集团的为首分子，是捕风捉影的无稽之谈。

朱洗翻译过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他初到法国时曾经和陈独秀的儿子、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陈延年、陈乔年一起听过无政府主义者的讲演。但是他没有参加无政府主义的其他任何活动。

在50年代后期、60年代早期，“左” 的思潮在中国占主导地位时，一个“小人物”批判一个“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绝对不是一件小事。发表这样的文章，很可能掀起一场风暴，引发一场地震；不发表，作冷处理，万一被“秋后算账”，谁又能担当责任？因此，发或不发，没有人敢做主。于是问题提到了中共中央宣传部。

1960年4月19—26日，中国科学院第三次学部委员全体会议在上海召开。当时主管科学技术工作的聂荣臻副总理，以及中国科学院党政领导同志都在上海参加这个会议。中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同志就批判朱洗的这篇文章，同中国科学院秘书长杜润生商量，并请示聂荣臻。他们认为，朱洗是一位诚实负责的自然科学家，《生物的进化》一书虽然有些错误，但不是有意假借自然科学名义进行政治宣传或恶毒攻击。《生物的进化》应当认为是一部有价值的科学著作，其中错误的部分是局部的、次要的。同时，这本书大部分是在1936—1942年间写的，1956年夏天以后突击作了大量补充修订成书，有些论点矛盾混乱，反映出朱洗思想上的新旧斗争。

**1956年5月26日，周恩来、李富春、聂荣臻等在中南海举行酒会，招待出席全国科学规划会议的科学工作者**

聂荣臻了解《生物的进化》一书的情况后，决定从爱护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出发，要求以和风细雨的方式，帮助朱洗提高认识；不进行公开批判，不要对朱洗一棍子打死；不要对《生物的进化》一书全盘否定。聂荣臻责成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党员领导同

志亲自同朱洗谈话，指出其错误观点，鼓励他读一些马列主义著作，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自我批评，对错误的观点在该书再版时加以修改。同时聂荣臻责成上海市科委同志约见那位中学教师，告诉他不公开发表他的批判文章的原因，并听取他的意见。这位中学教师表示理解和拥护这个决定，认为这体现了领导对知识分子的关心和爱护。

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副院长、党委书记王仲良，是一位尊重科学、尊重知识，善于和科学家、知识分子交朋友的领导。他按照聂荣臻的指示，向朱洗传达了聂荣臻处理此事的意见。朱洗很感动，认为“这是组织上了解我，是对我的爱护”。他结合《生物的进化》一书中的错误进行检讨，做自我批评。他承认用克鲁泡特金的观点，以动物界的现象去解释人类社会现象是不对的。他检讨1957年审阅旧稿时，对不分正义与非正义的战争观，不分阶级的“爱”的观点等，都没及时改正，非常遗憾。

1961年底，科学出版社与朱洗商谈《生物的进化》一书的修订再版问题时，朱洗已因癌症住院治疗。朱洗高兴地允诺修改后再次印刷出版，先托付学生、助手王幽兰和主管本所科研计划的罗登先对《生物的进化》一书进行校阅，自己则配合医生坚持与癌症抗争，期待病情好转时亲自审定。但是朱洗很快病入膏肓，他自知不起，再三叮嘱重印《生物的进化》一书时删去那些从生物进化引伸到社会问题的“多余的话”。

## 颠倒黑白，“文革”中朱洗遭批判 拨乱反正，《生物的进化》的再版

《生物的进化》再版并不顺利。朱洗在长眠地下6年之后，即1968年，他被造反派扣上“反动学术权威”、“漏网右派”、“无政府主义者”等罪名，甚至到他墓前开现场批判会，并砸碑毁墓。

1978年11月底，在国务院副总理方毅的过问下，才推倒了强加在朱洗身上的不实之词，为朱洗恢复名誉，并举行朱洗骨灰重新安葬仪式。时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副委员长的聂荣臻送了花圈。《生物的进化》自从1962年底完成修订稿，到1980年3月出版，前后花了18年时间。

（责任编辑　洛 松）

---

## 读者释误

贵刊今年第2期《黄克诚率部进军黑土地》一文，最后一段中讲到：“长春郑洞国集团被全部歼灭”，与史实不符。

郑洞国集团即国民党东北“剿总”第一兵团，下辖第60军和新编第7军，被围困在长春孤立无援，锦州解放两天后，即10月17日，第60军由军长曾泽生率领起义，10月19日，军长李鸿率新编第7军投诚；郑洞国则在周恩来副主席以“当年黄埔革命初衷，毅然决断”的电报敦促下，于10月21日晨4时率兵团部投诚。起义、投诚与被歼灭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应严格区别。

第3期《反“五风”亲历记》一文中，说到“1958年‘反右倾机会主义’”，时间有误。反“右倾机会主义”是1959年8月在庐山召开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之后在全党全军全国展开的，而不是1958年。

**读者 谢 宁**

贵刊今年第1期《美国将军史迪威与八路军》有一处不符史实。第52页：“1948年10月史迪威将军因患胃癌不幸逝世……当时重庆《新华日报》发表评论，称赞他在……”其时重庆已不发行《新华日报》了。1946年下半年，我在重庆沙坪坝上大学，当年暑假还能买到《新华日报》。由于国民党撕毁《双十协定》和《政协协议》，全面发动内战，随着中共驻渝代表团撤离重庆，重庆《新华日报》于1946年8、9月间停止发行。

**武汉读者：王继文**

# 江渭清抗命三保刘顺元

● 潘祝平

1957年及其以后几年，在我国的大地上，先后掀起了反右派斗争风暴和大跃进浪潮。当时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因病休养，刘顺元代理省委第一书记。在这场大风暴和大浪潮中，刘顺元一方面要及时传达贯彻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一方面又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左”的错误进行适当抵制，尽可能减少损失，刘顺元为此承担了很大风险，多次被毛主席点名批评，甚至要打成右派。在刘顺元处境很困难时，江渭清和省长惠浴宇、省委书记处书记陈光等省委领导集体，并未见风使舵，同样冒着很大风险，想方设法保护了刘顺元。这在当时那样的政治气氛下，是很不容易、非常难能可贵的。

反右派风暴开始时，刘顺元并不了解毛主席提倡大鸣大放的意图是“诱敌深入，聚而歼之”，而是怕搞乱，强调在基层暂不搞大鸣大放，尤其在工人和学生中不要搞，以免影响生产和学习。知道了毛主席的意图以后，也采取了保留态度，认为这种办法将会产生阻塞言路的严重后果。因而曾与惠浴宇商定，这件事无论如何不能走在前面。在毛主席对反右派斗争不断加温升级时，刘顺元却采取了“适时休整，降低温度”的办法缩小打击面，保护了党内外一大批同志。所有这些都引起了毛主席的不满。1958年1月上旬毛主席来南京，曾向江渭清问起刘顺元的情况，询问江苏省委书记处、常委里有没有右派，意思很明显，已将刘顺元疑为右派。江渭清坚持实事求是，明确表示：“讲几句错话的人有，右派没有。”此次毛主席虽未将刘顺元点名为右派，但悬在刘顺元头上的右派阴影并未消除。

紧接着反右派风暴之后，又掀起了大跃进浪潮。对于大跃进，开始时刘顺元也曾为其迷惑过。但对当时指导思想上的唯意志论，对大放粮食高产卫星、大办农村集体食堂、大炼钢铁等方面的强迫命令、弄虚作假、搞浮夸、一平二调等歪风，也都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抵制。因此大跃进所造成的损失，在江苏虽然未能避免，但远没有安徽等省那么惨重。然而刘顺元在江苏的正确作为，却遭到了当时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等人的反对。毛主席在反右派风暴中已对刘顺元存疑，在大跃进浪潮中又有柯庆施等人火上加油，以致在1959年7、8月庐山会议期间和会议以后，刘顺元几次被点名为“老右倾”、“大右派”。柯庆施还诬称刘顺元为“危险人物”。

在这样的情况下，刘老承担了多大的风险，其处境是何等困难，便可想而知了。

毛主席当年是“一言九鼎”。庐山会议以后，江苏省委在贯彻庐山会议精神时，要不要批判处理被点了名的刘顺元，是江苏省委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可敬可佩的是，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认为刘顺元在江苏贡献很大，并无大错。于是与意见完全一致的惠浴宇、陈光等省委领导集体甘冒风险，共同下定了力保刘顺元的决心。其办法是由省委集体承担责任，集体总结经验教训。刘顺元在省委扩大会上代表省委作报告时，顺便把自己摆进去检讨几句。为了让刘顺元避开当时的风头，农业由陈光代管一段时间，刘顺元专任省委常务书记，暂少出席中央召开的会议。江渭清等为了力保刘顺元，真是煞费苦心。在省委扩大会议前夕，毛主席路过南京时，听了江渭清、刘顺元的汇报及书记处其他成员的表态，见江苏省委完全团结一致，加上江渭清在汇报时明确表示：“我们也有右倾思想，但是没有‘分子’”。因此老人家此次对批判刘顺元未有表示。

然而刘顺元面临的风险并未消除。在事隔5个多月的1960年1月，中央召开的上海会议上，当安徽、山东、福建等省都说他们省委里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后，毛主席问江苏的情况怎么样？江渭清仍像过去一样明确回答：“讲些错误话的有，右派没有。”毛主席不满地说：“我看你们的刘顺元就是大右派！”并问江渭清敢不敢打？在江渭清表示不肯打刘顺元以后，老人家只好对江渭清说：“好吧，你就不要打了。”由于江渭清再次力保，刘老又一次侥幸脱险。以后毛主席虽然仍提过批判刘顺元，但并未下定决心。几个月以后，毛主席对刘顺元的态度转变了，说明老人家终于清楚了刘顺元在江苏的贡献。

由于大跃造成了严重后果，经济状况日益恶化，毛主席不得不同意重新纠“左”，采取一些紧缩措施。于是在1960年7月5日至8月10日在北戴河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江渭清建议刘顺元前往参加，因为毛主席最近几次说江苏这几年工作做得不错。刘顺元已多时未参加中央工作会议，这次毛主席见到刘顺元，显得异乎寻常的热情，紧紧握住刘顺元的手说：“你跟渭清同志合作得很好，江苏这几年没有出大的问题。”这实际上已肯定了刘顺元在江苏的工作业绩。

刘老能够最终摆脱这场灾难，固然与三年大困难之后毛主席不得不同意重新纠“左”有关，但笔者认为，以江渭清为首的江苏省委领导集体，实事求是，团结一致，甘冒风险，决心力保，是刘老能够脱险的一个重要原因，从中也显出江苏的江、惠、陈等诸老的高尚品格。

（责任编辑　致 中）

刘顺元（右）与老战友江渭清一起出席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会议

# “剿共英雄”卫立煌的人生巨变

● 郭广迪

1932年夏天，国民党集中了十几个精锐师对位于大别山地区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经过反复较量后，红四方面军主力向陕南川北转移。国民党第十四军军长、豫鄂皖三省“剿匪”军中路军指挥官卫立煌率部占领鄂豫皖根据地的军事政治中心——金家寨。这一“辉煌胜利”令国民党方面大喜过望，蒋介石亲自前往慰劳，国民党政府则颁布命令，宣布以位于大别山区豫皖两省交界处的金家寨为中心建立一个新的县治，并命名为“立煌县”。在国民党军队中获此“殊荣”者前所未有。

新中国诞生后，所谓“立煌县”理所当然地被取消。不过，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三天，却收到了这位卫立煌先生从香港发来的贺电，称：“先生英明领导，人民革命卒获辉煌胜利，从此全中华人民得到伟大领袖，新中国富强有望，举世欢腾鼓舞，竭诚拥护。煌向往衷心尤为雀跃万丈。”1955年3月，这位曾任国民党东北“剿匪”总司令的“剿共英雄”从香港回到大陆，并于1958年4月就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 积极“剿共”受蒋介石特别嘉奖

卫立煌（1896——1960）安徽省人。辛亥革命爆发时，15岁的卫立煌在家乡参加革命军，后又到广州参加粤军，曾担任孙中山先生的卫士。卫立煌在粤军中步步升迁，由排长、连长、营长直至旅长。孙中山先生逝世后，蒋介石玩弄手腕将许崇智逼下台，随后即对粤军进行改编，将不服从他的部队包围后缴械，将拥护他的部队编为一个师，同由黄埔军校教导团改编成的两个师组成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由他本人任军长。这就是蒋介石最初的嫡系部队。原粤军补充旅旅长卫立煌被任命为第一军第三师第九团少将团长。于是，卫立煌成了蒋介石嫡系部队中的一员干将。

北伐战争开始后，卫立煌率部随第一军参加了进攻江西、福建的战斗，到达福州后，升任第十四师师长。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卫立煌率领的第十四师和顾祝同的第三师一起组成蒋介石政权的警卫部队。后来，卫立煌被保送到北平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一期学习。毕业后，回安徽组织军队，蒋介石给其以第四十五师的番号，并任命他为师长。

从1930年5月起，卫立煌开始参加围剿共产党和红军的战争，就任皖北“剿匪”指挥官。1931年，又参加了蒋介石亲自指挥的对江西中央苏区进行的第三次大围剿，后来升任为国民党陆军第十四军军长。1932年6月，蒋介石组织第四次大围剿中，首先集中兵力进攻红四方面军所在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卫立煌被

委任为鄂豫皖三省"剿匪"军中路军第六纵队指挥官，率十四军奉命进攻黄安（即现湖北省红安县），行军途中遭红军袭击，被打了个措手不及。红军首先击溃了其第十师的一个旅，然后直捣十四军军部。双方进行了一场十分激烈的战斗，连卫立煌随身的特务连也死伤惨重，若不是后援部队赶到，卫立煌险些成为红军的俘虏。

在尝到红军的厉害后，卫立煌不敢再轻举妄动。后来，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根据地悄悄向陕南川北转移，蒋介石并不知情，一再敦促各路"剿匪"大军向大别山进军，务必攻占鄂豫皖根据地的中心金家寨。因为怕中红军的埋伏，各路部队畏缩不前。卫立煌则挺身而出，他率一个师翻山越岭抄小路直插金家寨，结果未遇任何抵抗便占领了共产党苏区的这一"首府"。蒋介石收到卫立煌从金家寨发来的捷报，兴奋不已，认为鄂豫皖地区的红色政权已被彻底摧毁，因而亲自前往慰劳卫立煌及其部队，并随即破例设立"立煌县"，以表彰其在"剿共"战斗中的"卓越战功"。

占领大别山地区后，卫立煌被任命为国民党豫鄂皖"剿匪"总指挥，并兼任豫鄂皖三省边区督办。后来，他调任赣粤闽湘鄂"剿匪"军北路军第二路军第一纵队指挥官，不久接连升官，先后任第五路军指挥官和东路军前敌总指挥。1934 年 4 月，卫立煌晋升为国民党陆军中将，同年任闽赣浙皖边区"剿匪"军总指挥。

十年内战期间，卫立煌几乎一直充当蒋介石"剿共"的急先锋，进剿地区遍及全国十多个省。

## 抗日救国重新认识共产党

1936 年，卫立煌晋升为国民党陆军上将。为了胁迫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对长征到达陕北的红军再进行一次大围剿，蒋介石又委任他为陕甘绥宁边区总指挥，令其率国民党嫡系部队前往西北督战。由于西安事变的爆发，蒋介石妄图一举消灭红军的计划被扼杀在摇篮里。

在西安事变中，卫立煌与陈诚、朱绍良、钱大钧等国民党要员一起，被张学良、杨虎城扣押起来。卫立煌自知个人与红军打仗最多最狠因而积仇也最深，认为此次凶多吉少。但后来听了张学良亲自给他们讲同杨虎城举行兵谏的目的、经过，以及提出的八项主张，一生以孙中山忠实信徒自居的卫立煌认为，"确实遵行总理（即孙中山先生）遗嘱"，是他与张、杨的共同语言，同时认为，"全国一致抗日"也没有什么不对之处。因此，卫立煌的心情平静下来，开始认真阅读当时西安发行的报刊，思考一些自己过去从未考虑过的问题。后来，他对人说："西安事变是完全没有想到的，后来的结果更是想不到。好得很！当时要不是张汉卿（即张学良）这么一来，再打内战，中国早已被日本灭亡了。"

西安事变使卫立煌认识到继续"剿共"是没有出路的，他对自己的老对手共产党特别是共产党的高层领导人还缺乏了解。抗日战争的全面展开，为他提供了全面了解和认识共产党的机会。卢沟桥事变后，卫立煌就任国民革命

抗日战争时期的卫立煌

军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战区司令官为阎锡山）和南路前敌总司令，率国民党中央军进入山西参加抗战，组织指挥了著名的忻口战役。忻口战役打响之前，卫立煌和阎锡山在太原见到了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周恩来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卫立煌当时是该军的一个团长，因而曾在公开场合多次见过周恩来，但从来没有与他单独谈过话。这次周恩来一走进会客厅，卫立煌便立即起立行军礼，周恩来也热情地对他说："十年没有见面，变化真大，没想到我们现在又回到一条战线上来了。"周恩来向卫、阎二人介绍了中共《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主要精神，并就他们提出的调八路军一二九师到忻口参加阵地战的问题作了解释，认为当前日军向太原进攻，在正面布置一部分兵力阻挡他们是必要的，但不应将全部兵力都放在正面打阵地战，而应派一部分军队迂回到敌人后方打游击战。他说，八路军在决战上不是主力，它的拿手好戏就是在敌人后方打游击，所以不应将一二九师放在正面打阵地战。阎、卫二人觉得周恩来言之有理，就同意了他的意见。第二天，卫立煌就赶往忻口前线指挥战斗。

忻口战斗打响后，卫立煌指挥部队在南怀花与日军展开激战，双方对灵山制高点进行了反复争夺，死伤惨重。八路军为配合正面战场的战斗，在日军后方频繁出击。一二O师几度占领历代兵家必争之地雁门关，切断了日军后方交通线；一一五师也接连攻克察南冀西数座城镇，切断了日军的另一条后路；一二九师七八九团团长陈锡联则率部袭击了日军在阳明堡建立的临时机场，一举烧毁敌人 24 架飞机。八路军袭击阳明堡机场后，忻口战场很多天没见敌机来轰炸，使正面战场我军士气大振，连续发动反击。忻口战役结束后，卫立煌在太原再次见到周恩来，他高兴地对周恩来说："八路军把敌人几条后路都截断了，对我们忻口正面作战的军队帮了大忙。"太原失守后，卫立煌在临汾又与周恩来见面，并多次促膝谈心，使其对共产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 并肩作战"幸会"当年的老对手

忻口战役结束之后，卫立煌就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前敌总指挥。第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在名义上也归第二战区指挥，这使他有机会又结识了共产党军队的总司令朱德及其他高级将领。1938 年 1 月，蒋介石在洛阳召集第一、第二战区师长以上的军官开会。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和三个师长林彪、贺龙、刘伯承及副参谋长左权来到临汾，与卫立煌等一起前往洛阳开会。在去洛阳的途中，卫立煌与朱德同乘一节车厢，在亲切的交谈中，卫立煌对朱德的经历颇感兴趣。在卫立煌看来，朱德当年追随孙中山先生闹革命的经历，与他有相似之处；为了救国救民，朱德放弃滇军旅长、川军师长等功名利禄的高贵品德，更令他肃然起敬。洛阳会议结束后，第二战区的将领又一起回到临汾继续开会，研究下一步的作战方案。通过与朱德的进一步交谈，卫立煌对八路军坚持持久战和游击战的主张也表示理解，并对八路军在游击战中为什么能做到撒得开而打不垮感兴趣。朱德对这个问题也作了详细说明，使他对共产党的治军原则和政治工作有了进一步了解。

当时，十八集团军在临汾有一个办事处，离卫立煌的十四集团军总司令部不远，卫立煌经常到这个办事处来与住在这里的八路军将领交谈。一次，他在这里"幸会"当年在鄂豫皖边区进行"剿匪"时的老对手——原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此时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副师长）。两位"冤家对头"谈起了用兵之道，卫立煌对徐向前说，论打仗，还是你们行。徐向前则说国民党中也有不少人会打仗，并称赞卫立煌很能打仗。卫立煌却并不以为然，他谈起了那一次自己被红四方面军包围差一点当俘虏的事，两人哈哈大笑。

## 任人为贤请八路军战士当秘书

1938 年农历正月初一，卫立煌率十四集

团军的两个军长李默庵和郭寄峤,乘车从临汾来到马牧村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拜年,受到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等的热烈欢迎。朱总司令在致欢迎词时说:“我们集合直属部队干部,欢迎艰苦卓绝,在忻口战争中建立伟大功劳的民族英雄、抗日领袖卫总司令和李军长、郭军长。”对卫立煌指挥的忻口战役给予了高度评价。卫立煌在讲话中也高度赞扬了八路军,他说:“我知道八路军确实是抗日的,是复兴民族的最精锐的部队,尤其是抗日的方法和经验都非常丰富,希望以后不要忘掉责任,不要忘掉自己是中国最精锐军队的一部分去和日本作战。”演讲之后,他们一起观看了著名女作家丁玲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表演的《八百壮士》、《忻口之战》等文艺节目。听了朱德介绍西北战地服务团的情况后,卫立煌表示他也要组织一个这样的战地服务团,作为学习八路军经验的第一步。

回到临汾后不久,卫立煌看到了当时中共在武汉公开发行的刊物《群众》上刊登一篇题为《西线上的一个盛会》的通讯,该通讯详细报道了他春节访问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的经过。他看完后对其左右说:“八路军就是人才多,能打仗,能演戏,还能写文章,好青年都跑到他们那里去了。”其身边的刘秘书说自己认识这篇通讯的作者,他告诉卫立煌,这个署名为任天马的作者的真实姓名叫赵荣生,也是我们的安徽老乡,出身于有名的书香门第,其祖上曾有人中过状元。七七事变前赵荣生在燕京大学念书,日寇占领北平后投笔从戎,参加八路军才几个月。听了刘秘书的介绍,卫立煌感慨道:“为什么‘投笔从戎’不‘从’到我们这里来呢?”他又对刘秘书说:“我们需要这样的人。你去把他找来,聘请为我们总司令部的秘书。”

刘秘书赶紧找到了赵荣生,已经当了八路军的赵荣生知道这是一件大事,自己不能做主,就向所在西北战地服务团的党组织作了汇报。共产党方面对这件事非常重视,派赵的“顶头上司”丁玲与其谈话,做他的思想工作。赵荣生很不情愿地服从组织安排,到十四集团军总司令部报到。从此,赵荣生跟随卫立煌多年,成为其所信赖的忘年之交。改革开放后,赵荣生在卫立煌夫人的支持下写出长篇回忆录《回忆卫立煌先生》,由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5 年出版。

## 眼见为实访问共产党首府

经过与八路军官兵的多次交往,卫立煌很想到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参观访问,只是一时找不到适当的机会。1938 年 4 月,卫立煌突然接到蒋介石要他到洛阳去开会的电报,卫立煌认为机会到了,他可以以赴洛阳开会“途经”的名义到延安参观。4 月 17 日,卫立煌率由十几辆大卡车组成的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的车队,浩浩荡荡开进了延安,受到了延安军民盛况空前的热烈欢迎。随后,卫立煌一行在十八集团军参谋长滕代远等人的陪同下,拜见了共产党领袖毛泽东。会谈之后,毛泽东设宴招待了他们。下午,卫立煌一行又来到著名的抗日军政大学参观,受到副校长罗瑞卿和师生们热情接待。卫立煌还在操场上对抗大学生发表了抗战演说,表示今后他要继续与八路军亲密合作,坚持抗战,收复失地,并与学生们一起振臂高呼抗日口号。参观抗大后,他们还专程前往二十里堡,看望了被国民党晋绥军误伤的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抗大校长林彪。第二天,卫立煌等离开延安到达西安,他立即命令十四集团军西安办事处,发给了十八集团军步枪子弹 100 万发、手榴弹 25 万颗和牛肉罐头 180 箱。

1939 年初,卫立煌升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长官司令部设在洛阳,后又兼任河南省政府主席、省保安司令。在洛阳,他继续与八路军保持友好关系。原来,八路军曾要求在洛阳设立办事处,当时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的程潜不敢答应,就借口十八集团军归第二战区管辖,只同意其在洛阳设一个通讯处。卫立煌上任后,十八集团军随之改由第一战区管辖,他马上同意将十八集团军驻洛阳的通讯处改为了办事处。1940 年,他与朱德签订了驻军防区协议,还在百团大战中配合八路军与日军作战。

卫立煌与八路军交往，引起了国民党和蒋介石的不满，他与延安的通讯联系也被人告密。因此，1941 年夏，他被撤销河南省政府主席的职务，1942 年初又被撤销第一战区司令长官之职，调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同年 3 月，蒋介石任命卫立煌为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准备让其率部进入缅甸作战。他还未上任，就因有人告发他涉嫌通共，蒋介石又罢了他的官，使他只得在成都闲住。后来，由于中国远征军的长官与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美国将军史迪威不合，在征得史迪威将军同意后，蒋介石才重新启用卫立煌，于 1943 年秋任命其为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率部进军缅甸。1945 年 4 月，升任盟军中国战区陆军副总司令。

## 再次充当“剿匪”总司令 成为“战争罪犯”

抗日战争胜利后，卫立煌曾长期赴日、美和英、法等国考察军事。内战全面爆发后，蒋介石派其得力干将熊式辉、杜聿明和陈诚先后到东北指挥作战，均被解放军打得损兵折将。为了挽救国民党在东北的败局，蒋介石想起了卫立煌这位当年的“剿共英雄”，发电报催促正在欧洲考察的卫立煌回国。卫立煌回到南京，蒋介石与其多次谈话，勉励他到东北为“党国”挽救局面。1948 年 1 月，国民党南京政府任命卫立煌为东北“剿匪”总司令和东北行辕代主任。这是卫立煌所担任的职位最高的“剿匪”总司令，也是他最后一次为蒋介石充当“剿匪”总司令。但是，这一次卫立煌没有也不可能再次成为“剿共英雄”。国民党在东北以至在全国的败局已定，谁也无法挽回，卫立煌本人也完全知道这一点。在无法抗命的情况下，卫立煌在走马上任之前特向蒋介石告假回合肥探望 80 岁的老母，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架势。

卫立煌虽然是蒋介石当年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的老部下，可以算是蒋介石的嫡系，但他毕竟不是黄埔军校出身，更与蒋介石的奉化血统没有干系，因而实际上只是一个“嫡系中的杂牌”，与蒋介石之间一直存在着矛盾。他到东北后，一方面与蒋介石争夺指挥军队的权力，另一方面采取按兵不动的原则，固守沈阳等几个城市。解放军切断了沈阳与锦州之间的铁路以后，蒋介石一再催促卫立煌由沈阳出兵辽西，将主力撤至锦州，然后再退回关内，以避免被全歼。卫立煌则以共军惯于采用“围城打援”之术、国民党军已多次上当吃亏为由，迟迟不肯发兵。1948 年 10 月 16 日，解放军攻克锦州，全歼国民党军 11 个师，并活捉东北“剿总”副总司令范汉杰。10 月 17 日，驻长春的国民党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率部起义，另一位“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被迫投诚。10 月 18 日，蒋介石飞到沈阳，直接命令其得意门生廖耀湘率由最精锐部队组成的辽西机动兵团向西挺进，企图夺回锦州，杀出一条血路。结果，该兵团在黑山、大虎山一带被解放军全歼，兵团司令廖耀湘被俘。10 月 30 日，解放军已快攻入沈阳市区，蒋介石怕主帅被俘或投降影响士气，才派飞机将卫立煌从沈阳接出。

国民党在东北完全失败后，蒋介石把怒气全部出在卫立煌身上，于 1948 年 11 月 26 日发布命令：“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迟疑不决，坐失戎机，致失重镇，着即撤职查办。”卫立煌被撤职后，先闲住在北平。淮海战役打响后，他们一家曾乘乱秘密南下到广州，准备逃到香港，结果被保密局的特务发现，蒋介石知道后密电国民党广东省主席将其扣留，随即派飞机将他“接”回南京软禁。后来又准备将他送到台湾。1949 年 1 月，蒋介石被迫宣布下野，李宗仁就任代总统，撤走了守在卫立煌住宅外的宪兵，但保密局的特务并不买李代总统的账，仍留在其住宅内。不过，此时国民党必败的大局已定，其内部已是树倒猢狲散，卫立煌的副官乘机软硬兼施将特务们先后打发回家。1 月 30 日，卫立煌一家悄悄离开南京，乘车到达上海，登上一艘英国轮船逃到了香港。

由于卫立煌担任过国民党东北“剿匪”总司令，他的名字也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所通缉的 43 名主要战争罪犯的名单之列。因此，中华人

1956 年毛泽东宴请卫立煌(中)等

民共和国成立后,他虽然给毛泽东主席发去贺电,但对于回大陆仍有所顾虑,因而在香港居住了数年。后来,周恩来托人写信给他说:“你在太原结识的朋友欢迎你回来。”卫立煌见到信消除了顾虑,于 1955 年 3 月 15 日返回大陆,并发表了《告台湾袍泽朋友书》。1956 年,卫立煌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后来又担任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并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8 年 4 月,这位当年蒋介石的“剿匪总司令”,被毛泽东主席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 毛泽东宣布“准备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的见证者

卫立煌回到北京后,毛泽东主席、朱德副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等多次接见他。1957 年 4 月 16 日晚,周恩来总理在北京饭店举行盛大酒会,欢迎来访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毛泽东主席也出席了酒会。当周恩来将卫立煌介绍给伏罗希洛夫时,伏罗希洛夫笑着对卫立煌说,只要我们团结一致,我们就是无敌的。周恩来说,国共两党已经合作了两次。毛泽东紧接着说,我们还准备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第二天,《人民日报》以“毛主席说‘我们还准备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为标题,发表了欢迎酒会的新闻。这是共产党领导人首次公开表示“我们还准备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这一句具有高度战略眼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话,正是毛泽东当着卫立煌的面说的。

1960 年 1 月 17 日,卫立煌在北京逝世。1 月 20 日上午,首都各界在中山公园中山堂举行公祭卫立煌大会,由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周恩来主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民革中央副主席张治中致悼词。公祭大会结束后,又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了安灵仪式。这位前国民党“剿匪英雄”的骨灰盒,被安放在已故共产党著名领导人和解放军高级将领林伯渠、陈赓、李克农等人的灵位旁边。

(责任编辑 洛 松)

# 在白色恐怖下为李大钊送葬

● 安若

我国早期的共产主义传播者、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1927年被军阀张作霖下令绞杀，举世震惊。尤其是他被害后，停灵六年不能安葬，直到1933年春，在社会名流学者的奔走呼吁下，在进步群众的捐助下，终于在4月23日举行出殡和安葬。

我的母亲刘静君和表兄刘导生都是这次治丧工作的积极参与者，我得以跟随母亲耳闻目睹了这段经历，并在我家里保存了近七十年的李大钊出殡的照片。

李大钊原任北京大学教授，他牺牲后，校方每月发给家属50元抚恤金。这次治丧活动由地下党组织领导，由北京大学公开出面，校长蒋梦麟任治丧募捐委员会主任，胡适、沈尹默、刘半农、傅斯年、周作人等名流学者任治丧委员，其中一些人虽然在政治观点和学术思想上和李大钊是对立的（如胡适在"五四"时期曾和李大钊进行过"问题和主义"的争论，这场大论战相当激烈），但并没有影响他们之间的友谊，这时，胡适仍出任治丧募捐委员会委员。这一方面显示了李大钊高尚人格的魅力，另一方面也显示了胡适的学者风范。

在出殡前，我的母亲不断到李大钊家中照顾他的夫人和子女，并从微薄收入中捐了十元钱，买了一大幅白布，亲笔题写了慷慨激昂的挽词，只记得其中有这样几句话："你看他，从容不迫大踏步，走上断头台"。吊唁那天早上，母亲带着这幅挽幛，带着我和妹妹李慎，赶到宣外南下洼子浙寺，这是建在北京贫穷地区年久失修的一座庙，李大钊的灵柩就在这里停放了六年。当时灵堂正中放着李大钊的灵柩，上面盖着白布，前面放着花圈。他的两个幼子和两个女儿穿着白布孝衣，头上围着白布，跪在地上接待吊唁者，灵堂内外挂满了挽联，景象非常凄凉。记得其中一对挽联是两幅白布没有一句挽词，上款写着守常先生千古（注：李大钊字守常），下款写着张申府敬挽。张申府是清华大学的著名教授，20世纪20年代曾经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脱党。这幅特殊的挽联很惹人注意，一些人交口赞叹：真高！言外之意是讽刺在白色恐怖下没有言论自由。还有一幅挽联下款写着师范大学"徐氏三杰"，据说是三个女学生送来的。

在灵堂旁边的一间小屋里，李大钊的夫人哭得悲痛欲绝，这位有点乡土气的朴实的教授夫人比李大钊大七、八岁，而且没有文化，但李大钊对她很尊重，夫妻感情很好。母亲一边安慰她，一边不断流泪，吊唁的人络绎不绝，其中有不少名流学者，祭奠持续了一天。

第二天起灵出殡，杠夫抬着灵柩，后面是穿着白色孝衣的李大钊子女，我母亲和李大钊的长女李星华，陪伴李夫人坐在一辆马车中相跟着。送殡的人群举着一幅幅白色挽联。虽然沿途都有警察监视，路上的行人仍不断加入送殡行列，队伍越来越大，走到西单十字路口，队伍停下来举行公祭，行人有的停步默哀，很快围成一大片人群，阻碍了交通，警察过来干涉，驱赶人群，队伍继续向北前进，喊着口号，快到西四牌楼，恶名昭著的国民党宪兵三团出动，堵住路口，不许就地举行公祭，送殡的群众提出抗议，斗争趋向激烈，宪兵三团开枪抓人了！有个青年学生头上流着血被送上卡车，送殡成为一次真正的示威游行，一次争取民主自由的宣传。队伍向西前进，一直走到香山万安公墓，灵柩入土安葬。

这时，一位农民赶着驴车，拉来一块石碑，碑上刻着：革命导师李大钊之墓，落款是北平赤色互济会。警察过来干涉，不许将这块石碑立在墓前，群众坚持要立，母亲走出马车义愤填膺，据理力争，争的结果还是妥协了，这块石碑就随埋在墓穴的旁边。建国以后，才

被挖出，但已不是作为墓碑，而成为革命文物，陈列在李大烈士陵园第一展室内。石碑的题写人赫洵，当时是北平赤色互济会的秘书。是刘导生的师大附中同学，为了逃避反动当局的注意，曾住在我家。互济会的油印机、印章也存在我家的储藏室里。他也是本文中几张老照片的拍摄者。

李大钊安葬不久，李夫人也去世了。我的母亲主动承担起照顾李大钊四个子女（长子李葆华在周作人的帮助下早已逃往日本）的责任。我母亲可以说是李大钊的“人室弟子”，1920 年她进入北京大学旁听（当时不招女生），除听课外还和进步人士创办《曙光》杂志，是主要撰稿人之一，当时很引人注视。北大的教授中，她特别敬重李大钊，由男同学张国焘、宋维民陪同到李大钊家中拜见，李大钊特别把他的夫人介绍给我的母亲，我母亲敬重地称她为师母。以后我母亲又单独去过李家几次，有时还留下来吃饭，每次都加一个炒鸡蛋。1957 年春，为纪念李大钊牺牲 30 周年，母亲把这段经历写了一篇文章《记忆中的李大钊同志》，发表在《人民日报》副刊上。

李大钊作为北大教授有丰厚的收入，完全可以使家人过上很优越的生活，但是他把钱都用在帮助穷学生、工人和党的活动上了。他的家庭生活很简朴，我母亲看到他的小女儿李炎华穿着一件红布旧棉袄，就像一个乡下孩子。李夫人去世后，我母亲从家乡接出一位族嫂为四个孤儿管家。后来李星华在中法大学住校读书，无法照管弟弟，就请我母亲帮助解决这个问题。我母亲曾经在香山慈幼院女子师范部教书，和院长熊希龄较熟，终于顺利地把李大钊的两个儿子小五、小六送进免费食宿的香山慈幼院。熊希龄曾任北洋政府的总理，后主动辞职创办香山慈幼院。该院设有幼儿园、小学和师范部，收养了大批穷苦孤儿，为孤儿免费提供衣、食、住、学。在白色恐怖下，熊希龄收养了共产党领袖的遗孤，实在难能可贵。我母亲为此在报纸副刊上发表过一篇文章：《送守常先生二子人香山慈幼院有感》，呼吁社会各界关心烈士的遗孤。这张报纸副刊的主编是张太雷烈士的夫人王芷君，她是我母亲的好友，经常向母亲约稿。母亲又找来她的好朋友刘清扬帮忙。刘是妇女界的领袖人物，早年去法国勤工俭学，加人了中国共产党，并介绍她在天津《觉悟社》的同志周恩来人党。周恩来在几次谈话中都提到、感谢刘清扬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刘清扬特地同通州女师校长李云章通了电话，要求她接收李大钊的女儿李炎华入学，最后她操着浓重的天津口音，语重心长地叮嘱：“云章啊，这是你、我的责任啊！”李炎华也顺利进人免费食宿的通州女师。

这样一来，李大钊的四个子女就没有了家，节假日，他们常到我家聚会，李炎华来的次数最多。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七·七”抗战。（责任编辑　舒元璋）

# 刘少奇与何葆珍烈士

张飞虹

何葆珍是刘少奇同志的第一个革命伴侣。在此之前，刘少奇有过一次失败的“婚姻”。1916 年，那年他只有十八岁，正在长沙读书，母亲和哥哥感到逐渐长大的刘少奇愈来愈不安于家乡生活，总想到乱纷纷的外面去闯世界，于是由母亲做主，经媒妁之言，为他选择了一位本地周姓的姑娘为妻，并谎称“母亲病重”，将刘少奇从长沙骗至家中成亲。新婚之夜，刘少奇对周氏说：“对于这桩不合理的包办婚姻，我是反对的。我虽然同情你，但是我有我的事业，今后我们不能生活在一起，希望你能找到一条好的出路。”说完，刘少奇便调头睡自己的大觉去了。周氏闻言，潸然泪下，独自空坐到天亮。刘少奇一觉醒来，打起背包，又回了长沙。几年以后，刘少奇走上了从事工人运动的革命道路，周氏却因抑郁而成疾，英年早故，成了封建婚姻的牺牲品。

1922 年 10 月，时任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窿外主任的刘少奇，在长沙清水塘 22 号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的家中邂逅而遇他的第一位自由恋爱妻子何葆珍。

长沙清水塘 22 号当时对外是湖南第一师范附属小学校长（毛泽东的掩护身份）毛润之（即毛泽东）和夫人杨开慧的私宅，地处长沙市郊小吴门。刘少奇对此地并不陌生，他曾经就读过的宁乡驻省中学和湖南讲武堂都在附近。这里住户不多，环境清雅，大片的绿茵和菜地环绕着两泓碧波荡漾的池塘，一座曲径通幽的石板小桥把北侧三十米开外山坡下的一座灰色外墙的小院子和池塘连成了一体。

那次是刘少奇到毛泽东家中述职，两人谈兴正浓的时候，一串银铃般的笑声从屋外传来。毛泽东的夫人杨开慧和正在长沙自修大学学习的张琼领着一位漂亮姑娘走了进来。毛泽东对刘少奇说：“那是小何，何葆珍。在衡阳女三师读书，因为揭露校长欧阳骏治校无方和贪污腐化被开除了，无家可归，现在住在我家。”听着毛泽东的介绍，刘少奇下意识地打量了一下站在眼前的姑娘：中等个头，窈窕身材，头戴一顶编织精巧的贝雷式线帽，身穿一套合体的青色学生服，肤色白皙，眉清目秀，浑身上下透着灵气，面对陌生青年男子，虽显矜持却不乏刚毅的气质。在四目相对的一瞬间，刘少奇心中油然升起一丝欢喜。毛泽东又转过头来对何葆珍说：“这是从安源来的刘少奇，是莫斯科东方大学的留学生，刚刚回国不久。”望着眼前这位亭亭玉立的姑娘，刘少奇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只是对何葆珍微微点了一下头，随手指了指身边的一把椅子请她坐下。她对他的示意抱以微笑，礼貌地在一把椅子上坐了下来。

他们就这样相识了。在欢快的谈笑中，杨开慧半开玩笑地说：“少奇，小何很有学问，是女三师的高材生，现在在自修大学深造，是不是可以让她跟你一起到安源去工作，给你当个秘

书还行吧？”

两天以后，刘少奇办完了在长沙的工作，启程去安源，与他同行的还有何葆珍。临行前，毛泽东笑着劝刘少奇：“你陪小何在此地多住几天回去也不迟。”刘少奇坚定地说：“不，那里有许多工作等着我。”

何葆珍比刘少奇小四岁，1902 年出生于湖南道县城里的一个小商贩家庭。兄妹三人中她为长，下有一弟一妹。父亲虽然是个秀才，但只靠做小买卖维持生活，五口之家也难得温饱，妹妹很小就被父亲送给一个李姓人家作了养女。何葆珍自幼聪明好学，才华出众，12 岁父亲送她进了新办的县立女子小学读书。校长蒋松甫见她活泼伶俐，成绩优异，家庭又很困难，就以 20 亩地做抵押和以免费读书为条件，将她许配给自己的侄孙为妻。何葆珍始终不理会这桩婚事，只管一面跟随“婆婆”做家务，一面努力求学。小学毕业后，她以优异成绩考人衡阳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从此，踏上追求自由解放的广阔道路。

五四运动以后，毛泽东多次到衡阳进行革命活动，在学生中宣传新思潮，何葆珍受到很大影响，她说服父母卖了两间旧屋，凑钱还了蒋家的债，退了田契，坚决解除了那桩违心的婚约。1922 年，何葆珍在衡阳女三师首批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并被选为团支部负责人和湖南省学生联合会委员。

何葆珍成了安源少有的女秀才，她被安排在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子弟学校担任教员，同时兼俱乐部书报科委员和工人夜校的课。

何葆珍与刘少奇有颇多相似的人生经历，他们同为心存鸿鹄之志且在学业上才华出众者；同为备受媒妁之言束缚且敢大胆叛逆者；同为热血青年且找到了实现宏大抱负之路者；又一同踏上安源这块素有“江南小莫斯科”之称的工人运动热土，可谓志同道合，天配良缘。

1923 年 4 月春光明媚时节，刘少奇与何葆珍在安源工人俱乐部举行了简朴的婚礼。不办酒席、不收彩礼、不拜天地，只开了一个欢快的茶话会，和工人师傅们在一起热热闹闹地说了一阵话，就算办完了终身大事。

他们的家是简陋的。一张桌、几把椅子、一张床。他们的生活却是充实而温馨的。白天刘少奇奔走于矿上井下、俱乐部内外，何葆珍讲课、批作业、办理文书；晚上刘少奇还有忙不完的工作，不是外出开会，就是批阅文件，何葆珍也要顾及夜校工作，或者帮助刘少奇抄抄写写，只有到了深夜，才有一点属于他们两个人的时间。

一年以后，他们的儿子允斌出世了，白胖稚嫩的孩子给他们的家庭生活平添了无穷的

刘少奇与其次子刘允若

乐趣。但是，在允斌不到一岁的时候，党组织决定调刘少奇离开安源去广州工作，于是刘少奇让二哥刘云庭把爱子抱回湖南家乡抚养。丈夫心、妻子心、父母心，对这种骨肉分离自然是难舍难依。然而，为了革命、为了自己钟爱的事业，这又是心甘情愿的。

从 1925 年至 1934 年，刘少奇转战南北从事党的白区秘密工作，夫妻俩时分时合，难得在一起过上几天合家欢乐的日子。可是，两颗纯情相爱的心却一直紧紧地连在一起。他们生有二子一女，长女刘爱琴，次子刘允若。因为父母亲奔波革命、四海为家，子女们都各有一个辛酸的童年。

刘爱琴曾经这样回忆她的童年："为了革命工作，父母亲把我寄养汉口一个工运积极分子的家里。到了这家，奶妈刚生了一个男孩，她用乳汁和眼泪抚育着外面两个瘦弱的孩子。她心地善良，对我像对待亲生女儿一样，开始，党通过父亲的亲属和旧谊，经常给奶妈一些经济补贴，日子还过得去。几年以后，这个关系断了。生活的重担逼迫着奶妈，眼看我饿得皮包骨头，不得不在我七、八岁的时候，把我卖给武汉的一家去当童养媳讨碗饭吃。临走的前一天，奶妈像被剜了心头肉一样，哭了整整一夜。

1938 年，周恩来从武汉找回了刘爱琴。同年，长子刘允斌也由湖南老家被接到延安。允斌从安源离开父母以后，在老家由刘少奇名义上的"元配夫人"周氏抚养了一段时间。因为当时的家境每况愈下，稍一懂事，允斌就放牛干活，经受了不少生活的磨难。可是，当孩子们回到父亲身边的时候，他们亲爱的母亲已经在四年前为革命捐躯了。

爱琴和允斌回到父亲身边以后，先在延安保育小学学习了一段时间，第二年他们被送往莫斯科国际儿童院学习。1941 年 6 月，德国法西斯对苏联发动闪电式突然袭击，苏德战争爆发，此后，他们在苏联度过了很长时间的极其艰苦的时日，直到 1949 年和 1957 年才分别回国。爱琴回国的第二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系学习。毕业后，先在国家计委工作，后到内蒙古自治区支援边疆建设。晚年从中国人民警官大学教授岗位上离休。

二子允若在母亲被捕后，被送给一个贫苦农民作养子。十二三岁时流落上海、苏北等地，卖报、当学徒、拣破烂，吃尽生活苦头。1946 年才从苏北农村回到父亲身边。中学毕业后，入莫斯科航空学院学习。1960 年夏回国后，从事国防科技研究。允斌和允若在"文化大革命"中双双蒙难。

刘少奇和何葆珍的诀别在 1932 年冬。这是他俩都不曾想到的。那年，刘少奇化名唐开元离开上海，经广东汕头进入位于江西省南部和福建省西部的中央革命根据地，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委员长。何葆珍留在上海担任全国互济会负责人兼任营救部部长。她四处营救革命同志的行动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1933 年 3 月，敌人逮捕了她，并将她押解到南京第一模范监狱。在狱中，她英勇不屈，坚不吐实。1934 年在一个秋风萧瑟的清晨，32 岁的何葆珍昂首挺胸走向南京雨花台刑场。

何葆珍为革命远行了。刘少奇把对她的爱化作对敌人的仇恨，化作革命的力量，化作无尽的思念。

1945 年 3 月 22 日，刘少奇为《革命烈士传》写下了以下文字，永志哀思："何葆（宝）珍，女，湖南道县人，湖南衡州第三女子师范学校学生，1922 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后转入党。因反对学校当局的学潮被开除学籍，1923 年到安源工会所办之工人子弟学校教书，是年与我结婚。和我一道参加过长沙、上海、广州、武汉、天津、满洲等地党的、工会的、妇女群众的许多工作。生二子一女，于 1933 年在上海被国民党宪兵逮捕入狱，被判徒（刑）15 年，由南京第一模范监狱执行。因她与狱外党的组织发生联系，被发现，第二次判决在南京枪毙。"

每个时代都有其特定的时代精神，"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是刘少奇与何葆珍所处的那个时代的精神，而刘少奇与何葆珍的这段婚姻生活恰恰是这种时代精神的真实写照。

（责任编辑　洛　松）

# 不能遗忘的费巩

● 傅国涌

费巩是谁？今天的人大概都比较陌生了。浙江大学有个费巩亭，但了解费巩的学子恐怕已寥寥无几。我最初知道费巩还是在《毛泽东选集》的注释里。到图书馆只能借到几本介绍费巩的书，却借不到费巩写的书，但仅仅凭这些书的介绍就让我对他肃然起敬。他是20世纪历史上不该被遗忘的人物之一，他和闻一多、李公朴一样被那个黑暗时代的残酷的政权谋杀了。

1946年初，中共代表向执政的国民党要求立即释放的政治犯名单上就有费巩的大名，可惜那时候他早已尸骨无存。和他同时列名的还有叶挺，赫赫有名的北伐名将；廖承志，国民党左翼领袖廖仲恺的儿子，共产党员；张学良，大名鼎鼎的"少帅"，东北军阀张作霖之子。和他们几个相比，费巩的结局最惨，也最不为人所知。因为他并不是什么呼风唤雨的将军、不是显赫的政治人物，他不过一介书生而已。

1905年出生的费巩，毕业于复旦大学政治学系，年轻时参加过五卅运动，后留学英国牛津大学，1931年回国，先在母校任教，1933年以后一直在浙江大学当教授，教他心爱的政治学。1945年3月5日"失踪"，在重庆集中营被害，连尸体也被毁了，终年40岁。

费巩一生研究政治学，对宪政民主，尤其对英国和西欧各国的政治制度有深刻的认识。他在30年代写的《英国文官考试制度》、《比较宪法》等论著，至今还不失参考价值。同时，他认为一国有一国的国情、政情，不能盲目模仿别国，他在浙大的讲稿如《中国政理》、《中国政治史》、《中国政治思想史》，关注的就是中国的遗产，他花大量心血清理这些政治遗产的目的绝不仅仅是为了教学的需要。

费巩一生坚持不当国民党的官，多次拒绝加入执政的国民党。1940年竺可桢校长请他出任训导长，他提出了"不入党"的条件。上任后，他积极推行、改进在英国行之有效的导师制，导师制无疑对学生的人格培养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他支持学生创办了生气勃勃的《生活壁报》，充分发挥学生的热情，批评时弊，关心国事，被称为浙大的"民主墙"。费巩先生被害后，学生们为了纪念这位好教授，把《生活壁报》改为《费巩壁报》。有了竺可桢这样的校长，有了费巩这样的教授，抗战时期的浙大才充满了民主、自由的空气，被誉为"民主堡垒"。

1940年，面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高压统治，他连珠炮一般公开发表了一系列锋芒毕露而又闪耀着政治智慧的政论和讲演——《民主政治与我国固有政制》、《实施宪政应有之政治准备》、《王之反对党（即论英国之政党政治）》、《论制宪之原则》、《英国议会政治》、《论政治风气之转移》等，发挥他作为一个政治学教授的专业知识和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为这个国家和它的人民仗义执言，也深深地触怒了当权者。

1945年初，他在应邀赴复旦大学举办为期一年的"民主与法制"的特别讲座以前，计划对当时的人事、考试制度做一番实际考察，为此他一月中连日出入交通部、财政部、外交部、教育部、考试院，接触了许多国民党的上层人物。他调查的要目乃是有关国民党的腐败政制和工作效率，触及了当政者的禁忌。

1945年2月，费巩在《重庆文化界对时局进言》上签名，这份时局进言由郭沫若领衔，有数百名著名的知识分子签名，向执政的国民

党要求召集各党派会议，组织联合政府，废除一切限制人民活动的法令，取消党化教育，停止特务活动，释放一切政治犯和爱国青年等。当局气急败坏，私下做了很多工作，让签名者声明反悔。费巩是无党无派的自由主义者、民主主义者，这样费巩自然是他们做工作的对象，但他断然予以拒绝，因此才引来杀身之祸。

历史应该永远记住——1945年3月5日凌晨，发生了著名的“费巩失踪事件”。当中共代表向国民党提出“立即释放叶挺、廖承志、张学良、杨虎城、费巩”时，40岁的政治学教授费巩先生早已惨遭杀戮，他的尸体都被丢入硝镪水池“化”掉了。

和费巩一样留学西方学政治学的人中，像他那样敢直面蒋介石独裁政治的当时也不只是他一个人，罗隆基、王造时，张奚若等都留下过辉煌的记录。但被国民党特务暗杀，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只有他一个。他的死甚至也不像闻一多、李公朴等那样广为人知，被写进各种版本的历史教科书中，因为他没有组织，不是共产党员，不是民盟的成员，连左倾也算不上。他只是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教授。

读他的文章痛快淋漓，他运用自己的政治学知识抨击国民党的专制腐败，把不可一世的国民党当局批得体无完肤。遗憾的是他被杀害半个多世纪了，未见过他的文集、他的专著出版。就是在他生活、工作了12年、他心爱的浙江大学，也只有一个费巩亭默默地立在校园里，没有多少学子对他有真正的了解。

我总是忘不了费巩，他的思想、他的人格、他的学问，他被独裁政权暗杀，毁尸灭迹的残酷一幕。他这样一个教授，一个有自己独立政治见解的公民，只因他反对国民党一党专制，不向权势低头，不向恶势力屈服，竟被国民党蒋介石的特务残酷杀死。

费巩不应该被遗忘。1979年，一批三四十年代毕业的浙大学生曾发起过一次对费巩的纪念活动，使更多的人了解费巩。我为20世纪曾有过费巩这样的知识分子感到骄傲。

（责任编辑　吴　思）



# 劫后传书

## ——作家刘白羽

**征得徐光耀同志同意，本刊今日发表徐光耀今年4月3日给刘白羽复信及今年3月29日刘白羽给徐光耀信。两封信写得极好。背景是1957年那场反右派斗争中的历史瓜葛。那时刘是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作协反右斗争的领导成员，徐是专业作家。徐被错划成右派分子，遭遇到想象不到的折磨。40多年后，徐光耀反思历史，写成《昨夜西风凋碧树》长文，先在2000年1月号《长城》杂志发表，后在本刊2000年第4期、第5期刊载，读者反映良好。**

**刘白羽同志看到此文，给当年受迫害的徐光耀写了这封痛切自责、读来令人十分感动的信。徐光耀的复信，不仅表达了对于刘白羽同志的谅解，重新唤起了对刘的尊重，而且作了深沉的历史反思，他披肝沥胆地指出：反右派斗争是时代性体制性的一场悲剧，都不是个人之间的恩怨造成。他说：“如果您我调换了位置，我整起您来也会毫不手软的。”**

**本刊今日发表这两封信，目的仍是以史为鉴，提醒人们吸取历史的血泪教训，万勿重蹈覆辙。可幸的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事求是的正确路线重新确立并发扬了，像反右派那种时代性体制性的错误，我们大力纠正了，而且今天越来越注意主动地去避免。**

**——编　者**

# 泯恩怨
## 与徐光耀通信

## 刘白羽致徐光耀信

**光耀同志：**

友人传了一册《长城》给我，我立即把《昨夜西风凋碧树》读完。字字血泪，正义之言鞭挞着我的心灵。你在那历程中所承受的痛苦，都是我的罪孽所造。光耀同志，我羞惭，我恸心，我无颜求你原谅，但我要说出我永恒的遗憾，包括在那失去理智时代，我对你不礼貌的行动，我只有在远处向你深深的谢罪、谢罪。

光耀同志！其实我是敬重你的，因为抗战时，我到过冀中、冀南，我多么希望有一本血与火的书，终于读到你的《平原烈火》，你为受折磨的人民，你为枯骨如霜的死者，发出忠贞之声。只有真正的共产党员，才能写出这样崇高的书，我向你致党的敬礼！

如果可能请出版社给我一本2000年一期《长城》，因为手上这一本还要还给（人家），我没有（你的）详（细）地址，只好寄出版（杂志社），怕有遗失。我的地址：北京东城××街××号××室。

**刘白羽**
2001年3月29日

## 徐光耀复刘白羽信

**刘白羽同志：**

接到您3月29日信，很感动——我们全家都很感动，一下子使我对您的思想品德有了新认识，纠正了我以前存留的某些偏激看法。您是一位有党性的高尚长者。

但您对待自己仍然过分了，过错是有的，谈不到“罪孽”，也无须“谢罪”。以往的种种不幸，都不是您我之间的恩怨造成，那是一个时代、一种体制所造就的错误，个人可以承担某些责任，但不能承担主要的、更非全部的责任。个人是承担不起的。您我都有对党的无可怀疑的忠心，我们都是尽力按照上面来的精神行事的，悲剧是这种忠心到了分不清是非的地步，如果您我调换了位置，我整起您来也会毫不手软的。所以，从个人说，最大的教训之一是迷信。

在战争年代，我读过您不少小说，那个在马背上飘着一只空袖筒驰骋疆场的政委形象，至今记忆犹新。那时我们的心贴得有多么紧！可惜，后来的“阶级斗争”把我们“分裂”了。造成这种惨剧的原因是一定要深刻总结的，我非常赞成一位诗人说的话：“在历史的长途上，个人的恩怨得失自不足道；而血肉换来的经验，却该认真记取。前者宜粗不宜细，后者宜细不宜粗。”

谢谢您的来信，它不仅启发我想了一些问题，也使我对您更加敬重了。以超过八十的高龄，能睁眼面对以往的过失，勇敢而彻底地否定它，这比起那些以发表假日记、假书信来美化自己的人来，真真高下自分，不可同日而语的。衷心祝愿您抚平创痛，保重身体，健康愉快。

致

敬礼！

**徐光耀**
2001年4月3日

# 回应李普《悼胡绳》的信

● 李慎之

李普同志：

你《悼胡绳》的文章（编者注：李文在本刊2000年第12期上刊载）收到了。拜读了两遍，觉得你援用蔡仲德先生评论他老丈人冯友兰先生的话，认为胡绳一生也有“早年实现自我，中间失去自我，晚年又回归自我”三个阶段，已经对胡绳作了全面确切的评价。你要我再补充点什么，我实在已经没有什么可以补充的了。不过，你的文章启发了我，又使我再反复思索了一下，现在在你的评价的基础上再把我所亲历亲见的事多说几句，也许还不为辞费。

我认识胡绳比你晚了六年，是在1946年初进重庆《新华日报》的时候，也是先认识他的夫人小吴（全衡），我们连桌办公。那时胡绳好像已去北平、上海，只因家在重庆，才偶然回来。他一向是一个寡言少语的人，同我又没有什么工作关系，因此在当时白区党内的“才子”中，我同他的关系远不如同乔冠华、陈家康那样密切。

那年秋天，我随周公撤回延安，乔冠华、胡绳则去了香港。1949年以后，他们都到了北京，但是因为工作关系，在1957年我被划右派以前同乔冠华和陈家康倒是常见面，同胡绳则一别三十余年，直到1980年我作为“中央写作小组”的“留守人员”，住进毛家湾时才又见面。毛家湾原来是林彪的宅子，当时已是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办公地点，胡绳在那里当副主任，我们的办公室相邻。他温雅如故，毫无架子，然而大家刚刚经过十年浩劫（我还要再加十年），似乎也没有多少话可说，话题往往是那里存放的陈伯达、康生搜刮来的一些书画。就是从这些对共同爱好的交谈中，才似乎慢慢恢复了过去的相互信任。

那个时候，胡绳似乎还背着一个“凡是派”的名称。他是从来不会替自己洗刷的，反而对我说：“我当时思想确实糊涂，是邓力群同志给我打了招呼，才猛醒过来的。”

我们比较接近是到1982年胡乔木把我俩都调到玉泉山为“十二大”准备文件的秀才班子里去以后。两人比屋而居，他带有聂绀弩的《三草》诗集，时时吟哦，引得胡乔木也知道了聂老的千古奇诗而专门去拜访了一次，还请人民出版社为他出版了《散宜生诗》，并且亲自作序揄扬。那时，胡绳还送了我他重印的《枣下论丛》和刚出版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不过我的历史观当时已大有变化，翻了翻，觉得并无新意，也就没有如当时权威人士号召的那样去认真学习了。

1985年他任社科院院长以后，我们算又是同事了，但是来往仍然很少。一是因为他是领导，二是分工不同。不过我们的办公室挨着，他偶尔也会到我屋子里坐坐。刚上任时，他颇为学术研究工作该怎么做而苦思焦虑。我曾给他提过两条意见：一条是“坐得冷板凳，才吃得冷猪肉”；一条是“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前两句是老共产党员、历史学家范文澜的名言；后两句胡绳当然知道是曾挨过全民大批判的胡适说的话。这两条意见，我提的都不很正式，他也不置可否。但是我注意到，在以后的党组会上，他都委婉地提出过类似的方针。事实上，在当时的环境下，恐怕这也是学术工作唯一的出路。

1988年，他当选为第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一下子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了。我怕自

胡 绳

己秉性难改，言行不慎而连累他，交往也更疏远了一些，不过每年或者隔年春节，总是到他家里拜个年而已。

现在世人都知道胡绳在 1999 年初发表的《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再评价》是他晚年深入反思的代表作。以至于有人猜测胡绳的反思是什么时候开始的。这个问题我当然也答不上来，但是有一件事给我的印象极为深刻。那是在 1987 年反自由化的高潮中，胡绳（可能是奉命）在《人民日报》头版发了一篇当时可称是传诵一时的大文章：《为什么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它得到了中央的表扬，认为是解决了青年学生的思想问题。社会上也是一片赞扬声。记得在一次党组会上，有人称赞这是“中国社会科学最高水平的表现”。就在这个时候，胡绳忽然扭过头对坐在旁边的我说：“其实我不过只回答了一半的问题，还有一半问题根本没有谈呢！”我当时也没有很在意，会后细细琢磨，胡绳的话是不错的。他的大块文章确实回答了中国共产党如何发扬蹈厉，以新民主主义为号召，以统一战线为依托，以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打败了反动腐败的国民党，建立了新中国。但是当时许多青年心中怀疑的还有：为什么新中国不实行新民主主义而实行社会主义，不实行市场经济而实行计划经济，不实行共同纲领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还有，为什么会有反右派、大跃进、大饥荒，以至“文化大革命”这些大悲剧呢？这许多明摆着的问题，胡绳并没有回答，当时的中国也没有一个人能回答。

我越想越觉得：在胡绳这样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身上，理性的力量何等强大。

也许，胡绳的反思就是在写《为什么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这篇文章时开始的。

1989 年年底柏林墙被推倒到 1991 年的苏联瓦解改制，大概都进一步对他有所触动。

1994 年 5 月，曼德拉领导南非黑人解放运动成功，南非废除了种族隔离制度，白人种族主义者和平交权，曼德拉也当选总统。1995 年春节，已经退休的我去给他拜年的时候，谈到这件事。他说道：“现在看来，民族问题或者种族问题所造成的人的对立与仇恨比阶级问题更加深广，然而就是这个问题也不是不可能和平解决的。”就我所知，南非问题的解决在国内确实也引起了一些人对毛泽东所说“民族问题说到底是阶级问题”这句话的怀疑。胡绳也是想到了这一层。这个想法在他后来因病住院的时候大概也曾同前来探病的社科院同志说过。结果传出了两个版本：一个是上面提到的；另一个则说，“胡绳同志指示，今后研究国际问题一定不要离开阶级分析。”真是南辕北辙，大相径庭。第二种版本后来传到香港，立刻有人攻击胡绳成了“左王”。来年春节，我又去给胡绳拜年的时候，一进门他就问我“有什么新闻？”我说：“你现在成为新闻人物了。”他颇为惊讶。我把原委本末一讲，以为他会不高兴，因而建议他把他原来的意见正式传达一遍，以正视听。不料他竟面无愠色。只是淡淡地说：“随他们说去吧！”

我起初还有些纳闷，后来仔细一想，胡绳一辈子是一个学者，虽然做了十多年的院长，

但是从来没有发过什么指示，要求别人传达。另外，他更不愿意以自己的地位来同误传了他的话的人立异作对。他就是这样一个人。

我同意吴江同志说胡绳“虽是高官，并非政要”的话。他逝世以后，我听到社科院的干事、工友、甚至司机的评论，都说“胡绳是一个本分人”。“本分人”这个说法不但使我感到新鲜，而且感到亲切。当今的世道，以胡绳这样的地位、资望，得到的评语，竟不是“炙手可热”而是“本分人”，实在是很高的赞誉了。

我和胡绳是一个支部——社科院办公厅支部。成员可以截然一分为二，少数是我们这样七老八十的人，多数是小青年。我们退休以后，开会一般是很少的。记得有一次开会时几位青年同志称胡老为“无产阶级革命家”，要他给大家讲些当年的革命事迹，进行革命教育。不料胡绳立刻十分不自在起来，声明自己不过是一个“三八式的党员，谈不上老革命。同志们千万不能称我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我也帮他说了几句话，要同志们不要乱叫。因为在我心目中，虽然胡绳参加革命在抗战开始以前，但是只有 20 世纪 20 年代或者 20 世纪 30 年代初参加革命，而且当过七大、八大中央委员的人才有资格称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当今健在的老革命当中能够当得起这个称号的人已经屈指可数了。胡绳是不会也不愿僭越的。不料 2000 年 11 月胡绳逝世以后，消息传来，第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家……胡绳”如何如何，大出我的意外。不知胡绳地下有知，作何感想。

胡绳喜欢作格律诗，而且作得不错，这点我是 1982 年与他一起随胡耀邦到四川、湖北视察时，参观隆中诸葛亮草庐和襄阳米芾祠堂时人家拿出纸墨笔砚，要求我们留下墨宝时发现的。每到这种要命的关头，像我这样的人总是竭力退避，以免出乖露丑，胡绳则只要沉吟有顷，援笔可就。后来钱钟书也告诉我，他没有想到胡绳能诗。钱先生眼界高，要得到他的赞扬是不容易的。他论诗分唐宋，细入毫芒，但是他虽然宗唐，自己作起诗来，却总是脱不了宋人“以学问的为诗”的味道。我曾问过他为什么，他说作诗要靠天分，勉强不得的。他对胡绳的诗却认为出语天然而风致嫣然，求之时人，实属难得。诗是灵魂的一扇窗子，从胡绳的诗也许比通过他的学术论文更能了解胡绳的为人。

还有一件事，“文革”末期毛主席批评郭沫若“百代皆行秦政制，十批不是好文章”以后，风传郭有一首七律上呈毛主席。开头就说：“读书卅载探龙穴，云海茫茫未得珠……”，以后郭才能免于批判。原来这诗是胡绳在干校自述学习心得所作，不知为何误传成郭沫若的了。胡绳自己在诗集中注明这件事，不知你是否知道。

上面已经说过，你对胡绳一辈子“实现自我，失去自我，回归自我”已经作了全面而正确的评价，但是你好像还希望老天爷能假以年寿，使他的反思更深入，作出更大的贡献。这当然也是我们大家的希望，但是我要说的是胡绳所做到的实在已经很不容易了。古今中外，有几个人到了七十、八十还能反思，还能“尽弃所学而学焉”呢？西方哲学家认为，未经过反思的人生是没有意义的人生。这话是经过冯友兰介绍到中国来的。冯先生一肚子学问，然而到了八十岁才有机会开始反思。中国古代的圣贤从孔孟颜曾起，“吾日三省吾身”的工夫是有的，“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也是有的，但是在经过三十年的信仰，三十年的大惑以后，还能认真反思，如冯友兰、胡绳这样的，以我之陋，实鲜闻知。胡绳作为一个八十岁的老人，不容易啊！

这段话是本着“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的意思说的。巧的是胡绳本来姓项，叫项之迪。这是住在我楼下的吕叔湘老人告诉我的。吕老是胡绳在苏州中学的老师。胡绳当院长后，曾两次来看过吕老，执弟子礼甚恭。

就写这些了。你和胡绳同年，但身体好得多，我比胡绳小了五岁。胡绳的反思只能由我们这些人和更年轻的人继续下去、深入下去了。是唯后死者之责，何敢辞！

2001 年 2 月 21 日

# 一个晚辈学人眼中的胡绳

● 李向前

胡绳是我最敬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之一。1982年后，我有幸在他领导下工作。那时，我们是一群刚从学校毕业的大学生，对胡绳的大名是熟知的。中央任命他来当党史研究室的主任，大家自然想快些一睹风采。可是得见其面时，才知道他是个胖胖的和蔼的老头。当时，我们一般尊称他胡绳主任，有时也不惮冒昧叫他老胡。他总是慈祥地笑着作答。

得知胡绳大名，是由读他的书开始的。记得在做知青的时候，就读过他的《帝国主义和中国政治》一书。但那时患的是“缺书饥渴症”，有书就抓住读，所以印象不深。进大学读了历史系之后，这本书才真正引起我的敬佩。佩服的原因是，他在书中使用的史料，都是最常见的，没有什么秘藏。但整个分析却出乎别人之上。在历史系学生看来，这就是造诣。这本书极为精确地阐明了由于帝国主义侵略的一步步加深，近代中国社会内部所发生的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可在写作此书时，胡绳只有二十多岁。

史学界有个传统或者说学术意识，那就是谁占有的史料多，谁的学问就好。在一般意义上这当然并不错。但事实上，任何史学研究，不仅需要扎实的史料，更需要思想和观点，需要那种在融会贯通了历史现象之后所提炼的思想。因为没有思想和观点，再现的历史也就没有了灵魂。从《帝国主义和中国政治》这本书里，我得到一个深刻的印象：胡绳是一位特别以思想见长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他的突出特点，就是每一次下笔，都是在鲜明和深邃的观点指导下。

后来有幸在胡绳领导下工作，我的上述感觉自然日渐加深。《胡绳文集》我翻阅过多次，每一次都有如同一位思想者对话。他给你以指点，他教会你许许多多的东西。晚年胡绳，学术思想越加精湛，对历史现象的分析越加透彻。他真理在手，勇猛前行。他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研究，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

为了纪念胡绳主任，我愿意写下这样几点感想：

首先，胡绳同志晚年的研究，决不是为学问而学问，而是有着强烈的现实针对性，特别的着眼点，为改革开放大局做理论阐释。他多次说过，做历史研究，实际上是由于现实的需要。他说，党史研究要注意现实生活中提出的问题，包括实际问题、思想问题和理论问题。党史研究如果只是看过去，无目的考据某些历史事实，而不注意当前的问题，党史研究就不会有生命力。据我观察，他晚年的所有研究，都是发应所发，有的放矢。

例如，在1994年西安的一次学术会议上，他讲了这样一件事：从八大到反右，仅仅不到一年的时间，党的总路线就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其中的深层原因究竟是什么?他分析说：除了那些国际国内的特定诱因外，恐怕很重要的一条，是我们对八大所提出的路线，并没有想得那么清楚，认识得那么透彻，结果一有小的波折，就对总路线发生动摇。胡绳讲这番话是在1994年9月。当时，小平南巡讲话已经发表。大家知道，20世纪90年代初，由于国际、国内出现的风

波，一些人曾公开对改革大局产生怀疑。胡绳同志讲这样一个心得，用意就在于指出，如果不对党的基本路线有一个深入的认识，那么，任何小的波折和历史“插曲”，都可能动摇我们改革的决心，回到老路上去。历史的经验具有极大的参照作用。我当时真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受。因为八大的历史，我们是熟悉的。而我们身边的事情，又是亲身所历。但我们却缺少将两个历史现象联结起来加以对比说明的智慧。我似乎一下摸到了历史滚动中的那些内在逻辑，明白了历史研究对解释现实、发人警醒的功用。

其次，在胡绳晚年的研究中，更有了一种探讨真理的无私与无畏。人们会注意到，自1994年胡绳同志在《人民日报》发表长文《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之后，围绕着他提出的一系列观点，争论几乎没断过。特别是胡绳同志的文章《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世纪之交的回顾和前瞻》、《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发表后，争论之声更是不绝于耳。百家争鸣，原本是繁荣学术的必由之路。我相信胡绳也并不认定自己的观点不能讨论。但是，的确有人在使用极端政治性的语言，给文章扣上吓人的大帽子。这就使争论陷入了一种尴尬的境地。

我个人对这些滥加的政治帽子是反感的。因而写了文章，来反驳这些过分的政治指责。同时，我也认真地读了胡绳同志的文章。这些文章除了给我以深刻的理论启发之外，更让我钦佩的，是胡绳晚年探索真理的那种勇气。胡绳的文章，的确触及到了中国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构想中最为本质的东西。但是是说理的，是经过大量实践总结出来的道理；同时，又是睿智的，把我们通常见到却未能发掘出来的现象，做了深入研究。晚年胡绳，本来完全可以不去触及那些所谓的禁区（其实也是人为设置的），像人们说的那样，“保持晚节”。但他显然没有那样做，而是勇敢地、率直地发表了自己的观点。这是为什么？值得我们晚辈学人三思。

当年，列宁在庸俗生产力论者的围攻中，也曾经同样毫不畏惧。他特别告诫布尔什维克们，在一个经济欠发达的国度中，通过革命所获得的社会主义，必需在获得政权之后，把发展社会生产力放在最为重要的位置。否则，这个以工人鲜血换得的政权，将无法生存。胡绳同志在他的文章里，实际讲的正是这样一个道理。尽管“民粹主义的色彩”这个用语可以商榷，但胡绳同志在阐明他的观点时，恰恰重复了列宁，发挥了列宁。如果不是怀着不良想法，一个研究者是不应该误解胡绳的。纵观胡绳所有关于党史的论著（他把他的九厚册文集戏称为“一小堆书”），我们难道可以得出胡绳是在诋毁革命、反对革命的结论吗？晚年胡绳，以他最后一丝气力，向人们讲解一个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其勇气和献身精神，难道还有什么疑问吗？

我们经常谈论党性和科学性的统一问题。但往往人们在自己的研究中，会遇到种种困惑。我认为，所谓党性，就是实事求是性；而所谓科学性，其本质也是实事求是性。这样，实事求是便应该成为科学性与党性间可靠的联结点。离开了实事求是，我们的一切理论、一切宣传，就失去了立足的基础。但做到实事求是，并不是一件容易事。它需要极为精细的分析、考察和判断，需要高度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同时，需要一种精神，一种在任何压力之下仍然固守真理的勇敢精神。我认为，晚年胡绳，真正做到了科学精神和党性的完美结合。

最近读到一位学术界前辈纪念胡绳的文章。文称胡绳是个“本分人”。我觉得这个“评价”很有意思。在中国的伦理价值体系中，“本分”似乎不是一种非常高的“境界”，但真要做到却很难。也就是不事张扬，老老实实做事。更深一步说就是比较真实，不搞遮掩藏盖，一是一，二是二。没有虚的。胡绳晚年官居高位，可在我们眼里，他最本色的的东西，仍然是一个孜孜以求的学者，一个不为名誉虚饰所动的勇于探求真理的人。如果说“本分”是指这样一种境界，那我们这些年轻人，在自己的学术历程中，还真是要甘守一份“本分”才是。

（责任编辑　洛　松）

# 留苏岁月

● 程斯煌

## （一）

1955年9月份，我们上千名留学生身穿国家发的"特别包装"——出国服，西服革履，从北京乘坐专列火车，沿途经沈阳、长春，最后从中国满洲里出境开往苏联边境小城赤塔，经苏联边防海关检查后，火车经西伯利亚直奔莫斯科。

载着我们这些学子的专列驶入苏联境内后，列车员统统都换成苏联姑娘。餐车上的饭菜也统统变成了俄国式的西餐。由于烹调方法和饮食习惯的不同，一进餐车，就闻见一股膻味、怪味。列车奔驰在西伯利亚的荒原上，很少见到人影，与在中国的景象截然不同。每在大站停留加水加煤时，我们都走出车厢，在月台上列队做操，以消除长途乘车的疲劳。由于我们的队伍整齐划一，颇为壮观，引来了不少好奇的苏联老百姓围观。这些苏联老百姓的衣着、谈吐，虽不像电影上那样的华贵高雅，但也粗壮朴实，豪爽可亲，从眼神中可以看出他们对中国人非常友善；当问到我们到哪里去时，我们说"到莫斯科，我们是学生，向你们学习来了！"他们个个伸出大拇指说："马拉茄子(好样的)！我们还没去过首都莫斯科哩。"

车厢里的列车员都是年轻的苏联姑娘，在苏联境内五天五夜的车厢生活，我们相处得非常好，因为大家为了学习俄语口语，个个都愿同本车厢的列车员谈话、打交道。我们抢着帮她们干活，时不时还向她们赠送些小礼物。这些列车员碰上这样热情的乘客，高兴不已，到达终点站同我们分手时，她们个个泪流满面，依依不舍。

我们到达莫斯科以后，大使馆早已为我们作好准备，由在各高校学习的中国老留学生，将我们领走分赴各高校。学校及专业的分配方案，在出国前已宣布，我是国家统计局派的，所以分配在莫斯科经济统计学院的计算机系学习。

本文作者一九五七年在莫斯科

那时苏联高校均已开学，我被领到班上，交给"班长"——一位名叫拉丽莎的苏联姑娘。计算机系近两千学生中，外国留学生仅仅两人，除了我还有一个匈牙利姑娘。我立刻跳进了苏联人的海洋里，听到的、看到的、接触到的全是叽哩咕噜的俄语，我在国内虽强化学习了一年俄语，并没有能扫除我的学习障碍。上数学、制图这些公式多、图像多的课还能应付；上哲学、经济学这些教授的课，我就发怵。只有下课后借苏联同学的笔记并结合教科书，回到宿舍抄笔记、查字典，以几倍的时间来消化当天的课程，真是受够了"洋罪"。但中国学生的勤奋是有名的，每到礼拜六和礼拜天，图书馆阅览室里，座无虚席，全是黑头发的中国学生。功夫不负有心人，一年下来，我们基本度过了语言关。

## （二）

我所学的专业——计算机，在统计部门实际是交叉学科，对学生的要求是：既懂得经济统计和企业管理知识，又要掌握计算机科学技术。所以我们学的课程比较多，学习任务很重。好在经济、统计、政治经济学、哲学和数学等，我在人民大学都学过，有一定基础，花的功夫不大。

我们这个系，是学院的一个大系，学生近二千人。女生占三分之二强，究其原因：从专业工作特点看，适合女性担任；从当时苏联人口构成看，女性就是比男性多。据调查，苏联学生中约有三分之二的人没有父亲，因为他们的父亲大多在卫国战争中牺牲了。有时我到苏联同学家作客，他们母子（或母女）谈到死去的丈夫和父亲时，面色深沉，露出心灵深处不可弥补的损伤。苏联人民痛恨德国鬼子，如同中国人民痛恨日本鬼子一样。

苏联同学的生活比较艰苦，本市学生还好些，可以住家吃家（因宿舍紧张，学校有本市学生不能住校的规定），家住外地的就苦了，食宿自行解决，学校只向极困难的学生提供宿舍。学校对学生的费用不大包大揽，实行奖学金制：每学期各门功课按五分制，成绩都在4分以上者，给予奖学金；如果有一门功课出现了3分，则取消奖学金。奖学金的数量仅仅能维持一个人的生活费。大家为争这一口饭吃，努力学习，消灭3分。甚至考试时"相互帮忙"。

我们都住在莫斯科大学的学生宿舍，一般四人住一间。学生大约一半是苏联人，另一半则是来自东欧和亚洲社会主义国家的留学生。苏联人中间，有很多是来自苏联中亚地区的加盟共和国少数民族的学生，如：土库曼人，哈萨克人，阿塞拜疆人，格鲁吉亚人，阿尔明尼亚人，立陶宛人，犹太人等等。所以我住的那座学生宿舍（他们叫大学生城）真正是个多民族的大家庭，但大家使用着一个共同的语言——俄语。多民族学生混住并和睦相处，给我们提供了相互了解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机会。

不同国家、民族的人文风俗，是我们聊天的经常的话题，大家既可从中了解到很多不知道的奇闻逸事，也可成为宣传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好机会。当时他们对中国认识的共同点是：一，对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都表示钦佩；二，对近代中国愚昧落后的一面看得较多些。

1956年夏，与当时团中央书记、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中国代表团团长胡耀邦同志合影（胡左侧为作者）

在这些人中间，也不乏有大国沙文主义或种族主义倾向者。比如有些苏联人，特别是俄罗斯族人，自恃他们能与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地位，以中国的"老大哥"自居，闲聊时竟半真半假地对我们说："苏联已有十五个加盟共和国，你们中国干脆归并到苏联，成为苏联的第十六个加盟共和国吧。程，你赞成吗？"听这话后，能不令人生气，都是同学，不需发火，我马上给他一颗软钉子吃。我说："不对！亲爱的，哪能人少

的合并人多的，你们虽有十五个加盟共和国，合起来只有两亿多人口。而我们中国有六亿多人口(当时的统计数字)，是你们的三倍，还是你们合并到中国来吧，中国也是多民族国家，地大物博，容纳得下。怎么样？”小伙子听我这一通反驳，眼珠子盯我半天，只好来了一句：“赫得尔(滑头)！”大家哄笑了之。

留学生中除中国人能吃苦用功外，我所见到的德国人(东德)也很用功，他们的成绩、纪律以及日常生活表现等都很不错，作为一个民族的气质，可以说是一流的。但他们之中，确有种族主义思想很强的人。有一学期同宿舍有一位叫瓦洛嘉的苏联同学，同我很要好，彼此尊重，无话不谈。有一次他告诉我：“常来找我玩的那位德国日尔曼人对你们中国人不太友好，你以后少跟他搭腔！”我问怎么啦，他说那位日尔曼人对他说：“我们都是白种人，少跟中国人(黄种人)打交道。”我听了很恼火。我说：“下次他再来我们屋，我将教训这个小子！”瓦洛嘉连忙说：“别说他了，你知道就行了，不要伤了和气。其实，他这种纳粹思想我们俄罗斯人也很不赞成的。他跟我说白人比黄种人优越；他和日尔曼人一起又会说，日尔曼人比俄罗斯人优越，实际上他也瞧不起我们俄罗斯人！”我理解了瓦洛嘉的意思，此后，我见到那位德国人，连头也不点了。

在任何外国人面前不卑不亢，可以说是当时我们全体留学生都能做到的。

## （三）

苏联人的性格非常开朗、豪爽，尤其是俄罗斯人，他们绝大部分人表里如一，很少弯弯绕绕，他想说你不是，他就当面说；他捧你，真是出自内心。提问题单刀直人，不拐弯抹角。记得 1956 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反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报告后，社会上反响强烈。我们常听到苏联人发泄不满的话，甚至用脏话骂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大抓农业，组织青年人到边远地区开荒。青年学生每年暑假也不得休息，到边区开荒劳动，收割玉米。一时间“秃子”、“老玉米棒子”成了赫鲁晓夫的绰号、代名词。苏联人对自己国家的领导人发泄不满，一般都不分场合。当着自己同胞的面骂，当着我们这些外国人的面也骂，也不怕别人去告密。

自 1956 年苏联反对个人崇拜后，直至我 1960 年毕业回国前，苏联人常向我们中国留学生提出这样的问题：“你们中国对毛泽东有个人崇拜吗？”一开始我们都支支吾吾，回避这个问题，后来大使馆党委通过各校党支部向全体留学生传达：“凡是苏联人问我们毛主席有无个人崇拜时，我们一律回答：没有。”统一了口径，回答自然千篇一律，苏联同学笑笑说：“赫得尔(滑头)！这不是你们的心里话。哈哈！是你们大使馆统一教你们说的吧?！”

## （四）

我在苏联留学期间，每学期都要调整一次学生宿舍，合住的伙伴年年有变化，接触的人也就越来越多，从中不仅使我了解到对方民族的人文历史，风俗习惯，也了解了他们的政治观点。现举几个例子：

1956 年与我同宿舍的有两位匈牙利人，都是匈牙利工人党(共产党)党员，平时表现很好，积极向上。匈牙利事件后，他们利用假期回国探亲回来，情绪极其消沉、低落，唉声叹气，跟我诉说了苏联人如何欺侮他们、奴役他们，连中学里都派驻有苏联人，他们忍无可忍，揭杆而起，遭到镇压，许多人民被枪杀了！我那时很天真，“受了党的教育”多年，为维护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团结，还为“老大哥”辩解，说：“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吧？”他说：“程，请相信，我是党员，说的全是真话。中

1956 年 2 月，周恩来总理访苏时于莫斯科大学礼堂接见中国留学生（前排右起三为作者）

盟互助条约》，怕引起世界大战把他们卷进去。从当时苏联社会看，一句话可以概括：不仅苏联政府不愿卷进战争，苏联老百姓也不愿打仗，不愿意看到局势被绷得紧紧的，使人透不过气来。

1957 年毛泽东主席参加苏联十月革命 40 周年庆典期间，在百忙中于 11 月 17 日接见了我们在莫斯科学习的全体留学生，地点在列宁山上莫斯科大学大礼堂。当时我们青年学生出于对领袖的无限崇拜，早早就在大礼堂等候。当毛泽东主席漫步走到主席台上时，“毛主席万岁！”声如雷贯耳，掌声经久不息，陪他入座的有总书记邓小平、国防部长彭德怀和宋庆龄副主席等国家领导人。在这次接见会上，毛主席给我们讲话足足一个小时之久，他的名言：“东风压倒西风”和“世界是我们的，也是你们的，但是归根结底还是你们的”，就是在这天讲的。毛主席讲话时，整个大礼堂鸦雀无声，恭听他的教导，连旁边人的呼吸都能听到。这次的接见，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现在回忆起来，还如同昨日。我观察得很仔细，连每个细微的动作都不放过。全体学生掌声雷动、高呼万岁时，台上台下都连成一片。但我总是感到彭德怀、邓小平的精神始终没“激动”起来，绷着个脸，两只手像拉手风琴似的慢慢鼓着掌。当时我还想：“他们天天同毛主席在一起，哪能像我们这样激动！”

我们去苏联之前，接受了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教育。所谓爱国主义，就是凡有损祖国、党和人民的话、事不说不做；所谓国际主义，就是凡有损中苏友谊、社会主义大家庭团结的事不做，并且本着这两大原则去处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问题，这是当时我国的方针和政策。我是我校中国留学生的学生会主席，帮助支部跑跑腿，干点实事。比如，每到“十一”国庆节时，我就跑大使馆借图片，在我校举办新中国建设成就图片展等等；学校或工厂举行庆祝我国国庆的晚会，我就负责组织和联系在会上发言等。我有一张周总理接见

国是个大国，有六亿多人口，他们不敢欺侮你们，可我们匈牙利是个小国啊！”说着几乎掉下眼泪。

1957 年是十月革命 40 周年，各国共产党都派了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庆贺，毛泽东主席亲自率领代表团前往祝贺。毛主席的到来，引起苏联社会各界的重视与欢迎，赫鲁晓夫也很高兴，准备举行隆重的群众欢迎大会，迎接中国代表团的到达。此举被毛泽东婉谢，说各国共产党都是平等的，没有组织群众大会欢迎别国代表团，单独欢迎中国代表团不妥。毛主席的决断完全正确，也为苏联人解决了难题，一时在苏联社会传为佳话。在 41 国的共产党、工人党的全体会议上，毛主席在会上掰着手指分析世界形势时说(大意)：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没有什么可怕的。我们主张和平，但也不怕美帝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接着毛主席又说了(大意)：世界大战爆发了，扔原子弹了，即使全世界死了一半人，中国还有三亿人口，苏联还有一亿人口，世界仍然是我们的。这些话传出去以后，苏联社会上不少人不以为然，我同室的伙伴，班里的同学，甚至教授对我们说：“毛泽东的分析太可怕了，……世界死了一半人，还建设什么共产主义！”

1958 年台湾海峡炮战开始时，不仅是赫鲁晓夫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苏联人民也很害怕，我的同室伙伴和苏联同学都颇为担忧，由于两国签订有《中苏友好同

留学生的大照片，其中有我，并坐在第一排。这张照片对我来说，非常珍贵，我悄悄地留了下来，一直保留至今。

在学校，我们恪守在苏联人面前不议论他们国家和党的内部事务。对于学校教务上的事情和问题，我们不主动去反映或干预，由苏联人自行解决。

在苏联的中国留学生，有严密的组织机构。凡有中国留学生的苏联高校，都成立了党支部和留学生学生会组织，直属驻苏使馆的党委和大使领导。党中央有关国内外的大政方针政策，都能及时地向留学生传达。我们学生也可以自己花钱订阅国内的报刊。由于卢布与人民币的比值不合理，用少量的卢布就可以订阅国内报刊，所以我也就订阅了《人民日报》和其它技术杂志。

50年代，国内的一些做法，苏联人有赞成的，也有不赞成的。这些情况，我们生活在苏联人中间，言谈话语、思想交流之间，我们感觉得出来。在中苏关系融洽时代，我们中国《人民日报》、新华社等的主要报道，苏联的《真理报》和塔斯社也都全文或摘要转载，中国所发生的情况，苏联人民第二天都能看到消息。比如，1956年我国开展公私合营运动，资本家敲锣打鼓将自己的财产送给政府"公私合营"，大资本家乐松生在天安门城楼上为毛主席献礼、报喜等等，在《真理报》上都有过图片和文字的报道。中国用和平方式解决资本家问题，大受苏联人民、学者、教授的赞扬，从言谈话语中，他们摈弃苏维埃初期对"资本家、地主、富农"采取斩尽杀绝、赶出国门的极端做法，而认为中国和平解决资本家问题，是中国的一项创举。但他们对1957年中国许多知识分子被划成"资产阶级右派"表示不解和异议。记得我们的政治经济学教授在课堂上引经据典，说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学说，知识分子是从属于统治阶级的，在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就为资产阶级服务；在无产阶级统治的国家，他们就为无产阶级服务。所以在社会主义国家里谈不上什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或什么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我听后，知道他是针对中国的反右派斗争说的。

1958年中国的"大跃进"，包括工业大办钢铁，农业大放"卫星田"，密植的稻子上面，可以站一个小孩，《真理报》也天天报道。中国要超"英"，苏联要"赶美"。一时间，世界就像只是苏联和中国的天下。但毕竟有冷眼旁观者，有头脑清醒者。我听说，几个在苏联农科院留学的中国学生，受国内"大跃进，放卫星"的启发，也要在苏联搞"试验田，放卫星"。苏联农科院院士兼院长李森科说："如中国人在苏联土地上搞出了中国式的卫星田，密植的庄稼上能站个小孩，我李森科不当苏联农科院院长兼院士，我一定要求赫鲁晓夫委任我的中国学生来当！"科学家根本不信你这一套。

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在50年代末期，中苏的蜜月行将结束，中国对美苏两国的接近，持高度警惕，不能让美苏主宰世界。但表现形式上，都是意识形态之争，实际上是反对美苏划分势力范围，称霸世界。记得1959年美国副总统尼克松访问苏联并在莫斯科萨科里尼克公园(离我住的学生城近在咫尺)，主持美国展览会开幕剪彩，中国大使馆通知全体在莫斯科的中国留学生，抵制这次展览，"不许前往参观，不许与美国人接触，更不许与美国记者攀谈"，以防美国人抓住把柄，说中国在苏联的留学生向往美国的物质文明和自由、民主。我们都老老实实地照办了。在那期间，我们都很少上街。因为美国展览会强烈地吸引了苏联人，他们也抱着对美国的好奇心，街头巷尾都是这方面的话题。有不少苏联朋友搞不到参观美国展览会的票，想走外国留学生的后门，问我："程，求求你帮我搞几张票，你们外国学生去要票，一定优先照顾！"我当时摆出一副严肃的面孔并颇为激动地说："美国佬占领我们中国的领土台湾，美国展览会不屑我们一看！"颇有与美国佬势不两立的架势，把苏联朋友弄得悻悻而去。现在想起来，好像也没有那个必要。中国的孙子兵法早就说过："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嘛，为什么就不能去看看呢?

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上个世纪50年代我们这批留苏学子，现在都已年过花甲。回想当年我们为了建设富强的社会主义祖国的崇高目标，赴苏联留学多年，回国后努力用学到的知识报效祖国。我们没有辜负祖国的期望，仅我们原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留苏预备部学习俄语的28班，就可以称之为人才济济，硕果累累。他们留苏回国后，有研制"两弹"（导弹、原子弹）的先锋，有担任博士生导师的教授，有医学领域的权威，有著名的电影编导，有经济战线上的领导干部，有画家、园艺家、法学家等等。21世纪已经来临，长江后浪赶前浪，相信我们的后代一定会超过我们。

（责任编辑　吴　思）

# 党派我给宋庆龄当秘书

● 李　云

今年是宋庆龄主席逝世二十周年。在她生前，由于工作关系我同她有多年接触，我写了一些回忆，虽然零零星星，但愿能表达我对她的深切怀念和崇高敬意。

## 一

1936年初，冯雪峰来到上海，他首先来看地下工作者徐强（老徐是我的丈夫，当时称为“老金”）。我看到冯雪峰身穿古铜色长袍，头戴礼帽，脚穿皮鞋，，脸色很黑，有些像经商的模样。他向我们传达了中央瓦窑堡会议的精神，徐强向他汇报了工作情况。冯雪峰决定停止警报工作，由徐强全面负责情报工作。并要我们另找房子，换个环境。接着他去看望多年不见的老朋友鲁迅，两人彻夜长谈甚欢。鲁迅当即给宋庆龄打电话，告诉她里面来人了，希望约定时间见见面。

冯雪峰会见宋庆龄，主要研究有关救国会的工作问题。想不到宋庆龄此时提出一个要求，她说：“我考虑了很久，我有事要找你们商量，一下子没有办法找到你们，所以我要求你们派一位共产党员在我这儿，使我和你们能够及时通气。”冯雪峰答应下来。

当时，我根本没有想到冯雪峰竟会要我去宋庆龄那里工作。我认为宋庆龄是国内外有很高地位并有很高声望的人，我怕做不好工作，因此不敢承担这个重任。经过冯雪峰的开导，我服从了。组织上考虑到宋的环境，专门为我作了一番包装，订做了几件旗袍，一双半高跟皮鞋，一只墨绿色的拎包。

1936年5月下旬的一个晴天，我前往莫利哀路（现香山路）29号会见宋庆龄。宋的客厅陈设简朴大方，左右两壁挂着孙中山先生的相片。我刚在沙发上坐下，听到一阵脚步声，抬头望去，走来一位穿墨色旗袍、黑色高跟皮鞋，仪表非凡、美丽端庄的妇女，我马上站起来，只见她满脸笑容，来到我身边，一面端详着我，一面笑着说：“啊呀！是位小姑娘呀！”（其实我已经二十一岁了，梳着两条小辫子）接着她叫来了李妈，对她说：“这位钱小姐（冯雪峰给我改的姓），是新来的秘书，因为事情忙，不能每天来。”宋又对我说：“如果我不在家时，李妈会照顾你的。”宋和我在沙发上坐好后，她问我什么地方人？家里有些什么人？我都一一回答，后来她好像和我商量似地问我：“你能否每星期来三次，如果事情多了，我再增加，你看好吗？”我点头说“好”。

大约过了一个多月，宋庆龄对我提出，希望能改为每天去她那里一次。她认为这样更为方便。当时处于白色恐怖的环境下，宋庆龄的住宅周围特务、密探不断，我不得不经常改装，穿行商场，从前门进后门出，直到我确实感到后面没有尾巴时，才回到家中。

当时，宋庆龄如有重要事情商量，就要我去约冯雪峰会面。一般情况下，她经常将一些南京政府方面的消息直接告诉我们。有一次，她对我提出，是不是可以帮助她了解牛兰夫妇的情况（牛兰是“泛太平洋产业同盟”秘书处的代表。这个同盟是红色工会国际分支机构。

更机密的是牛兰又是共产国际的代表。他是在上海公共租界被捕后,引渡到南京的。)我即向冯雪峰汇报,很巧,徐强领导的南京情报关系中就有一份有关牛兰的情报。此后,每次从南京来的密写情报中如有关于牛兰夫妇方面的情报,我都抄一份给宋庆龄。大约在 1936 年 9 月间,潘汉年到达上海,看到我单独写牛兰方面的情报,就问我原因,我如实作了汇报。他笑着说:“啊,夫人要,不是光她看,而且上面也要看。”我感到奇怪,潘又笑着说:“不知道怎么搞的,他们怎么会把第三国际的关系交给孙夫人?!”

一次宋庆龄要我通知冯雪峰去她家面谈。冯从宋家回来后,把用报纸包的一包东西交给我,要我保管。他说,这是方志敏的遗墨《可爱的中国》原稿,那是鲁迅从内山书店取回来交给孙夫人的。宋庆龄把它交给党,还附有方志敏给党中央的一封信。但是,后来冯雪峰又将这包东西取回去了。

## 二

1936 年 12 月 12 日发生了西安事变。当天深夜,我们接到中央发来的电报,报头标上“十万万火急”。我兼管电报时间不长,从未见过这样的急电。我非常焦急地等候潘汉年和冯雪峰的到来。那天潘汉年来得特别早,说是从南京得到消息,西安出了事,情况不明,所以急忙来看中央电报。这份电报通报了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在西安扣留蒋介石,进行兵谏,迫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情况;同时提出了我党的主张:公审蒋介石。不多时冯雪峰也来了,经过商讨,认为电报很重要,暂不向外公布,还要等中央进一步的消息,并密切注意南京方面的动向。

我去向宋庆龄报告了西安事变的情况,她一听到蒋介石被张、杨两将军扣留,非常高兴。她说张、杨很勇敢,做了件好事;他们采取这种办法,也是迫不得已的。她说,在军事压力下,有可能使国内战争转为抗日战争,但认为蒋介石很狡猾,不可轻信。

第二天,我去宋家,见李妈打开信箱,发现一封恐吓信,是用毛笔写的,还附有两颗子弹,内容大意是:你勾结张学良、杨虎城扣留蒋委员长,如果蒋委员长发生意外,这些子弹是不认人的。宋看后笑了起来。她说:“不怕他们,我收到的恐吓信也不只是一封,见多了,也就无所谓了。”

回来后,我向潘汉年、冯雪峰汇报了宋收到恐吓信的事。他们非常重视,认为切不可麻痹大意,一方面争取公开的保护,向法租界捕房报案(宋的住址当时属法租界的范围);另一方面提醒宋暂时不要出门,注意安全。徐强提出派人去宋的住处周围,加强秘密保卫工作,但不能让宋晓得。他派了赵伯华担任这项任务,同时嘱咐我,进出宋的住处更要注意“尾巴”。

宋庆龄同意党组织的上述建议。大约过了几天,西安事件有了变化,中央又发来“十万万火急”的电报,内容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下,释放蒋介石,要我们报告宋庆龄,同时向新闻界发布。潘汉年随即要我赶快去向宋庆龄传达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

那天我一早去宋家,看到门内李妈和帮工何元光正清扫庭院,一人用橡皮管引水冲地面,一人用竹扫帚反复洗刷。他们告诉我,夜里有人将一包包粪便丢进来,臭气冲天。我进到客厅,宋庆龄坐在沙发上,愁容满面。她告诉我说:“据南京方面的消息,何应钦积极准备军事行动,用军队包围西安,派飞机轰炸西安,阴谋制造内战,如果这些亲日派上台,日军可以长驱直入,侵略中国。”她希望我们党赶快调解此事,有条件地释放蒋介石,这并非姑息蒋介石,而是考虑国家的前途。我向她提出,潘汉年要见她,传达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意见,宋非常高兴,当即请潘汉年下午二时去。

潘汉年会见宋庆龄回来说,孙夫人非常赞赏我们党提出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意见,她提醒我们与蒋介石打交道要十分注意,此人毫无信义,异常狡猾,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手段

十分恶毒，应当提高警惕。

## 三

1937年2月，宋庆龄接到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开会通知，请她参加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宋自从1926年以后从来不去参加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会议，她对蒋介石是深恶痛绝的，也不愿意见到那批违背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假左派。这次接到通知，她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决定参加。

宋庆龄对我讲，她去南京开会，大约两、三天就回来，准备在会上发言，讲完话就回上海，一刻钟也不愿多呆。她说，我实在讨厌他们。

她在大会上发表了题为《实行孙中山的遗嘱》的演说，提出："救国必须停止内战，中国人不应当打中国人。"

宋庆龄从南京回来后，将这篇演讲稿很慎重地用信封套起来交给我，请潘汉年与冯雪峰看看。

1937年春，李克农从陕北到达上海，他在治眼疾的同时，还肩负着重要任务。

李克农一到上海，首先通过我约定时间，由潘汉年陪同去拜访宋庆龄，向宋通报了西安事变后国共谈判的情况，特别是释放"政治犯"，请宋庆龄从旁协助，促使国民党尽快办。

李克农又请宋庆龄帮助约见孔祥熙夫人。经宋约定，孔夫人和李克农均按时到莫利哀路29号宋的住处见面。宋庆龄给两人作了介绍后，自己退到花园里散步，一直到他们谈话结束，宋送走他们后我才回家。

1937年7月间，中共代表团周恩来、博古、林伯渠与国民党代表蒋介石、张冲、邵力子在庐山会谈后，于14日到达上海，住在北四川路新亚饭店。第二天，他们到了潘汉年另一个办公地点，由徐强向周恩来等汇报情报工作。汇报结束后，潘汉年要徐强赶快叫我去通知宋庆龄，告知周恩来等三人结束庐山会谈后，已来上海，要求见宋。

宋同周恩来等会见时，极为高兴，他们在大革命时期就认识，而林伯渠作为国民党老同盟会会员，与宋更为熟悉。他们谈得很热烈。周恩来将庐山会谈经过情况向宋作了介绍。周恩来说，蒋介石对抗日很动摇，对日本军国主义还有幻想，希望通过和平方法，求得卢沟桥事件的解决。他们把中共团结抗日的建议搁置起来，以致会谈没有结果。

宋庆龄听了很生气，她说，怎么置国家民

宋庆龄与本文作者（右）摄于解放初期

族生死存亡于不管呢？他岂不是变成人人喊打的卖国贼了吗？

## 四

1937 年记不得哪个月份，宋庆龄对我谈了一些事情后，她突然轻声地对我说："我算不算党员？"她提这个问题，当然决不会是问我的，她是在问党组织，我无法回答，只得"嗯、嗯"地点头，她也不追问，又谈别的事情去了。

我回到家里，在潘汉年和冯雪峰来看电报时，把宋提的问题请示他们，问应该如何回答宋庆龄？潘汉年说："孙夫人坚定不移地与我党合作，她用她的特殊身份、特殊地位，起到了特殊作用，任何人也替代不了的。她的入党问题，必须中央来考虑。"潘又说："明天，你对夫人说，你和共产党员一样。这样回答比较妥帖。"冯雪峰也同意。

第二天，我见了宋庆龄，按照潘的意见回答了她，她异常高兴。我把一些事情办好后，准备回去时，宋一定要留我吃饭，她说："你从来不肯在我这里用饭的，今天一定要在这里吃一顿便饭。"

宋的饭菜极为简单，首先每人一杯紫菜汤，接着一盘甜椒炒猪心，另一盘为灯笼椒塞肉末，还有一盘菠菜和一盘盐渍紫萝卜，是宋亲自做的。宋对我说："我炒菜是跟孙先生学的，他长期过流浪生活，学会了炒菜煮饭，而且他是医生，懂营养，青椒（里）维他命 C 特别多，所以我常吃青椒，紫萝卜是我用盐渍的，不仅营养好，而且很爽口，是我喜欢吃的。"这顿便饭吃得我们两人都很开心。

这年"八·一三"日军进攻上海，炮轰闸北，袭击虹桥机场，当时租界非常混乱，许多华界的居民纷纷拥挤到租界里来，靠近租界与华界交界的地方居民纷纷往市中心逃。到处抢商店，米店纷纷关门。有一天，我去宋家，恰巧宋庆龄不在，李妈对我说："家中米只能吃几天了，元光出去找米店，都关了门，他实在买不到大米，急得不得了。"正在这时，何元光来了，他说："钱秘书，请你想想办法，买点米，我实在没有办法，又不敢对夫人说。"对这件事，我也没有把握，只好答应说："好，我去想想办法吧。"我找父亲帮忙。他托米店熟人买到了米，第二天，又雇一辆汽车给宋家送去一担大米。

到了十月下旬，形势更加严峻，归绥、张家口、大同、保定、石家庄、邢台、娘子关、德州、沧州等相继弃守，上海的形势也更加紧张了，日军在沪宁线调动频繁。毛泽东、周恩来来电说：为了孙夫人的安全，请她撤离上海去香港。这份电报是由潘汉年向宋传达的。第二天，记得我去时，宋对我说："感谢毛先生和周先生的关心，我这里还有不少工作需要处理，我还不能一下子随便离开，稍缓些时间吧！"她停了一下，又对我说："我非常希望你能和我一起去香港。"这时，我为难了，因为我还不知道组织上是什么意见，不敢答应下来，只能以微笑表示。

## 五

大约 11 月下旬，或 12 月上旬，中央发来第二封电报。这时抗日战争到了极其严重的阶段，上海沦陷，无锡、苏州等地相继弃守，上海租界陷于日军包围之中，成为孤岛，中共中央来电催促宋庆龄赶快离开上海去香港，电报具名为毛泽东、周恩来。这份电报由我向宋传达，她表示感谢毛先生和周先生，并说："工作上一些事情已处理得差不多了，可以离开上海了。"她告诉我，她把孙先生的遗物全部整理了一遍，凡是能带去的尽量带去，还有她母亲和父亲的纪念物，也想尽量带在身边。一些带不走的重要物件，寄存在朋友处，其他一些东西只得放在家中了。她讲了打算后，拍拍我的手背说："我们相处得很好，很合得来，我非常希望你能一起去香港。"这次，我由于事前已经得到组织通知，决定让我陪同宋庆龄去香港，因此，我点点头答应了。

宋庆龄为人很细致，待人极为周到，她甚至为我准备了去香港的服装，送了一段紫色椭圆形银色花纹的绸旗袍料子，要我赶快去做一

件丝棉旗袍；另外又送了一件灰色花纹旗袍和一件黑色外套，都是新的。她说："不要客气，你拿着，会有用的。"我赶紧回去向潘汉年、冯雪峰汇报，并把东西交给他们。潘汉年说："凡是夫人送给你的东西，你必须要拿，不然她会不高兴的。"冯雪峰说："给你的料子，赶快去做，再买一件大衣，这样可以配起来。"

在赴香港前三、四天，宋庆龄交给我一张船票，她说："这是艘德国邮船，乘客少，比较方便。我请外国朋友送上船，带着李妈，你单独上船，我们在船上会面吧。"

12 月 23 日清晨，天气阴沉沉、灰朦朦的，很寒冷。我拎了一只箱子，拉上大衣领子，随着三三两两的人上船。

邮船大厅富丽堂皇，房间里床头有电话，里面有洗漱间和浴室，室内布置得很高雅，暖气很足，大衣穿不住了。船开出不到一小时，李妈找到我房间来，交给我一张纸条，这是宋庆龄写的，大意是：在船上不便会面，到香港后，要我第二天到她的新家去，纸条上写有地址。

到达香港后，宋庆龄住在她二弟宋子良的房子里。宋子良在香港有几套房子，半山上这套让宋暂住，宋准备以后找到合适的房子再迁移。我住在跑马地徐某家中，他是中共秘密党员，任国民党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英文很好，他是由南京撤退到香港的。他在南京时由徐强直接领导，潘汉年来香港后，改受潘的领导。

我按原来约定的时间去看了宋庆龄，李妈一看到我去了，她说："夫人就是等你来。"原来宋庆龄因为我没有来过香港，准备带我出去走走。那天，宋穿了件黑色旗袍，加上黑色薄呢的外套，高跟皮鞋。我们坐出租汽车来到去九龙的轮渡码头，进到轮船最里面靠窗的一排凳子边坐了一会儿，宋站起来，对着窗外看，我也跟着宋站起来。宋在我耳边轻轻地说："你看靠安全门旁边一排座位上有一个女的，皮肤黑黑的，胖胖的，穿一套西装，她叫陈璧君，是汪精卫的妻子，我实在不愿见到她。"当船到达九龙时，我们等到渡船的人走得差不多时，才上的岸，已经不见这位胖女人的影子了。我们沿着九龙最大的一条马路——弥顿道走，一直到弥顿酒家门口，才转回来，仍坐渡船回到香港。当时香港另有两条大马路，一条德辅道，一条皇后大道。我们慢慢地走，宋带我们去金龙酒家用午餐，宋点了几个菜，吃完后，宋说，她要变戏法给我们看。说着，她将红茶倒在盅里，立刻变成了白色，如牛奶。我从来没有见到过的，我和李妈都笑起来了。

## 六

1938 年春的一天，我在报上看到了一条很大的标题：蒋夫人探望国母孙夫人。我想可能有什么重要消息，便去宋家打听。宋庆龄热情地邀我一起进餐。我一面吃一面问报纸上登的那条消息。宋说："昨天我的小弟子安来看我，对我说：'三姐来到香港，我们都聚在一起，三姐关照大家，任何事情不要告诉你。'我听了很生气，就对我的小弟说：'你不要对我说什么，我也不要听。'我的小弟子安是和我比较好的，他还来告诉我一点消息。""我们姊妹关系不及一些好朋友，一切都从政治上来分的，谈不到什么骨肉之情。我们姊妹彼此都用夫人称呼。她们叫我孙夫人，我叫她们孔夫人、蒋夫人。报纸是乱推测的，我住上海那么多年，她都不来看我，我刚到香港不久，怎么会来看我呢？当然我也不会欢迎。孔家的大儿子孔令侃，他在圣约翰大学读书，常来看我，告诉我许多南京政府的情况。因为在孔家，大人讲事情并不回避孩子的。西安事变时，他的父母不准他来我家了。这不是看得很清楚吗？样样都是从政治上分，哪有什么姊妹之情，全是空的，表面的。"由此，我对宋坚强的政治态度、爱憎分明的立场，感到十分钦佩。

1938 年 4 月下旬，上海来电报，由于我的孩子病重，要我回去，我向宋庆龄请假，她同意。她再三叮嘱我要尽快回去，她打算把我放在她筹备组织的保卫中国大同盟里任秘书，有了公开身份，我的工作更为方便了。不料到上海后，虽然孩子病好了，但因工作需要将我留下来了。

（责任编辑　刘家驹）

# 三个早期清华人

● 钱听涛

## 一 早期清华

研究过清华大学校史的人都知道，它的前身是清华学堂，清宣统三年四月初一（1911 年 4 月 29 日），招收第一批学生，在清华园正式开学，这一天是星期日，以后就把每年四月最末的星期日作为校庆日。今年 90 周年大庆又适逢 4 月 29 日。辛亥革命后，当时北京政府教育部下令将清华学堂改称清华学校。1925 年 5 月设立了清华学校大学部，正式改为"国立清华大学"。

清华学堂（学校）时期的任务完全是为了培养留美预备生，开始由清政府外务部和学部共同领导，民国以后完全由外交部领导。因为这所学校是利用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设立的，所以美国政府通过美国公使实际上控制校务。早在 1906 年美国伊里诺大学校长詹姆士给总统罗斯福的备忘录中就提出：如果美国在 30 年前已经做到把中国学生的潮流引向这一个国家来，并能使这个潮流继续扩大，那么，我们现在一定能够使用最圆满和巧妙的方式，控制中国的发展。——这就是说，使用那从知识上与精神上支配中国的领袖的方式。（引自《清华大学校史稿》第 3 页）但是后来的历史证明，美国当局的这种愿望落空了。一代代的清华人加入了人民革命的行列，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贡献了巨大的力量。

我这里要记述的是清华学校时期三个早期清华人，似乎在人们的记忆中已有点淡忘了。他们是周诒春、杨恩湛、凌其峻。

## 二 周诒春和杨恩湛

清华学校时期共换过十任校长，其中有些完全是不学无术的军阀官僚，如 1928 年张作霖的安国军政府统治北京时所任命的清华学校校长温应星，原来是保定军警执法处处长，到职仅两个月，就随着张作霖垮台而去职。但也有真正办教育的教育家，其中成就最大、任职较长，为以后的清华大学初步奠定基础的就是周诒春，同时作出贡献的是周诒春任校长时清华学校的教务长杨恩湛。

周诒春字寄梅，祖籍安徽休宁，1883 年生于汉口一个茶商家庭，青少年时在上海圣约翰书院大学部毕业，他的老师是颜惠庆。1907 年他自费留美，在耶鲁大学、威斯康辛大学先后获学士、硕士学位。宣统二年（1910 年）回国被清廷授进士，点为"洋翰林"，先后在中国公学、复旦公学任教。辛亥革命后，他随颜惠庆入外交部任秘书，曾担任过孙中山的英文秘书。1912 年 3 月，外交部任命唐国安为清华校长（当时叫"监督"），同时，把周诒春从外交部调到清华任教务长，4 月周改任副校长兼教务长。杨恩湛大概是在此后从外交部调来接任教务长的。

杨恩湛字仲达，江苏常州人，早年因家贫，随亲戚到了湖北进入新式学堂，以后考取官费留美，回国后到常州与贡生陈建侯之女陈静结婚，即赴北京到外交部工作，不久即调任清华教务长。1913 年 8 月唐国安病故，10 月周诒春正式接任校长。

周诒春的爱国思想首先体现在清华的办学宗旨上。当时清华作为一所留美预备学校，只招收相当于小学或中学水平的学生，进入学校的中等科及高等科学习，每科约四年，毕业后可升读美国大学三年级。周诒春抱着教育救国的理想，主张清华应逐步扩充学程，设立大学部。他在 1916 年 4 月呈文外交部，提出这一建议。他认为这样做可以缩短留学年限，节省

周诒春

杨恩湛

凌其峻

学费；可以延长在国内学习时间，使学生增加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当时校园已有 900 余亩，每年有经费百余万金，他提出从长远计，应该为了中国的需要将清华建成一所完全独立的大学。但是北洋政府却对此十分消极，1925 年才设立大学部，1929 年才停办留美预备部，成为完全的中国大学，这时周诒春早已离校了。

总之，在周诒春心目中，清华应该是为中国培养人材，而不是为美国培养奴才。他的建议虽然未被采纳，但实际上推动了清华向这个方向建设。如早期清华的四大建筑：图书馆、科学馆、大礼堂、体育馆，就是 1916 年由他主持兴建的，至今仍矗立在清华园里，成为早期清华的象征。

周诒春、杨恩湛都要求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他们重视爱国思想的教育。如在 1914 年 4 月，他们先请历史教师配以电影图片为学生讲圆明园被劫焚情况；又在校刊上发表文章说："嗟乎！英人一炬，可怜焦土，虽仅供前清君王玩游之场，讵非吾华至深极大之国耻乎！"他们经常教育学生："游美学生须以学问经济为目的，切不可以学位为目的也。游学唯一之宗旨，在吸收新文明，滋养新国家，非求博士学士也。"这里讲的"游学"，就是"留学"，至于"经济"，是"经世济民"的意思。总之他们反复教育学生，学习是为了建设祖国，不应骛个人虚名。他们还要求学生养成艰苦朴素的作风。周诒春向学生说："饮食衣住，贵乎清洁。若衣必文秀，食必膏粱，居必华屋，徒消磨壮志与耗度韶光。" 当时的学生大都家庭生活优裕，但在清华时却是布衣布履，无一例外，连学生的零用钱都由校方专门储存管理，学校规定学生每月要写"用钱报告"。周诒春还亲自带领学生参加体力劳动如植树等。他主张学生在校时就要培养为社会服务的意识。在清华附近的成府，他创办了一座贫民学校，亲任"总董"，组织学生前去尽义务。他十分热心体育。马约翰这位为清华体育教育尽瘁一生的杰出人物，当时在周诒春的支持下，开展了著名的"强迫运动"，这一优良传统一直流传下来。

周、杨二人对学校工作倾注全力，对学生的管理近乎于苛刻。那时进入清华的学生许多人只有 12 岁，总数约 500 人左右。他们对学生爱之深、教之严。当然，周诒春在美国留学多年，他又以重视民主制而见称。他曾说："校中无上下尊卑之分，当有长幼先后之序。"这样一位好校长，在当时北洋政府污浊的政治气氛中，自然很难见容。1917 年夏张勋复辟，不久马厂起义，段祺瑞这个亲日派上台，外交部里也是乌烟瘴气。有人想抢清华学校校长这个"肥缺"，见周诒春当时在社会上声誉日隆，就在部里诬告周诒春"妄靡巨款，营私害公"，逼迫他辞职。虽然校内师生反对，周还是向外交部辞职，于 1918 年 1 月离校。他离开清华后，他的影响很多年后依然存在。如 30 年代初，国民党统治时代清华闹"校长风潮"，校内曾出现要请周诒春返校当校长的呼声。至于杨恩湛，离清华后就再没有回校，他先在美国任驻

美大使顾维钧的秘书,1919 年陪同顾维钧出席了巴黎和会,1922 年回国后到外交部工作,1928 年北洋军阀垮台,南京国民政府来了,他就离开政界,从事工商业。1937 年 7 月卢沟桥事变爆发不久,因脑溢血在北平逝世。

### 三 凌其峻

第三个早期清华人凌其峻，是周诒春、杨恩湛的学生。

凌其竣 1897 年生于上海一个破落的商人家庭，小学毕业后曾考入上海制造局兵工学校,1913 年考入清华学校高等科,1916 年毕业后,赴美国学习现代陶瓷工艺专业,获陶瓷工程学学士学位。回国后他把自己家中房产抵押了 2000 元作资本,与留美同学朱家忻、林绍诚合办“中国制瓷公司”,尽力克服各种技术困难，终于在 1923 年生产出工业用的电瓷、瓷砖,这在国内是填补空白之举。但是这种民族工业的幼苗两年后即在洋商的竞争下被迫倒闭。凌其峻受到很大打击,转而走“教育救国”的路,为祖国培养人材。他先后受大夏大学、上海商科大学之聘,教授化学、英文。1926 年凌正在郁郁不得志之时,他的清华老校长周诒春支持几个留美学生在北京办了一个仁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并亲自任董事长,进行出口北京地毯、手工艺品及古玩的业务。因业务扩大,人手不足,周诒春把正在苦无出路的凌其峻请来,一同经营仁立。但凌其峻志在陶瓷,勉强应聘来北京后却去兼任了北京大学、燕京大学窑业讲师,希冀有朝一日重操旧业。谁知后来仁立的业务日益扩大,从出口地毯转而自己设厂生产地毯,后又生产呢绒,并从北京扩大到天津。凌其峻虽对地毯、呢绒生产是外行,但毕竟是工科毕业生,管理过近代工业,钻进去几年,也就成了内行，渐渐地把陶瓷救国梦抛却,一心经营仁立公司，成就了他大半生的辉煌事业。他敬业乐群,信奉“忠于人、忠于事、忠于己”的人生哲学。到后来对地毯图样设计、编织工艺、染料颜色样样精通。在管理上也用近代科学方法，重视整理客户档案和技术资料。他对于员工既爱又严,自己则洁身自好,不取非分之财,将分到的红利入股,扩大生产。到了抗战前夕,仁立公司不仅在北京,而且在华北成为一个遐迩闻名的主要地毯企业。他的清华老师杨恩湛自从北洋政府垮台后,也决心再不在外交界任职，转而与凌其峻一起经营仁立,成为董事之一。

日寇入侵,华北沦陷后,日伪大力搜捕抗日的地下工作人员,凌其峻大力掩护。这时杨恩湛已去世，他的独女杨清华是北师大学生,参加了一二·九运动。抗战爆发后入了党,到延安去了。恩湛夫人陈静年过半百,在常州远亲赵燏黄办的华北新亚药厂当管理员,支些工资糊口。日伪侦悉她的女儿是八路军,就把她逮捕,关押在铁狮子胡同日本宪兵队,严刑拷打,灌辣椒水。后被赵燏黄和凌其峻共同营救出来。杨清华在 1947 年派人把母亲接到冀南解放区。解放后杨清华专门到凌其峻处道谢,两家结为生死之交。

作为工商业家的凌其峻在北平解放后积极参加学习,提高了对党的政策的认识。1949 年 8 月 21 日中国民主建国会北京市分会成立时,他被选为副理事长(理事长南汉宸),以后一直担任此职,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被迫中断。其间他还兼任北京市工商联副主委。1953 年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他积极参加政协工作,被选为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不幸的是,他在“文革”中遭难,身患癌症未得及时治疗,于 1968 年 12 月病逝。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反，市政协隆重追悼,称他为爱国实业家的典范。

还可讲的一个巧遇是：凌其峻胞弟凌其翰,我国著名法学家、原国民党驻法公使,1950 年与其他爱国使馆人员一起率先起义回到祖国。当时代表外交部去车站迎接他的就是杨恩湛的女儿、时任外交部人事处副处长的共产党员杨清华。真是千条水流归大海,三个两代早期清华人的爱国情怀留给了后人以无尽启示。

(本文写作时,承杨清华之女杨向宇高工从周诒春之女周珊凤教授、凌其峻之子凌瑞骥教授处得到部分史料,特此致谢。——作者)

(责任编辑　吴　恩)

# 教育家张宗麟的坎坷一生

● 张 沪

1957 年 8 月，我在北京日报社被划成右派。在批斗我的第一次会上,我的一位上司突然对我大喊:“右派分子张沪，你别以为你出身于革命家庭！你的家庭没给你好影响……”

他这么一喊,把我喊蒙了。难道我的家庭不是革命家庭?！难道我的投身革命几十年的父母会有什么问题?！正当我疑惑不解的时候,我获悉我的父亲张宗麟在高级党校也被打成右派了,他的主要罪名是为陶行知辩护。因为我和父亲的血缘关系,我之被划成右派,当然是在所必然了。

## 我国第一位男性幼稚园教师

我的父亲张宗麟(1899——1976),1927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血腥的“四·一二”大屠杀中失去党组织的关系，至 40 年代才重新入党。他一生忠于革命,无论是在失去党的关系的白色恐怖年代，还是到延安重新入党以后,他都是忠心耿耿,按照党在每个时期的方针策略,为国为民贡献自己的力量。父亲在南京高等师范教育系毕业时,当时一些知名教授看到他品学兼优,想让他当助手,可是父亲受陶行知、陈鹤琴教育救国主张的影响,决心投身于新兴的幼稚教育。他在南京、苏州、杭州、绍兴、宁波 5 个城市的 16 所幼稚园和两所育婴堂进行调查，研究了当时新兴的幼稚教育。调查的结果令人触目惊心:当时的幼儿教育几乎全部西化,不仅教育思想、教学方法照搬外国,连教材、玩具、唱歌和每年举行的庆典节日都是外国的。这种幼稚园实际上是在为帝国主义传教士培养徒弟,它完全脱离中国的教育实情。经过调查以后,他毅然决定到陈鹤琴创办的南京鼓楼实验幼稚园当教师,一面教学一面研究,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幼稚教育。我父亲也就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位男性幼稚园教师。1926 年到 1928 年,署名张宗麟的《幼稚教育概论》等数十篇论文和译著出版了,震动了中国教育界。他在南京鼓楼幼稚园研究的适合中国儿童的教材和教学法,成为北伐后的国民政府于 1929 年 8 月颁布的幼稚园暂行标准的依据。

那时我的父亲精力充沛，一边在南京工作,一边还担任杭州浙江女子高级中学的教务主任。这所学校的校长和秘书都是共产党员,父亲在他们的影响下，于 1927 年初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可是不久,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大屠杀。四月底,波及杭州。校长、秘书都被敌人杀害。父亲在陈鹤琴帮助下避难到南京。此后,他与组织断了联系,但他依然摸索着走革命的路。

## 和陶行知一起办晓庄师范

在国民革命高潮的时候,有识之士就提出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1926 年,陶行知发表宣言书,要以改造乡村为目标来改造全国乡村教育,他征集一百万同志,提倡办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1927 年 1 月发出晓庄师范招生广告，宣布三大培养目标:

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改造社会的精神。稍前，毛泽东在广州办起了农民运动讲习所，1927年3月毛泽东又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都不约而同地把农民运动放在中国革命的首要地位。

父亲到了南京以后,积极支持陶行知的主张,自愿辞去待遇优厚的南京市教育局幼稚园视导员的职务,到晓庄师范工作,成为陶行知“一百万同志”中的一名。在晓庄,他遇到了我的母亲王荆璞,南京一女师的高材生,同样辞去工作来到晓庄办乡村幼稚园。父亲在晓庄师范的职务是生活指导部主任，相当于教导主任。校长陶行知外出时,学校的事务就由我父亲负责。

陶行知有句名言:“办有钱的学校不难，办没有钱的学校能使有精神实难!”晓庄师范是个没有钱的学校，经费全靠社会各界捐款，可是在陶行知、张宗麟和许多自愿同志的共同努力下,办得生气勃勃,极有精神。不仅培养了一批乡教师资，还为农民办夜校、幼稚园、壁

建国初期的张宗麟

报、茶园、信用社…… 极受农民欢迎。陶行知采取兼收并蓄的办学方针,因之晓庄师范师生中各党派都有。既有国民党、共产党,也有国家主义派、无政府主义者和无党无派者。父亲虽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但他却仍处处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在党派纷争中都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上办事说话。

1927年“四·一二”以后,蒋介石杀共产党杀红了眼,忽然发现他的首都南京郊外冒出来个晓庄师范,聚集许多青年教育农民,觉得与共产党的农民运动相仿。但碍于校长陶行知、校董蔡元培、熊希龄、沈玄庐、程霖生等人都是社会名流,没敢干预。后来校内一些共产党员受当时党中央左倾盲动主义的影响,组织城市暴动,共产党员学生石俊被国民党军警逮捕杀害。1930年4月,又有学生参加声援工人反帝大罢工示威游行,引起敌人的注意。4月13日，蒋介石下令南京卫戍司令部派出五百士兵,强行搜查并封闭了晓庄师范。晓庄校舍被贴上封条,学生有的被捕,有的被枪毙,陶行知、张宗麟、王荆璞等校领导和教职员也被下令通缉,晓庄师范师生从此四处流散。我的父亲张宗麟、母亲王荆璞因被追捕,只得被迫流浪,我和我的弟弟们都出生在四处流浪迁徙的路途中。

即使生活这样不安定,父亲母亲仍念念不忘开展乡村教育工作，他们逃到厦门集美以后,和当地的朋友集资办乡村师范,不出半年,俨然又是一个微型的晓庄师范。1933年1月,红军进攻漳州,国民党政府发现集美乡师有学生投奔闽西根据地,继而发现校长张宗麟在通缉名单上有名,准备采取行动,父亲得到消息只得赶紧逃走。此后父亲先后在桂林、重庆、武昌等地担任教育学院教务长、系主任。

“一二·九”运动爆发时,父亲在山东邹平任邹平乡师校长。他带领全体师生积极响应,举行游行示威，组织抗日救亡宣传队走上街头，办抗日壁报，通电南京政府抗议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这些活动遭到邹平县政府领导及邹平乡师的上级乡村建设院领导梁漱溟的反对,大多数师生都不同意这种意

见，双方闹得很僵。1936 年 1 月，邹平地方反动势力勾结韩复榘用武装军警硬把父亲押解出境。

## 参加救国联合会为抗日奔走

父亲回到上海，正逢各界知名人士在民主自由大同盟的基础上建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陶行知带领生活教育社全体同人参加了救国会，生活教育社改名国难教育社，父亲也以生活教育社理事的身份参加救国会。不久陶行知受救国会委托，担任国民外交使节，出访欧、美、亚、非 28 个国家及地区宣传中国的抗日运动，国内工作就全部交给父亲。

救国会实际是由中共上海地下党领导的一个民主爱国的进步团体。开始父亲仅负责国难教育社的工作，逐渐成为上海救亡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之一。虽然他尚未接上党的关系，但上海地下党组织对他十分信任，把许多重要任务交给他。尤其在 1937 年 10 月后，救国会其他领导人撤离上海，父亲参加了地下党领导救亡工作的上层人士的"星四聚餐会"以及向中下层会员布置工作任务的碰头会，实际在党的领导下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1935 年 8 月 1 日，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936 年 6 月，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即发表了《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的宣言，以示响应，表示拥护。但是 1936 年初救国会领导人邹韬奋、陶行知在香港，沈钧儒、章乃器在上海，两地阻隔，宣言在香港写成后无法及时取得一致意见。恰好父亲为送陶行知出国来到香港，就决定由他将这份拟定稿带回上海，交给沈钧儒、章乃器征求意见。不久，这份由邹韬奋、陶行知、沈钧儒、章乃器四人联名的宣言就公开发表了，在全国影响甚大，迫使国民党蒋介石不得不做出姿态，考虑国共合作，一致抗日。这篇来自民间的宣言促进了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建成，毛泽东也立即写信表示支持。

宣言发表以后心有不甘的蒋介石把这股怨气迁怒于救国会。这年的 11 月，国民党逮捕七位救国会领导人，即有名的"七君子"事件。在"七君子"被捕的第二天，父亲就赶到南京找冯玉祥设法营救，没有结果。他又赶回上海，参加王昆仑召开的对策会，并与各界人士协商选出胡愈之暂代沈钧儒领导救国会。1937 年 4 月，救国会发起一次入狱运动，宋庆龄、胡愈之、张宗麟、张天翼等七人一起到苏州监狱抗议。当时他们的名言："救国如有罪，不知谁才没有罪……我们都为救国而入狱罢！"传遍全国。在全国人民的抗议压力下，"七君子"在"七·七"事变后被释放。

1938 年 8 月，父亲到香港迎接从海外归来的陶行知。杜月笙设宴给陶行知接风，在座的还有黄炎培和我父亲张宗麟。后来为了国难教育社募捐经费的事父亲又去过杜月笙家。11 月，陶行知由重庆再度去香港，通知父亲由上海去港，共同商议筹办育才学校。一天，香港中共地下党负责人廖承志通过方与严（生活教育社社员、中共党员）转告父亲："汉奸卖给日寇几条轮船，即将起航，你认识杜月笙，速找他设法截住。"父亲意识到卖船的严重性，立刻去了杜月笙驻港办事处。杜月笙听到此事也很气愤，不过要与日寇汉奸对抗，他还有些犹豫，没有立即表态。父亲再三劝他，晓以利害关系："船到日本人手里，不知又有多少中国人遭殃，你也是中国人啊！"杜月笙这才答应派人到码头截船，这几条船终于没落入日寇之手。这件事本是我父亲所为，可是前几年在中央电视台播放的《潘汉年》一剧中，却被张冠李戴地换成别人了。

当时父亲最主要的工作是代替陶行知领导国难（生活）教育社。这是救国会中人数最多的团体，下属单位有山海工学团、晨更工学团、余日章工人小学、普及教育助成会、儿童科学通讯学校、新安旅行团等等。在上个世纪 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生活教育社是中共的外围组织，下属单位的负责人都是中共党员。父亲代理陶行知工作后，领导和配合他们展开大规模的救亡活动。较突出的有：编辑一套抗战读本，由张宗麟主编，生活书店出版。这套读本在社员戴白韬、孙铭勋等的协助下，不到两个月

就印了二百万册，发行全国，影响很大。其次是由父亲筹款在沪西工人区办了30所工人救亡夜校。

那时父亲最费劲的工作是筹措经费。因为生活教育社下属的这些团体都没有固定的经费，要靠社会募捐，而募捐是没有定数的。1938年后，陶行知在重庆又创办了一所育才学校，父亲又增加了为育才学校筹款的重担。这所学校办起后，为中共培养了不少人才，许多烈士遗孤都曾在这所育才学校就读过，如现在的国家领导人李鹏等等。

为了保证各单位的经费供给，父亲除了募捐以外，还抽时间到光华大学、民治新专等学校教课，母亲也在小学当教员，这些收入除了家用开支以外，用来贴补募捐经费之不足。我在他们的遗物中曾发现厚厚一叠30年代国难（生活）教育社开给他俩的捐款收据，可见当年募捐任务之重。

## 出版《鲁迅全集》

1937年10月底，日寇包围上海，上海成了孤岛。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领导撤离上海，地下党决定让父亲留在租界继续做救亡工作。救亡协会领导撤离时，应该向上海市民做个交代，但因撤离匆忙，这个善后工作也交给了父亲。可是按照地下工作的纪律，既然留在上海工作就不应该暴露身份，但父亲已不能顾及其它，公开在上海广播电台做了一次广播演说，号召上海孤岛居民团结起来坚持抗战。于是张宗麟的名字就上了日伪以及国民党蓝衣社的黑名单。

在随时都可能被捕暗杀的险境中，父亲仍积极为抗日救亡运动工作。首先是与胡愈之等人组织了复社，出版了当时的禁书《西行漫记》、《列宁选集》和《鲁迅全集》。尤其是为了《鲁迅全集》的出版，他们克服了重重困难，才得以实现。许广平在七七事变周年纪念时写的《鲁迅全集编校后记》中曾简述：“溯自先生逝后，举世哀悼。舆情所趋，对于全集出版，几成一致要求。……不料七七卢沟桥事起，一切计划，俱告停顿。……幸胡愈之先生……手创之复社担当斯责；……复社诸君子，尽海上知名人士，董其事者，为胡愈之、张宗麟、黄幼雄、胡仲持、郑振铎、王任叔诸先生……六百余万言之全集，竟得于三个月中短期完成，实开中国出版界之奇迹。”

《鲁迅全集》的出版确实是奇迹，但广平先生说得太简单，未详述拖延原因。据父亲留下的材料中记载，实情是这样的：

1936年10月19日，鲁迅病逝。11月，沈钧儒、郑振铎通过蔡元培把遗稿交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并签订了出版合同。可是拖延一年没有动静，实质是国民党方面阻挠，王云五不打算出版。拖延到1937年10月后，商务印书馆借口内迁，把原稿退给许广平。这时恰好复社成立，决定出版《鲁迅全集》，虽然有些人不同意出版，但复社还是坚持把出版《鲁迅全集》当成一件大事来做。

1984年8月3日上午，我去拜望胡老（愈之）时，他告诉我一些当时的情况。他说“复社不是一般的出版社，地址实际设在我家，即法租界巨籁达路安乐村。我和你父亲分工，我管编辑，他管出版发行。那时你父亲每天到我家来办公。复社出书全靠救国会十多个负责人集资，采取以书养书的办法。先出《西行漫记》、《列宁选集》，赚到钱再出《鲁迅全集》。由于《鲁迅全集》一套二十本，成本高定价贵，一般人买不起。大家想了个办法，先印一批精装本，硬面装订，用木头书箱盛放，箱上《鲁迅全集》四个大字请蔡元培题，一百元一部，先印预约券推销。我在香港、广州、汉口等地销了二三百部，收到两三万元。后来由于郭沫若邀我到他领导的第三厅工作，我便把钱汇给你父亲，由你父亲负责出版发行。1938年《鲁迅全集》出版，受到广大进步读者的欢迎。”

除了复社的工作以外，父亲还创办了抗日救亡刊物《上海周报》和《译报》。《上海周报》自1939年冬创刊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侵入租界停刊，始终是上海孤岛最受读者欢迎的刊物。受地下党领导，父亲任社长，为了争取公开发行特地请了一位英国弗

利特通讯社的人挂名，

1937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国民党主和派仍妄图阻挠。“八·一三”以后，在国共合作时期的文化界救亡协会中情况相当复杂。1940年底的一天，国民党吴开先邀请我父亲及吴耀宗、沈体兰、郑振铎等各界知名人士谈话，企图用“曲线救国”说服他们。父亲听了大为愤慨，当场严词批驳这是卖国言论，并逐一揭露国民党迫害救国会，破坏救亡工作的卑鄙伎俩。吴开先大窘，谈话不欢而散。

## 奔赴延安

从此以后，父亲更成为日伪和国民党特务的眼中钉，决定要除去父亲。1938年，上海地下党得到消息，通知父亲避风。1940年底，国民党蓝衣社特务陈某投敌后发表了一本《蓝衣社内幕》，公布一份黑名单，父亲和许广平、刘湛恩等人都在上面。不久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即被暗杀。1941年底，珍珠港事变后，日寇占领租界，大肆搜捕抗日志士。1942年初的一天，父亲在八仙桥青年会开完会出来，听得外面当当两声枪响。原来特务把先走一步的浙江兴业银行行长当作张宗麟，连打两枪。幸亏未打中。

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1942年9月，父亲按照地下党的安排，撤退到新四军淮南二师驻地。

父亲在淮南根据地担任了几个月江淮大学秘书长，1942年12月底即参加新四军的一个小分队北上。分队队长沈其震，政委薛暮桥，队员大部是新四军卫生部人员。他们由淮南经淮北、苏北、山东、河南，到山西入太行山，渡黄河到陕北，沿途经过敌占区、国统区，危险万分。历经八个多月长途跋涉，父亲于1943年8月到达延安。

在延安，父亲受到中央和边区政府的热情接待。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设宴欢迎，父亲有“到家了”的感觉。在延安他参加边区政府组织的农村调查和普及教育的工作。他写的调查报告曾经毛泽东、刘少奇、罗迈等同志阅后，批给边区教育厅参考解决。后来他去延安大学任教育系主任，并由徐特立、谢觉哉任介绍人，重新入党。1943年10月，父亲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上被选为模范，出席边区参议会和边区政府会议。1946年8月，中组部分配他任北方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前身）文教学院院长，协助校长范文澜工作。北方大学与华北联合大学合并成立华北大学后，他又任四部（研究生部）教育研究室主任。北平解放前后，他任军代表，负责接管北平高等院校，后至教育部、高等教育部工作。

## “为陶行知辩护”被打成右派

1956年夏，高教部有一个去中央党校学习的名额，那时父亲因工作劳累旧病复发，组织上准备安排他去苏联黑海边的疗养院治疗，但他知道有这个名额后，坚持要求去中央党校学习。他希望通过学习今后能更好地为党工作，哪知这一去竟成了他一生中重大的转折，从此离开了人民教育事业，也株连了我和弟弟张闽以及我的前夫从维熙。

父亲主要的右派言论是为陶行知、陈鹤琴两位老教育家辩护。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陶行知、陈鹤琴一直是受中共和毛泽东推崇的，多次称他们是“党的忠实朋友”，对陶行知甚至称为“党外布尔什维克”。但是共和国成立以后，陶行知、陈鹤琴却成了被批判的对象。早在“三反”、“镇反”的时候，教育界在清算资产阶级反动思想时，就开始批判他们了。1950年10月，《人民教育》发表署名文章《杜威批判引论》；1951年发表《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积极意义吗？》；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文中甚至指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

至此，很明显，批判矛头不仅指向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就读的杜威弟子陶行知和陈鹤琴，

而且实际是指向广大与陶行知有联系、受陶行知教育思想影响的共产党员。1951 年 8 月 8 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周扬的《反人民、反历史的思想和反现实主义的艺术——电影 “武训传” 批判》,更进一步掀起了批判高潮。

父亲作为陶行知、陈鹤琴的学生,又是生活教育社的骨干,在党组织多次责令他批判陶行知的压力下,从没有作违心之言。1952 年 3 月 1 日,他在《人民教育》上发表的《对陶行知先生的认识和我的初步检讨》一文中,一开头就说:“陶行知先生是我三十几年前的老师,而且我做过他的得力助手,直至今日,我还敬爱这位老师。”他认为陶行知是靠拢共产党的。他在文章中说:“陶先生是无产阶级的朋友,是中国革命同盟军中最积极的一员,但不是领导革命的先锋队员,当然也决不会是反革命分子。”他认为某些批评陶行知的人“有些两面手法, 当面捧陶氏而又用笔名骂陶氏,太不应当”。他指出陶行知与武训不是同流人物,也不同意把陶行知拔高到和毛泽东相提并论。他认为必须把“中国小资产阶级进步分子陶先生的思想和美国资产阶级杜威的思想划分开来”。要求大家以“我爱吾师,我更爱真理”的精神来参加讨论。

可是当时的政治形势证明父亲的要求是幻想。陶行知在许多人的笔下被歪曲成“资产阶级改良分子”;“所谓的人民教育家不过徒有虚名”;“陶行知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用反动的美国资产阶级实用主义哲学来麻痹人民”;“是反马列主义的精神鸦片”等等。

这种乱扣帽子的批判压服不了父亲,他在 1956 年 7 月上交中组部的自传中依然写道:“我爱很多师友,惟独对陶行知先生不但爱而且十分敬。……他在 1930 年晓庄被封,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以一个英勇的民族救亡运动者出现了。从此以后,他紧紧跟随我党。他的周围有不少中共党员……经常帮助他做了不少工作。他直至暴病而死,始终是一个革命斗士,是我党的亲密朋友……”

父亲对陶行知这样评价,当然不会让某些人满意。父亲的自传被勒令几次改写,但他仍不改变。

1957 年早春,党中央号召鸣放。父亲不了解毛泽东的真实意图, 以为真的是广开言路了,就写了一篇题为《关于陶行知先生》的文章,交给《人民教育》。没想到当时形势突变,发表时已是 1957 年 7 月,开始揪右派分子了。

这篇文章驳斥了所有对陶行知的批判,指出推崇陶行知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的不是别人,正是毛主席在陶行知逝世时的悼词中所说的,而这是我党对陶行知极正确的评价。父亲在文中建议人民教育出版社立即编印出版《陶行知全集》。

除了这篇文章,父亲在鸣放的时候还直率地对当时一些敏感的政治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这些多是中央党校安排在党小组会上讨论的,比如关于毛主席自己提出不拟连任下届政府主席,父亲表示:“这样做是英明的”。他还建议中国宪法应该考虑修改,国家元首应该有一定任期。对于斯大林问题,父亲认为斯大林的错误不仅是思想方法问题,而是为了巩固他个人的专断独裁。父亲是一位长期从事高等教育工作的内行,所以他对当时高等教育的政策、管理、教学方法、师资配备等方面提出不少适合我国国情的建议。

这些意见可以说都是正确的,是一位老共产党员通过正常渠道向党组织提出的。但是在 1957 年却成了右派反动言论。《关于陶行知先生》一文,更成为他替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教育思想翻案的罪证。父亲在中央党校受了四个月的批判,被开除党籍,退回教育部监督劳动。从此不再让他从事教育工作了。

## 赋诗对儿诉苦衷

父亲被打成右派后非常痛苦。他本来是个病号,四个月的批判使他旧病复发,健康迅速下降。就在此时,1959 年 1 月,教育部党委安排他去北京昌平南口三堡劳动。那年冬天北京气温是摄氏零下二十多度, 南口正当风口,加上走时仓促,连寒衣都来不及准备,父亲只穿了一套还是在根据地时发的棉衣出发。到了南

口分配给六十岁的父亲干的全是筛沙子、抬石头、筛煤、运土……

在南口虽说是惩罚性的监督劳动，他仍尽力去干，不以为苦。倒是一些歧视伤了他的心。一次有人称他一声“张宗麟同志”，马上一个被派去监督右派劳动的人大发脾气，说称“张宗麟同志的”那个人违反了党中央的指示，怎么能叫右派“同志”？这是立场问题，要他检查。父亲只得出来打圆场，对大家说：“我姓张，叫我老张好了！”后来他照了一张头戴毡帽、身穿破棉袄的相片，题了一首七绝送给我：

脱却新衣复旧装，
皤然须发气轩昂；
阿儿识得阿爹否？
六十年来一老张！

艰苦的劳动终于把父亲累病，三堡的管理员不得不送他回城。他能起床后，又被分到教育部图书馆监督劳动。

“文化大革命”中，教育部每次批斗走资派，父亲都被拉去陪斗。他挨过打，做过“喷气式”，写过无数份交代检查，检查的重点是20年代至40年代，他入党后在晓庄师范、生活教育社、救国会、“孤岛”上海……为党为革命所做的种种工作，这些到了“文革”都成了说不清的罪行。

60年代末，他总算摘去右派帽子，换上另一顶“摘帽右派”的帽子，下放到安徽凤阳干校劳动。七十岁的父亲与青壮年干部一起下地干农活，后来又被安排去烧锅炉。1972年的一天，父亲与教育部一位副部长抬着一大桶水向锅炉房走去，这位副部长突然瘫倒，把父亲拉得也跌了一跤。这位副部长不久就去世了，父亲也跌得不能起床，干校军代表才批准他回北京。

1975年，我因病从劳改农场回京。这时父亲已是老态龙钟了，成天卧床。我知道他的内心与肉体都很痛苦。虽然他受到种种无理的迫害，可是爱党爱国之心未变。他给我看过一首他在1971年生日时写的抒怀诗：

老去无成莫自悲，
夕阳西下有余辉；
秋林晚照丹枫舞，
远浦颓光白鹭飞。
气贯长虹争鹿马，
胸怀赤胆忘安危；
白头永葆青春志，
一息尚存志不违。

不违青春志的父亲，凭着识途老马的预感，相信中国共产党必定有“自净”的能力。他常常用放大镜看了报纸后，喃喃自语：“会变的！”又常常鼓励我：“要坚强地活下去！”

父亲没能等到平反。1976年10月14日，他因脑中风逝世，终年77岁。

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党校落实政策小组在《张宗麟同志问题的复查结论》中写道：“张宗麟同志的言论并非恶意的诬蔑和攻击；不能说是对毛主席的污蔑。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我们认为张宗麟同志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应该实事求是予以改正……”

同时，教育部党组织为父亲举行了追悼会。悼词说：“张宗麟同志是我们党的一位好党员，教育战线上的一位老战士。他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党的教育事业……张宗麟同志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老同志、老战友，是教育战线上的一个损失……”

但是，这个损失永远无法弥补了。

胡愈之老人曾沉痛地对我说：“我不懂为什么你父亲会成为右派。1957年教育部有好多人被打成右派，有些是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社的人，也就是当年救国会的人，他们怎么会是右派呢？我和你父亲关系很深，完全相信他是革命的，怎么重新入党以后，反倒成为右派了呢!？”

这些“为什么”，应该彻底弄清楚，可是，我又能问谁去呢？

（责任编辑　方　徨）

# 1936年的四川大饥荒

● 郑光路

## 全省遭灾，饿殍遍地

1936年到1937年上半年，久旱不雨，灾情蔓延全四川。国民党《中央日报》现场报道了剑门关内的饥荒：

“梓潼一宿，路愈曲折险峻，土色赤红，重山裸露，草木稀疏，益觉不胜荒凉辽阔，至此始知已入重灾区矣……计全县无一处不受旱灾，以树皮草根白泥作食者约十八万人……民食恐慌，已达极点……倘非亲历灾区者，将不信四川夙称天府之国，人民生活竟一降至于如此，恐直与阎罗鬼国相似矣……”

一队黄发碧眼的“国际社”外国记者，行进在巴蜀大地。田野龟裂，千里荒凉，饿殍遍地……外国记者们坐在颠簸的车上，看见幼小儿童提着大竹篓，不顾危险爬上枯树上摘叶充饥，而树叶几乎早已被捋光了……车好不容易开到川北重镇遂宁县，成千上万灾民流难到县城觅食。饥民多半是老弱妇孺，衣衫褴褛，孩子们则多赤裸全身，骨瘦如柴……这些外国记者嗟叹着摄下饥民流离失所的景象。

历史悄悄过去。直到1996年初，台湾的徐宗懋先生在台北中华历史工作室档案中看到这批“国际社”外国记者关于四川饥荒的照片，内心为之震撼。他将图片寄给山东一家《老照片》出版单位，说：急于找出关于这一场饥荒的记载，然而正式史料皆无记载。

本文作者查阅大量地方志、文史报刊资料，非常吃惊地发现：那场四川大饥荒之真实情景，惨烈程度十分惊人，远非那组老照片所能反映！

从1930年到1937年，是四川近代历史上天灾人祸频繁、民不聊生的年代。旱灾、水灾、雹灾、虫灾、匪灾……连年不断。据当时报纸和省“赈济会”公布的资料，1932年全省有16县受灾，1933年增至53县，1934年为101县，1935年为108县，1936年、1937年几乎无县不灾。而人祸更可怕，军阀割据，连年混战，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富户乘势囤积居奇，米价疯涨。

水旱灾严重的1934年，饥民靠野草、树叶、树根、白泥（俗称观音土）苟延残喘。省政府不断收到告急文书：邻水县几天内就饿死300多人；古蔺县饿死3000余人；泸县白节镇饥民抢挖白泥30余处，深数丈，以致岩土崩溃压死多人；铜梁县斑竹乡饥民挖掘白泥，岩石崩坍压死30余人。（见1934年4月29日重庆《新蜀报》）因食白泥土闭结而死的新闻也不断。

活不下去了，兴文县饥民组织集体“吃大户”，他们写的“告白”字字血泪：“连年水旱，绝少收成，卖儿则无人承受，贻妇则有户皆穷。饥肠辘辘，众口嗷嗷。菜草已难于采撷，泥土不能供滋养。肩炭一挑，终日不遇买主，沿途乞食，到处辄少炊烟。前途茫茫，恐尽人皆饿殍。况复地方大富，方据粮以居奇……言之戚矣！故特约集垂绝之贫民，为吃大户之组织。凡可果腹，即可请求，其他衣物，不准夹带，俾有别于土匪，庶延续乎残生。谨此告白，同人垂鉴。”（见1934年5月18日重庆《济川公报》）尽管饥民实属无奈去“吃大户”，威远县政府仍诬为“匪类”，加以拿办。

四川省政府向中央政府告急请求赈济。国民党中央官样文章，照例批交内政、财政两部处理。被内忧外患弄得焦头烂额的蒋介石在牯

岭公开说："水旱都要中央拿钱赈济，试问中央以有限之财力，何能补助你们川人。"（载《国民公报》）

就这样，四川老百姓在战乱饥馑中迎来更为恐慌的1936年。各路告急文书雪片般飞到省政府：岳池县，去年（1935年）至今仍无雨泽，粮尽食绝。渠县，全县去秋至今均遭亢旱，灾情异常严重。宣汉县，久旱不雨，田土龟裂，十室九空，饿殍载道。巴中县，去秋至今，久旱不雨，粮食绝乏，盗食死尸。松潘县，连遭水旱，春无种籽，人无口粮。南溪县，水潦之后，继以旱灾，土地龟裂，无法耕种。蒲江县，水灾奇重，田庐人畜洗刷一空。新津县，河灾泛滥，街成泽国。新繁县，淫雨为灾，田亩冲刷，粮食损坏。除成都盆地各县外，都是灾区，受灾大约3700余万人。

1936年至1937年四川大灾中饿死的人数，没有精确统计数字。但从下面零星资料中不难想象：

国民政府参政员黄炎培先生来川视察灾情，路过简阳县，惊讶之余说："简阳为行'新生活'的地方，街间倒毙之饥民，至于无人收尸！"

1936年4月23日重庆《新蜀报》上《宣汉通讯》说："本县饿殍遍野；据前20日中统计，每场饥饿死者，日在10人以上，近复渐次增加，每场日达20人左右。"同日《绥定通讯》上说："现在万源人口骤减三分之一……万源城中，亦仅稀稀千余人而已。如旅行长途，整日难见炊烟，沿途倒毙饥民几无地无之。"该报5月2日《南江通讯》中还说："总计城乡饿死者，每日达千余人……2月1日迄今（按指5月2日通讯时），该县饿死的饥民不下8万余人。"

川北旺苍县是重灾区。黄洋乡当年160户587人，就饿死71人，占总人数的14.83%。据旺苍《百丈乡志》载："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农历丙子，大旱。田地龟裂，沟渠干涸，河水断流……所种玉米，远望一片枯黄，可点火烧。秋禾无收，百姓无存粮，处于绝境。百丈境内，日死数十人，甚有全家饿死者。溪边、道旁、桥下，举目可见饿殍死尸，盛传人相食……"

大量饥民涌向市镇乞食，饿死街头巷尾。请看旺苍县一个场镇上的饥民的悲惨情景：72岁老人谌洪发回忆，丙子（1936年）年有天在王子珍锅厂外，他亲眼看到饿死48人。饥民饥不择食，当时本街熊大湖运回两缸烧酒，缸底破裂酒流满地。有人大吼一声："酒倒地了啊！"栖息王家锅厂的饥民蜂拥而来，趴在地上连泥带酒喝得一干二净，身体稍好点酒醒后，慢慢又回到锅厂的空屋子里。气息奄奄的饥民喝酒后，醉死在地，横顺的摆了一坪。有位吃斋念佛的杨素客不忍心，从三街化了些钱，雇人把死尸抬到灵溪寺万人坑中。饥民成群上街乞食，饥饿难忍，见食物就抢。凡是卖熟食的，手里拿根棒防抢。有的饥民抢食物挨打，也有好心人抢了就算施舍了。

西河乡灯塔村张克政说，丙子年3月他走到文昌宫，看到庙里饿死的有10多个人，还有饥民在烤死人肉吃，有人把庙里的死人用绳子向外拖。河边石灰窑周围也死了一些人，沙包上已埋了20多个。

木门镇下街棕匠石显其说，二、三月间，上街要饭吃的饥民多得很，在文昌宫、关帝庙三个会馆里，每天饿死十多人。

石懋修回忆，饿死在大路旁的饥民也到处可见。这年三月初，父亲和他去赶后坝场，20多华里的大路上，来往看到的死人有12个。我们去的时候，看到路上偏偏倒倒的饥民还在走，转来时有的饥民已倒在地上了。那些尸体的大腿、臀部上被割得血淋淋的。还在路上走的饥民，衣服褴褛、骨瘦如柴，脸带黑浸色。两颧骨高耸，两眼深凹，两颊皮肉下垂，看一眼令人胆战心惊……（以上见石懋修回忆文章，载《四川文史资料集粹》第6卷）

1937年四川仍为大灾。1937年3月号《北碚月刊》载文："懋功月来饿死的人，已有数百；合川每日饥毙者，全城达15人以上。"3月10日《新蜀报》报道："武胜县每日饥毙人数，在400人以上。"4月14日天津《大公报》社评写道："成渝公路两旁，为四川最富厚之区域，本年2月份统计，沿线饥饿倒毙之不幸

同胞达 3000 余人;3 月份之中、单成都至内江段五百里沿线,饿殍遗骸亦在 300 具以上。”《申报》载:“仁寿县各地有全家饿死者,南江第二区两月内即饿死二千余人。”

4 月重庆《涪陵通讯》上记载一条全家饿死的悲惨消息:“本县鹤游坪王家沟居民谭九风,原有田十余亩,自耕自作。连年天灾颗粒无收,生活绝源。草根树皮,亦早经取尽。有三女二子,皆幼稚无知,先于正月将长、次两女饿死,二月初旬又将幼子饿死,夫妇五旬有奇,饥寒交迫,动举维艰,抱头痛哭,甚为惨凄。竟悬梁自缢而亡!”就这样,好端端的一家死绝了。

## 惨绝人寰 饥吃人肉

更令国人震惊的,是四川频频传来惨绝人寰、饥民吃人肉的可怕消息。

1936 年 5 月 4 日《天津日报》载《成都通讯》说:“今年树皮吃尽,草根也吃完,就想到死人的身上, 听说死尸的肉每斤卖五百文,活人肉每斤卖一千二百文。‘省赈会’特派员王匡础到六口场视察,在一肖姓的屋里发现女饥民张彭氏、何张氏等围食死尸。通江麻柳坪有一妇女杨张氏因生活艰难,携其六七岁及九岁的两个女儿向他处逃荒。不料走不远时该妇倒毙道旁,二女饥极,就在她娘身上啮面部及身上的肉充饥。”饿极小儿啃食母亲尸肉的残酷情景,令人咋舌。

四川遂宁县饥民流落到城里觅食

万源县饥民吃死人肉已是见惯不惊,更可怕的是杀及活人及小孩充饥的事。1936 年 4 月 10 日《重庆快报》载《邻水通讯》说:“近有桐木洞贫妇邱氏因迫于饥饿,将其 3 岁小女杀而食之,以延旦夕之命。”同一天的《赈务旬刊》载:“涪陵饥民、丰都饥民,烹子充饥,杀食胞弟。苍溪饥民,阆中饥民惨食子女,烧食小孩。”

饥荒使人性泯灭、变态,令人发指的人吃人的悲剧层出不穷。旺苍县余家沟有个秦老幺,他两个儿子饿死后,秦老幺把儿子身上的肉割下来吃了,但最后他还是饿死了。

石懋修回忆: 木门文昌宫叫孟利生的,全家 3 人,他母亲和妹妹都被饿死,他饿得没法,母亲刚死,即将她的一对奶奶(乳房)割下,先煮了一个在铁罐里, 然后出来又哭又说:“我妈死了,身上的肉被人割了。”街上的人去看,果然被割得血迹淋漓,问他铁罐里煮的啥? 他说:“牛脑髓!” 打开一看,一个人奶煮得乱糟糟的,再从他筲箕里一看还有一只奶奶。他当即被群众打骂了一顿。有的说:“他也不行了, 饶了他吧。”

普济鱼池湾(今中江村)杨传兴全家 5 人,妻子和儿媳都被饿死,只剩下一个几岁的孙女。一天晚上, 杨传兴饥饿难熬,用刀把孙女砍死吃了肉,在砍的时候被邻居听到那女子直叫:“莫砍我, 我长大给你拣柴呀!”后被家族知道要处理他。

因饥荒吃人的案子频发，官府也无可奈何。《新民报》上的一篇《巴中通讯》记载了另一惨闻："巴中县第一区贫农曾明国夫妇煮吃人肉充饥，经县府于2月15日抓获审讯，据曾明国及妻刘氏同供：金宝寨人，年50岁，有小子女各一，佃张姓山地耕种。去年大旱，半年不雨，野无青草，饿殍在途，我家只得沿门求吃，不得一饱，延至腊月十二日，饥寒交迫，奄奄待毙，因见路边饥毙乞丐中，有白姓二小孩，想前人有荒年吃人之说，是夜取回屋，去其肠胃头骨，煮肉作食，藉以充饥肠。不数日，饥毙一张姓小孩，复行取回，如法煮吃，嗣将年终，窃见赖姓埋有已毙之小女孩，我就先后刨回，仍如法炮制，收贮两桶，存作过年度岁之需，忽被团正查出，说我吃的活小孩，解送我来案。我实固生计断绝，没有办法，所以偷吃死尸，请调查施恩等语。县府以其饥寒所迫，亦甚怜悯，惟前后煮吃四小孩，究系乘其将毙而食之，抑或盗取死尸煮吃，候派员查勘真实后再行核办。"李石锋先生有幸保存下这张报纸剪报，报上有张照片：头缠布帕身著破褂赤脚的曾明国，满脸茫然愚昧可怜状，两提桶内装着储备度荒的人肉，地上摆着三个人头……这篇题为《曾明国饥饿吃人图》的剪报后刊于《龙门阵》1982年6期。

曾明国吃人只是为活命，而一些人灾年中丧失人性，已成兽类。石懋修回忆：鹿停溪有个康三春，他家女子饿死后，康把她身上的肉割下来吃，认为比野菜味道好，便到处找死人吃，后来竟发展到吃活人！他家在岔路口上，有人过路时，他乘机将人打倒在地勒死，把死人肉块装在缸里，将骨头埋在窖中。有人听他说："小娃儿肉好吃不出门，小伙子肉好吃打不赢，老婆婆的肉吃起绵得很！"康三春吃人肉的事被揭发，联保处去抓他治罪，他逃外地。

木门场下街大桥巷还有个趁乱世卖死人肉挣昧心钱的孙×光，先在本地名为卖牛肉，实际是卖人肉，有时一两个人吃肉时，他见周围无人，随手将吃肉的人打死。牛肉里面掺人肉，被人在联保处告发，即派团丁孙骞、谭正明去检查。孙、谭二人也装着买肉吃，先问孙×光："是啥肉？"答："牛肉加野猪肉。"两人说："只买半碗……"在查出事实后，将他抓住绑在石门枋上审问，孙×光供认不讳，群众无不唾骂，最终严惩。

## 拜神求仙 "抗灾赈荒"

曾在当时省政府任职的甘典夔回忆：为赈灾，省政府好不容易向银行借入131万元，又由民政厅筹款10万元，共140余万元。区区赈款，如按灾区120余县平均分配，每县仅一万元；如按受灾人口三千余万人平均分配，每人仅能得四分钱。一些办赈人员昧尽天良从救命钱中刮油，如蓬溪县公安局长陶子国竟吞食赈款一万多元。灾情如此惨烈，军阀当权的省政府，仍严征课税，驻军拉夫征丁。

国民党中央政府对四川省灾情更是漠然。1936年6月15日《西南评论》载："蒋介石来川招待绅耆时，省赈委会主席尹仲锡将灾区照下来的人吃人的照片交蒋，蒋阅后放在袋内。"此后便无下文。当时还传闻：某地军阀驻军一声令下，操场周围机关枪开火，集中火力，把一千多闹事抢粮的饥民一扫而光。

张鉴虞先生回忆：下面各县政府，只好鼓吹"自我救灾活动"。合州县三庙镇联保主任何宴平，声称他试验成功一种"救饥丸"，黄豆、芝麻作原料，三蒸三晒，从戌时蒸起，至子时止，寅时出甑，午时置日中晒干，每服一丸可三日不饥，七升黄豆和三升芝麻可以救济六七百人。一时间，各种救灾"验方"、"神药"纷纷问世，可惜都是纸上谈兵。

病急乱投医，为愚人自愚，各地纷纷"拜神祈雨"。据当时重庆《商务日报》1937年5月1日报道："成都绅耆善士联合组织办祈雨法筵，于北门石马巷玉参慈善会内，由二仙庵退隐老方丈王伏阳法师主坛，并由省赈会主席尹仲老手撰祈雨疏文。"

该报5月3日又登出省政府官员亲临祈雨的新闻："4月30日晨间，省政府民政厅长嵇祖佑氏，乘车赴石马巷玉参慈善会祈雨法筵拈香……嵇厅长恭诣皇坛行礼，并有疏文一

道，略谓：‘具疏下民嵇祖佑等，为吁恳天恩早沛甘霖，以恤民命，而宏救济事……谨疏！’”

身为四川省主席、21 军军长的刘湘，对四川大灾荒无计可施。他本极迷信，也寄救灾希望于神仙、异人身上。当时最蛊惑人心的当属执掌“一贯先天大道”的威远县人刘从云，人称刘神仙，先后开设了 108 个坛馆（即分部、又叫“108 只舟”），广收门徒。这位刘神仙，利用扶乩占卦、祈福养生等手段，将刘湘、刘文辉、杨森、范绍曾、贺国光等川内军阀和党国要人，都罗致为门徒。刘湘“入道”后，道名“玉宪”，在重庆成立“事圆馆”一只舟，计 108 人，又称一百单八将。刘神仙得意洋洋说：“从此英雄入彀了。”其实，刘湘入道门，是想以教治军，利用宗教迷信约束其部属。当时人说：“刘湘耍神仙，神仙耍刘湘！”他和刘神仙各有所图。

刘湘此时在重庆，对刘从云躬身作礼：“蜀中大旱，恳我师广施大法以求甘露，以救百姓！”刘从云说：“请将军朝天门内搭二丈高台，再派生肖属龙蛇之兵丁，我自有法……”

刘从云选定时日，身著道袍、仗剑披发拜神弄鬼。按刘从云之令，36 兵丁按地煞之数、取北方壬癸之义，手执画戟、幡旗。香烟缭绕中，刘神仙踏罡步斗，口中呢喃有辞。已值世界科学昌盛之时，却仿佛愚昧蛮荒年代，很为当时有识者嗤笑。

此后，刘湘和国民政府特派代表朱庆澜等，还率省城官员到佛教名寺文殊院内礼佛祈雨。青羊宫的道教、四圣祠的天主教、老皇城西侧的伊斯兰教，祈祷声声连日不绝，用心良苦，可惜于事无补。

四川大学教授朱青长搜寻典籍，从汉代董仲舒《春秋繁露》书中发现一个“解旱古方”，献策于刘湘。刘湘明令各地对民间祈雨活动一律保护，于是各县政府在抗旱救灾中迷信鬼神求雨，如设坛“赶旱魃”、大唱《目莲救母》等 24 本连台川戏。对这些拜神祭鬼，官府大加鼓励；认为天降大灾，乃人心不古老天惩戒。如南充县长还捧香领队，去龙王井（上渡口）迎水，率领大群和尚、道士沿途念念有词。然而这一切活动都不灵验，钟磬锣鼓、香烟缭绕中，人越死越多。

各路神仙妖人也纷纷出道，怪闻不绝，令人真伪莫辨。1937 年 5 月 4 日，重庆《国民公报》又登出奇文：“余道成，某县人，精通奇门遁甲，法术高妙，去年夏季三台久旱不雨，县中善人曾请其设坛祈雨，果如其言，大降甘霖。又如去年夏，大水几上河街，后经其用板凳数条拦住水边，施以法术，水头即至此退去。祈雨时，用水缸盛树叶变为金鱼，即可下雨。因言多奇验，均目为神，一般人尊称为余老师。遂宁苦旱，该县商会、红十字会、平粜会、救济院特联合敦请至遂宁设坛祈雨，以救人民。”

又据说：宜宾专员冷寅东，认为吃白泥巴观音土可疗饥救荒，请某大学鉴定。上海科学家回信称：白泥含有人体所需要的矿物质，吃百斤可获热能三百卡云云。冷兴奋地上报刘湘，刘湘批示省政府转发到全省各市县，希冀靠白泥巴救灾。

南充的张恢先等人回忆：各地灾民吃了这种“有科学根据的”神仙米（白泥巴），排不出大便，腹胀如鼓，匍匐呻吟，胀得喊爹喊娘，死亡者难计其数。当时人编顺口溜：“吃了神仙面，胀得光叫唤。屙又屙不出，只有上西天！”

只能靠拜神弄鬼救灾的年代，无依无靠的老百姓确实只有依靠看不见摸不着的老天爷了！

这场大饥荒从 1936 年熬到 1937 年，几场雨后才逐步缓解。到了 7 月 7 日，抗日战争正式爆发，一年多后四川提供大量人力财力和粮食，成为中国抗战大后方。

遂宁县公园中一棵被剥开树皮露出白心的大树，县立图书馆馆长李义君在树下立碑，碑文写着：“荒年之树——民国二十五年，秋收荒欠，入冬复数月无雨，麦浅叶枯，瘐死饥民成群，剥树皮，掘草根以食，在公园不能禁，此树即其剥后所遗残形。特留志，以供研究社会现象者之资料，且以促官吏对于为政者之警惕！”

可惜这让“为政者警惕”碑早已不存了。

（责任编辑　吴　思）

# 想到康生的作恶

● 李 庄

“文化大革命”以后,有个巨奸大憝揭批不够,就是万人侧目的康生。康生作恶多端,死后最终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罪有应得。

人们不禁要问,他为什么能够混迹革命队伍多年,官越当越大,最后竟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 直到“文革”结束后的 1977 年 8 月 1 日,在建军节五十周年庆祝大会上,他的名字还位列周恩来、朱德名字之后,被称为“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鞠躬尽瘁的”老一辈革命家? 直到 1980 年 10 月 16 日中共中央才作出决定:开除他的党籍,撤销对他的悼词。

我很幸运,从来没有在康生直接领导下工作,没有受过他的直接折磨。但从接触到的一些历史材料,对他的无耻、狠毒仍然触目惊心,对他的善变、会拍更是厌恶透顶。他在莫斯科迫害留学的革命者。李立三推行“左”的路线时,他把李奉若神明。李失势后,他高呼“王明万岁”,成为反李的英雄。王明不行了,他又成为反王明的积极分子。从此身居高位,一直到死。参加过延安整风的干部不会忘记康生在“抢救运动”中的罪恶表演。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学术界永远记得康生陷害马寅初、杨献珍、孙冶方诸大师的罪行。就是这样一个坏人,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即被任命为权倾中国的中央文革小组顾问, 因为充当高级打手有功,最后竟爬到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高位。

我听过康生几次报告,印象最深的是他就中共九大通过的党章作的“训示”演说。演说的主旨是吹捧新党章定林彪为接班人是中国共产党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贡献。我当时以待罪之身,当然不能作任何表示,但心里却想,世界上如果选拍马专家,康生准得第一。事先指定谁谁接班,是封建朝廷的做法,在任何意义上都不能同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相联系。康生把专制、落后说成中国共产党的创造,只能令人民群众、共产党人齿冷,使极少数人开心;作此“伟大创造”的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当然英明无比,被定为接班人的人当然绝顶优秀。康生鼓噪这些胡言乱语,可说用尽了拍马的心机,也暴露了他的极端无耻。

这么一个恶棍,为什么在几十年间、几个时期都“转得拢”? 我感到不解、不平。为什么人民群众的意愿这么难以表达? “文革”结束以后, 我实在想尽一点力量。机会终于来了。1979 年春天,王敏清同志带着一篇手稿《爸爸的眼睛——记我父亲王世英持续三十年的一场斗争》到报社访问、投稿。王敏清是一位优秀中年医务工作者,后任中央卫生部保健局局长,我俩原不认识,他看到《人民日报》在“文革”以后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表现积极,又听说我在报社工作,“文革” 中长期挨批“靠边站”,指名要见我。王世英同志 1924 年参加革命,1925 年加入共产党,曾任广东省港罢工委员会工人纠察队长, 后长期从事 “兵运”、情报、统战工作,对人民革命事业有重大贡献。解放战争初期,他担任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军委敌工部长,解放后任山西省省长。王世英同国民党、日本侵略者斗争 20 多年,是胜利者;同康生斗争 30 年,“文革”初期受康生迫害含冤而死,不能不说是共产党历史上一种特殊现象。这篇文章主要记述这种特殊现象。文章说,远在 20 世纪 30 年代后期,王世英就向党中央揭发康生的丑恶历史和罪恶行径,并在多人联名上书党中央的揭发材料上第一个签名。1942 年整风时,康生伺机报复,诬陷王世英是特务。王世英看到毛泽东, 坦然说:“主席,我是不是特务,十年以后再看。”毛泽东十分满意,表示“你这个态度好,真金不怕火炼”。康生陷害不成,转而拉拢:看望、送礼、请吃饭……王世英不为所动。“文革”开始,康生立即指使打手对王世英百般摧残, 王于 1968 年 3 月 26 日含冤逝世,王敏清等也受到严重迫害。

历史总在前进,有时步子大一些,有时显得缓慢。1979 年 1 月 24 日终于在北京举行了

王世英等几位同志的追悼会，邓小平同志主持，对王评价甚高。一些老同志写了悼念王世英的文章，但王世英被谁迫害而死，那时还得隐其姓名。时间不短了，难道康生的面目就是不能揭穿？我们就不能作一点事情？我接到《爸爸的眼睛》半年之久，看看，放下；放下，看看……这当然说明我的软弱，也与当时还没有公布康生的问题有关。直到1979年9月24日才决心发表此文。因为有些内容是人所未言，估计有点风险，所以未同其他负责人商量，我准备个人承担责任。还好，没有受到批评，还接到不少老同志鼓励的电话。有此理想结果，可能在于"变通"。全文避开康生二字，只说"那个理论权威"，但是读者一看就知是谁。

"文化大革命"给我们国家造成严重的多方面的损害，我个人认为，对法制的破坏特别值得重视。新中国建立以来，法制建设本来就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弱项，"文革"强调"造反有理"，提倡"无法无天"，指责"乱得不够"，以致许多罕见事件大量出现，空前加大了"文革"后拨乱反正的工作量。报社虽然只是一个新闻单位，也经常为这种事情大费脑筋。


| 书名 | 作者或主编 | 定价 | 邮费 |
|---|---|---|---|
| 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 | 师　哲 | 32.00 | 4.00 |
| 陆定一传 | 陈清泉　宋广渭 | 29.80 | 4.00 |
| 回首"文革"——中国十年"文革"分析与反思（上下册） | 张　化　苏采青 | 59.80 | 5.00 |
| 一位人民日报老记者的笔记 | 纪希晨 | 49.00 | 4.00 |
| "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的中国 | 张湛彬 刘杰辉 张国华 | 25.00 | 4.00 |
| 昨夜西风凋碧树 | 徐光耀 | 15.00 | 3.00 |
| 直言——李锐六十年的忧与思 | 李　锐 | 29.50 | 4.00 |
| 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 | 杨奎松 | 29.80 | 4.00 |
| 石破天惊 | 张湛彬 | 29.00 | 4.00 |
| 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 | 吴　思 | 16.00 | 3.00 |
| 野百合丛书（共六册）（邮购全套六册邮费9.00元） | | | |
| 之一 王实味——野百合花 | 黄昌勇 | 14.60 | 3.00 |
| 之二 胡　风——死人复活的时候 | 晓风 梅志 | 18.80 | 3.00 |
| 之三 王造时——我的当场答复 | 叶永烈 | 15.00 | 3.00 |
| 之四 顾　准——民主与"终极目的" | 罗银胜 | 16.00 | 3.00 |
| 之五 储安平——一条河流般的忧郁 | 谢　泳 | 14.80 | 3.00 |
| 之六 罗隆基——我的被捕的经过与反感 | 谢　泳 | 16.60 | 3.00 |
| 知情者说 第二辑 (共八册) (邮购全套八册邮费12.00元) | | | |
| 之一 | 肖思科 | 15.70 | 3.00 |
| 之二 | 张树德 | 13.90 | 3.00 |
| 之三 | 魏敬民 徐　林 | 15.10 | 3.00 |
| 之四 | 程　瑾 朱　仁 | 14.50 | 3.00 |
| 之五 | 万　须 木　心 | 13.90 | 3.00 |
| 之六 | 山　椿 | 15.10 | 3.00 |
| 之七 | 庄　园 郑宏颖 | 14.50 | 3.00 |
| 之八 | 范广群 霍　岩 | 13.90 | 3.00 |

## 代购代邮

**《"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的中国》**本书将告诉您：周恩来提出辞去总理职务请求的原因；邓小平坦言他也犯过错误；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检讨的经过；朱德军中职务下降的起因；三年困难时期的中南海；赵树理与陈伯达相近的感受。

**《知情者说》**是历史关键人物留给后世的真相，该书介于历史与纪实文学之间。它的特点是少有文学作品的虚构成分而追求材料的真实可靠和鲜为人知，具有极强的可读性。第二辑收入了共和国历史上政治、经济、文化、外交领域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实录，并配以珍贵的历史照片。

**《回首文革》**上下两册各自汇集了三十六七篇文章，上册侧重总体分析，下册偏于事件介绍。作者阵容整齐，皆为高层当事人和权威级研究者。

欲购者可直接将书款汇至炎黄春秋杂志社。

**社　址：北京东城区戏楼胡同1号**

**邮　编：100007**

**收款人：炎黄春秋杂志社发行部**

# “知北游”日记

## ——1949年一些文化名流的心态和际遇

● 袁小伦

### 模糊的光明

“知北游”是一次从香港到北京的秘密旅程的雅称。全国革命胜利前夕，应中共中央之邀，众多在港民主文化人士，由香港分局派人分批护送北上，参加新中国的筹建活动。其中较重要的一批在1949年2月28日登上一艘挂葡萄牙旗的“华中轮”离港，共有20多人，按年龄大小排列有陈叔通、马寅初、包达三、张䌹伯、柳亚子、郑佩宜、胡墨林、叶圣陶、张志让、宋云彬、郑振铎、傅彬然、沈体兰、邓裕志、王芸生、徐铸成、曹禺、赵超构、刘尊棋、冯光灌、郭秀莹、吴全衡、方瑞、包启亚，还有郑振铎的女儿郑小箴，胡绳和吴全衡的两个儿子，5岁的项伊朗和1岁的项锦州。3月1日黄昏，叶圣陶出了一个谜语：谜面为“我们一批人乘此轮赶路”，谜底为《庄子》篇名一。结果被宋云彬射中为“知北游”。“知”即知识分子，“知北游”意谓文化人北上。

50多年过去了，“知北游”的日记也陆续公开。笔者在阅读了其中的三种即叶圣陶《北上日记》（载《人民文学》，1981年第7期）、柳亚子《北行日记》（载柳无忌等编：《（柳亚子文集）自传·年谱·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宋云彬《北游日记》（载《新文学史料》，2000年第4辑）后，体会到“知北游”颇有值得圈点的地方，它既是文化人憧憬无限和激情满怀的光明行，因为一个史无前例的新事业正在远方召唤他们，也是多少让他们觉得有些困惑的新的跋涉，因为对新的环境有些不适应，还有浪漫诗情与现实政治的冲突。

“华中轮”上充满快乐的气氛。在带队的中共党员吴全衡的操持下，从3月1日到4日，天天举行妙趣横生的晚会，让笑声掌声与海浪交响。3月1日晚会，柳亚子日记：“有评剧清唱、民歌、粤唱、讲古、魔术及集体游戏等，兴趣颇佳。”叶圣陶日记：晚会上“包达老谈蒋介石琐事。曹禺唱《李陵碑》、《打渔杀家》，邓小姐唱《贵妃醉酒》，张季龙唱青衣，徐铸成唱老生，余皆不知何戏。全衡与郑小姐唱民歌。轮及余说笑话，余以谜语代之。”3月2日晚会，宋云彬日记：“陈叔老谈民初掌故，涉及杨皙子（度），余作补充，并谓杨皙子晚年曾与中共有联系，闻者皆惊诧。与叶圣陶合唱昆曲《天淡云间》。方瑞女士歌《刺虎》，博得掌声。”3月4日晚会，叶圣陶日记：“船上人员均来参加，兼以志别，兴致极好，甚为难得。唱歌也多，不悉记。墨（叶夫人胡墨林——笔者注）亦唱《唱春调》四句，则破天荒也……今夕晚会，人各自忘，情已交融，良不可多得。”

3月5日，“华中轮”抵烟台上岸，受到热情的接待。宋云彬日记：“徐市长、贾参谋长以张裕公司之葡萄酒享客，余饮十馀觞。”叶圣陶日记：“饭罢，徐市长询要否洗浴，余与云彬等四人应之。由人导至浴室，洗大池，甚痛快。”“以汽车至宿所，乃一西人别墅，距市区较远。因恐国民党飞机来袭，故特指定此处。”“十时就睡，一梦甚酣。”3月7日，离开烟台。宋云彬日记：晚“九时至三李庄，距莱阳城三十里。党政军各机关现皆分散于周围三十里大农村中。此地亦为老解放区，军民融洽如一家人。十时许，招待者分别叫余等至农家借宿，余与刘尊棋同睡一土炕，被褥已铺，解衣欲睡矣，忽招待员又来，谓顷悉此间屋主系一肺病患者，故已为另觅借宿处，请即迁往云云。足见招待之周到也。”3月10日，离开潍坊特别市到青州市（益都，为当时华东局及华东军区所在地）。叶圣陶日记：下午从宿舍“驰车到车站。已预备卧车一节头等车一节在站，即先行上车。一行人连卫士在内不过六七十人，而用车两节，太宽舒矣。”“八时许到青州市（益都）。下车，党政军方面多人已在车站迎候，驱车人城，至招待所。

其处原为教堂,屋颇宽畅,坐憩之顷,有如归之感。”“即以招待客人而言,秩序以有计划而井然。侍应员之服务亲切而周到,亦非以往所能想象。若在腐败环境之中,招待客人即为作弊自肥之好机会,决不能使客人心感至此也。”3月18日上午,抵达北平东站,受到市长叶剑英和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等迎接,并下榻舒适的六国饭店。宋云彬日记:“六国饭店陈设仿西洋式,被褥软且厚,颇感到过分温暖。”叶圣陶日记:“驱车至六国饭店,特赁为我人之宿所。余与墨住一百三十五号房间。服用至舒适,为夙所未享。虽主人过分厚意,实觉居之不安。”在北平,北上文化人更受到空前热情的接待,迎来送往,络绎不绝;宴请吃喝,又如家常便饭。“来访”、“共饭”、“饭店聚餐”、“宴请”、“洗尘”、“招宴”、“宴罢续会”、“酒酣耳热”等几乎成了“知北游”三种日记的关键词。

“知北游”充满激情和诗情。从香港到北平,文化人豪情满怀,一路放歌。柳亚子还将这一年的诗稿题名《光明集》。3月1日“华中轮”乘风破浪台湾海峡,面对万里波涛,柳亚子按捺不住满心喜悦,一直受便秘困扰也在突然好转,其日记说:“下午,过厦门,望见灯塔。”“大便已通,惟不畅耳!作诗一截:‘六十三龄万里程,前途真喜向光明。乘风破浪平生意,席卷南溟下北溟。’”叶圣陶日记写到在宋云彬猜中其所出谜语并请其赋诗一首作为奖品后作诗的细节:“余归寝后作诗,迄于深夜得一律,将呈同舟诸公。‘南运经时又北游,最欣同气与同舟。翻身民众开新史,立国规模俟共谋。篑土为山宁肯后,涓泉归海复何求。不贤识小原其分,言志奚须故自羞。’”3月5日“华中轮”抵烟台后,柳亚子诗情更浓。当天即有“阔浪长风六日程,之罘登陆见光明”(柳亚子:《磨剑室诗词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12页)等句。3月8日傍晚,北上文化人参加三八妇女节晚会。柳亚子日记:“余被推讲话,大呼‘拥护毛主席,拥护中国共产党,打倒蒋介石,打倒美帝国主义!’兴奋至于极点。”3月10日,车抵青州,柳亚子又为前来迎接的有关领导各题诗一首,其中为许世友所题一首最为恰切生动:“立功杀贼拯同胞,百战归来意气豪。绝似燕人张翼德,一声喝断灞陵桥。”

文化人在旅途是非常愉快的,然而对于马上出现在眼前的崭新世界并不是就完全没有顾虑,梦中的光明和现实的光明能否一样,日记中也记载了他们的探索、疑问和担心。1981年叶圣陶在为自己即将公开发表的《北上日记》写了一个短前言:“大家看得清楚,中国即将出现一个崭新局面,这一回航海决非寻常的旅行,而是去参与一项极其伟大的工作。至于究竟是什么样的工作,应该怎样去做,自己能不能胜任,就我个人而言,当时是相当模糊的。同行的诸位决不会跟我一样,可惜后来没有机会细谈,现在大多数人已经作古。重温这一段往事,不免怅然。”这是一段真实的心灵回顾,当年他们知道要去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伟业,然而怎样做,能否适应新的环境,他们的心里是没有底的。叶圣陶很谦虚,其实不仅他“相当模糊”,其他北上的文化人也一样。这些都在“知北游”日记中直接或间接有所反映。

## 适应与不适应

对老区方式,苏联套套,日记反映出文化人一方面虚心去学习,老实去适应,努力去往好的方面想,尽量去感受并融进新的世界中;另一方面,文化人一进解放区就感到有些不适应,对其中的一些工作方式、中共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有保留看法。

叶圣陶是一位教育家,他能在北上日常活动中了解解放区的教育经验,并注意从中吸取营养。3月7日日记:在莱阳三李庄,“晤一青年姜汝,二十五岁,小学毕业程度,从事青年工作将十年,聆其所谈,颇头头是道。余思共党从生活中教育人,实深得教育之精意。他日当将此意吸收之。”3月8日日记,赞扬一次田野间的歌舞晚会:“余亦以为如此之戏,与实生活打成一片,有教育价值而不乏娱乐价值,实为别开途径之佳绩。”3月11日日记,记载他在一次欢迎会的讲话:“来解放区后,始见具有伟大力量之人民,始见尽职奉公之军人与官吏。其所以致此,则由此次解放战争实为最大规模之教育功课,所有之人皆从其中改变气质,翻过身来,获得新的人生观。”

叶圣陶日记对解放区这个完全陌生的新鲜世界既记载他的正面感受,又写下他的不适应和些许忧虑。叶圣陶日记中对共产党的开会多和开长会的情形有生动的记录。3月8日,叶圣陶为出席华东妇女大会之代表作报告。“察听众神色有兴者不少,皆疾书作笔记。但木然枯坐者亦多。解放区开会多,闻一般人颇苦之,不知当前诸妇女中有以为苦者否。”到北平后,3月20

日下午五时，叶圣陶从沈从文家出来，“至北京饭店，罗迈、周扬二位招待同人，谈响应世界和平大会之事，结果主多发宣言。至九时始毕，实则其事至简单，不需费如许唇舌也。”“复开文协理监事会，准备与华北文协开联席会，筹备全国文艺界协会。又是二小时，余疲甚。”3月21日，“夜七时，二百余人于一堂，听罗迈谈话。……十时散，兀坐将近三小时，又大疲。”3月24日，“出席文代筹备会，推定常务七人，余在内，加推筹备员六人，共三十七人。即此简单事，亦费二小时有余。”

宋云彬日记也有记载对开会方式的看法：4月10日，“下午出席教育座谈会，听冗长之报告，殊不可耐。凡开会必有报告，报告必冗长，此亦一时风气也。名为座谈会，实则二三人作报告，已将全会时间占尽，我等皆坐而未谈也。一笑。”

文化人自然更关心共产党的文化政策和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先前，他们大多数没有去过解放区，对共产党的政策只是停留在理论上的理解。“华中轮”3月3日上午的一次讨论，“在文化及一般社会方面如何推进社会主义之实现”就很能说明问题。座谈会除郑振铎女儿郑小箴、曹禺夫人方瑞、包达三女儿包启亚以及两个小孩外22位知名人士都出席。宋云彬日记：“余任记录。题既冗长，范围又广，发言者大抵不切实际。”叶圣陶日记：“在座诸人各发言，所有所见，惟皆不甚具体，亦无法作共通结论。”自从3月5日烟台登陆后，接触的是活生生事实了。“知北游”一行中有不少是新闻界和出版界的行家，如王芸生、徐铸成、宋云彬、赵超构等，他们很关心解放区的新闻政策。宋云彬3月14日日记，记载他们在济南与接待他们的曾也是报人的恽逸群探讨有关私人办报的问题：“午餐后有座谈会，余提出询问；在此情况下能容许私人办报否？恽逸群作答，谓目前私人办报，事实上甚为困难云云。”据说，王芸生离开香港前得知天津《大公报》改名《进步日报》时，深感丧家之痛，亟望争取恢复《大公报》的原名。到北平后，鉴于大势所趋，对既定方针无计可施，经过一番思想斗争，无可奈何地接受下来。（周雨：《王芸生》，人民日报出版社，第69页）

3月14日叶圣陶日记，记载他和郑振铎听了30年代参加左联的历史学家、当时正在新型的革命大学华北大学工作的赵俪生教授谈中共对教员政策后的感想和态度：“初晤赵俪生，渠在华北大学作研究工作，近将回开封中原大学。承告北平解放后，对知识分子之教育颇困难。余与铎兄闻教员俱拟令受政治训练，以为殊可不必。此前数日，叔老曾谈及，凡国民党之所为，令人头痛者，皆宜反其道而行之，否则即引人反感。而令人受训，正是国民党令人头痛者也。”3月15日，也是教育家的宋云彬日记，有他对此事的回应，同时也说明叶圣陶还和其他同行讨论有关问题：“在济南车站购得白酒一瓶，未及饮，至是乃邀圣陶等同酌，酒酣耳热，相与剧谈。圣陶颇虑平津当局处理大学教师有偏向，余亦以此为虑。”此时的叶圣陶和宋云彬当然不可能知道“令人受训”正是中共对文化人改造的一种手段。

叶圣陶是一个敢说真话和有独立思想的人。3月的一天，周恩来邀请民主人士座谈学习问题。叶圣陶在发言中说：“我已年老了，脑筋迟钝了，希望勿勉强我改信唯物主义！”他的真话，使举座为之震惊。（张还香：《叶圣陶和他的世界》，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306页）然而在以后的工作和生活实际

**1949年2月，前往解放区的各界人士在轮船上合影。左起，前排：方瑞、郑小箴、包启亚；二排：包达三、柳亚子、陈叔通、马寅初；三排：傅彬然、沈体兰、宋云彬、张纲伯、郑振铎、叶圣陶、王芸生**

中，他学习马列主义是很认真的，只不过他不是那种“面从，退而后言”的人，也不是“遇事三分左”的人。他没有想通的，决不先附和和表达。他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就写什么。北大教授、著名文学家沈从文是叶圣陶的老朋友，因被郭沫若界定为“桃红色文艺”的作家，受到巨大的压力，恐慌、惶惑，觉得没有希望，甚至用保险片割脖子上的血管，想以自杀解脱。沈从文曾记下这样的文字：“我应当休息了，神经已发展到一个我能适应的最高点，我不毁也会疯去。”（《从文家书》，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第147页）过去的许多同事朋友也离他远远的。叶圣陶到北京后，拜访了那些居留北京长期不相见的朋友。如俞平伯、许宝钏夫妇以及赵万里、潘家洵、朱光潜，还有沈从文。3月20日日记：“偕铎兄访赵万里，由赵陪同访介泉于红楼，未晤。遂访孟实、从文。从文近来精神失常，意颇怜之。”

## 浪漫情怀与现实政治

“知北游”还流露了浪漫文人与现实政治的矛盾。由于叶圣陶日记到3月15日止，后面日记未见公开；宋云彬日记写到8月31日，但时断时续。柳亚子日记则到10月29日，不漏一天，且其详略均与其活动和心态有关，颇值得玩味。三人中，柳亚子的气质最为浪漫，脾气也最为火爆，自视很高，参政意识强烈，因而与现实政治的矛盾和冲突最为强烈，导致陷入深深的困惑、忿懑和无奈。

面对胜利大局已定而出现的新情况，比起叶圣陶和宋云彬，柳亚子的思想准备更不充分。他是怀着大显身手的浪漫诗情北上投身建国大业的。“除却毛公便柳公，纷纭馀子虎龙从……一代文豪今属我，千秋历史便称翁”（《磨剑室诗词集》第1628页）的诗句便显露他想在政坛和文坛上均要有所作为的情怀。然而现实政治与浪漫诗情的差异不啻霄壤之隔。政坛上，2月28日，即柳亚子抵北平前约半月，民革由李济深主持在北平召开首次中央会议，推选民革的新政协代表，柳亚子被排除在外，仅在要求增加的三个名额之列（后因名额增加，柳亚子才成为民革的政协代表），自然更谈不上代表民革参加新政协筹备会。（张明光：《柳亚子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564页）作为民革的创始人之一、民革中央监委主席，在毛泽东电邀北上协商召开新政协的此时，又被排除在新政协之外，这对柳亚子这样一个用世心和自尊心都很强的革命活动家，其震惊和失望可以想见。文坛上，在全国文代会筹委会中，柳亚子未列名常委。他建立国史馆要求和筹备北平文献研讨会也受到诸多阻难，或死于腹中或夭折。

新政协会议后，柳亚子仅担任中央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在中央文史研究馆中，馆长是曾做过毛泽东的老师的符定一，柳亚子仅多个副馆长之一。可见除几个虚衔之外，柳亚子基本被排挤在政坛和文坛的高层之外，而与同时代的一批民主人士比，这些安排显然与柳亚子的革命贡献、社会地位和知名度是不甚合理的。“知北游”日记隐隐约约地透露出柳亚子的百思不解，嫉恶如仇，无助的笔下和嘴头的抗争，无可奈何的忿懑和孤独。

柳亚子思想上没有宽容曾经追随蒋介石而革命胜利之际才转向的人，认定他们是见风使舵的政客，因此时有“薰莸不同器”之感叹。4月4日，柳亚子日记：“中饭后，波钧为介见张文伯、章行严，章实爱国学社同学，惜薰莸异路耳。黄季宽假痴假呆，可恶之至！”柳尤其对李济深有看法。4月24日日记：“余两则径赴昂若、揆若昆季招饮，客有李任潮、朱蕴山、王泽民、俞平伯等三十余人，平山、荪荃伉俪亦偕来。食菜用鸡尾酒形式，彼辈为任潮进一特别面，任言太多，谁要谁分取，余言分我一杯羹可耳！后来纪事诗中，有‘分我杯羹慚李密’句，正此意也。”如果联系后来柳亚子与夏衍的一次见面情形，则是日日记似话中有话。夏衍回忆：“一天晚上，我正要上床，柳亚子敲门进来了，我和这位爱国忧民的南社诗人也算是老朋友了，过去，不论在香港，在重庆，即使在时局十分险恶的时候，他一直是爽朗、乐观的，可是在这举国欢腾的日子，他却显得有点心情抑郁，寒喧几句后，他就问我上海解放后没有去过苏州，他说，假如那一带安定，他打算回吴江去当隐士了。这句话使我大吃一惊，‘一唱雄鸡天下白’，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呢？他就坦率地说出了他对某些人事安排的不满，他用责问的口气说，李任潮怎么能当副主席，难道你们忘记了他二十年代的历史？对这样的事当然不好插嘴，我想把话岔开……可他还是滔滔不绝地讲了他对某人某事的不满。”（夏衍：《懒寻旧梦录》，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631页）

在此期间，因为“看不顺眼的事情太多”，（《（柳

亚子文集）书信辑录》，第350页）柳亚子脾气越来越躁，常有“不近人情”之举，夫人和朋友们都很担心。宋云彬日记4月6日载：下午，“赴北京饭店参加文艺座谈会。柳亚老发言，述及彼与民革、民盟关系，余急书一字条劝止之……”可能是柳亚子“好汉大谈当年勇”，宋云彬怕他得罪人而进行劝止。4月7日载：“下午二时民盟小组在亚老房间开会。此小组约五六人，组长为杜任之，余与黄任老、柳亚子均在内，馀则已忘其姓名。亚老近来兴奋过度，常有种种不近人情之举，其夫人深为担忧，特与医生商，请以血压骤高为辞，劝之休息。三时许，医师果来为亚老验血压，验毕，连称奇怪，谓血压骤高，宜摒弃一切，专事休息。亚老信之，即作函向民革、民盟请假，并决定两个月以内不出席任何会议，柳夫人之计善哉。”同一天，柳亚子日记也写到：医生“为余量血压，较前增加到十度以外，颇有戒心，以后当决心请假一月，不出席任何会议，庶不至由发言而生气，由生气而骂人，由骂人而伤身耳！”

4月25日，柳亚子“奉毛主席之命”，自六国饭店移居颐和园益寿堂休养。然而，柳亚子对在自己终身为之奋斗的新中国建国大业中，被完全闲置起来岂能善罢甘休！早在3月28日，柳亚子撰《感事呈毛主席》，表示待吴江解放，就准备引退分湖，做严子陵了。这是诗人以退为进的策略，向毛泽东点出自己的出处问题。柳亚子移居颐和园第五天，4月29日就收到毛泽东赠诗即《七律·和柳亚子先生》。毛泽东以政治诗人的浪漫手法和无比深厚的感染力，回溯革命交往，抒发朋友情怀，用友好而委婉的方式回答柳亚子提出的出处问题：请节制牢骚，就留在北平，放眼未来吧。

5月1日下午，毛泽东到颐和园访柳亚子，并同游昆明湖。5月5日，柳亚子赴毛泽东家宴。柳着实又兴奋了一阵子，甚至说过：此乃“自揆出生六十三龄，平生未有此乐也！”（《磨剑室诗词集》第1590页）大约同月中旬，柳亚子致信毛泽东，建议设立国史馆，并希望在江苏省人民政府任职等，自谓“颇于毛共有所献替也。”可惜，21日，毛泽东就来信泼冷水：“国史馆事尚未与诸友商量，惟在联合政府成立以前恐难提前设立。弟个人亦不甚赞成先生从事此项工作，盖恐费力不讨好。江苏虚衔，亦似以不挂为宜，挂了于己于人不见得有好处。此两事我都在泼冷水，好在夏天，不觉得太冷否？”毛泽东的信直截了当，再没有半月多前和诗那样极尽委婉曲折之能事的闲工夫了。同一天，柳亚子收到此信，心里自然不是滋味，当天日记：“毛主席来信，颇有啼笑皆非之慨。夜，作长笺复之，将于后日送去云。”柳的复函究竟写些什么，笔者希望有朝一日能读到，不过从日记看出柳还不死心。他积极着手筹备北平市文献研讨会。6月16日日记：“赴听鹂馆开文研会筹备会，通过举余为主席，俨然黄袍加身，拟推老毛为名誉主席，未知其肯入我彀中否也。”毛到底有没有进入柳的“彀中”？看来是没有。因为该会6月26日在中山公园举行成立会后便停止了活动。

一方面柳非常钦佩毛那种领袖群伦的博大胸怀，也非常想接近毛。上述5月1日，毛、柳同游昆明湖当晚日记：“润之已疲倦，不及长谈，登岸即坐汽车返。约定双五节以车来迓，谒总理衣冠墓于碧云寺，希望其不开空头支票也。”说明柳盼望能再次见到毛。另一方面，柳对毛也有新的看法。6月6日，他有诗云：“旭日中天防食昃，忠言逆耳费思量。”他认为毛在革命胜利之际表现了“忠言逆耳”的态度因而感到难以理解。对于毛“牢骚太盛防肠断”的批评，柳也提出异议，同一天作于韶九胡同的诗中便说：“英雄惯作欺人语，未必牢骚便断肠。”（《磨剑室诗集》第1633页）

以后柳亚子日记和来往信函，反映其情绪更为低落，原本火热的心也越来越凉了。就是建国周年活动中出席毛泽东主持的国宴、登天安门检阅盛大国庆典礼、与毛泽东唱和诗词，日记中也都是客观性的记实文字，不复从前之激情和颂扬性的语言。7月12日致毛啸岑函：“他们正希望我专心休养，什么事情都不要我管。”7月19日致姜长林函：“精神没有以前的兴奋，也没有以前奋勇直前的气概（什么都懒得顾问了）”。（转引自张明光：《柳亚子传》第578页）7月某日，赠友人诗云：“屈子怀沙逢乱国，贾生赋鹏值休明。忏除结习吾知免，不作苏俄叶赛宁。”（《磨剑室诗集》第1651页）柳亚子竟然以屈原、贾谊的遭遇自况，甚至联想到苏联诗人叶赛宁的悲剧性结局（叶乃苏联青年诗人，十月革命后曾写过不少赞扬革命的诗篇，1925年因悲观失望自杀），令人惊诧！日记也呈越来越短的趋势，因为事实被闲置起来的人也没有多少事可记了。例如，7月14日：“写字，写信，弄邮票。”柳亚子《北行日记》写到1950年国庆后到华东参观，最后半月日记加起来仅有100多字。显然，一代革命活动家、浪漫诗人，心已死矣。

（责任编辑　吴　思）

# 文怀沙与《红楼梦》研究

● 胡晓明

最近,我有幸先后搜集到解放初期出版的俞平伯著《红楼梦研究》、周汝昌著《红楼梦新证》和俞平伯辑《脂砚斋红楼梦辑评》。在将近半个世纪之后，再来阅读这几部红学著作,不禁感慨系之。作为《红楼梦》研究史上最重要的著作，它们不仅影响了其后的红学发展,而且对广大读者也有重要的帮助。由于这套丛书是王耳先生(即文怀沙先生)主编的,且文先生先后为这三部著作,写有跋、代序和出版者说明,这就不能不重视文怀沙对《红楼梦》研究的重要贡献。

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是其《红楼梦辨》的修订本。俞平伯根据后发现的新材料,对原书进行了删、改、增的修正。正如他在自序中所说:“我就把旧书三卷,有的全删,有的略改,并为上中两卷。其下卷有一篇是1948年发表的,其余都是零碎的近作。”

《红楼梦新证》是周汝昌所作“关于小说《红楼梦》和它的作者曹雪芹的材料考证书。”作者主张“以科学的方法运用历史材料证明写实自传之不误。”周汝昌积数年之功,辛勤寻找、披沙拣金、搜根兜底、抉爬勾稽,对《红楼梦》的本事和曹雪芹的家事,作了“合而为一”的全面考证,终于完成了这部考证派的集大成之作。

戚蓼生序本《红楼梦》有许多脂批,却不见脂砚斋的署名。直到1927年胡适重价购得“甲戌抄阅”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后,脂砚斋及其评语才为世人所知。其后又有徐星署所藏的“脂砚斋凡四阅评过”的抄本(即庚辰本),董康所藏《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即己卯本),先后面世。1953年在山西又发现了“梦觉主人乾隆甲辰秋月”作序的本子。由于这些脂本都未曾影印,俞平伯将甲戌本、己卯本、庚辰本、甲辰本和戚序本中的脂评,辑录成第一个汇集本,给学界提供了研究版本和成书过程的宝贵资料。

这三种红学研究中里程碑式的著作,都是文怀沙主编出版的。正如俞平伯在自序中所指出:“我得到友人文怀沙先生热情的鼓励”。周汝昌在“写在卷首”中也指出:“没有王耳先生的无私的重视与爱护,这本书是不容易和读者见面的。”这些表明了俞平伯、周汝昌对文怀沙致力于学术发展,出版了这两部著作的感激之情。事实确实如此,文怀沙在《红楼梦研究》的跋中,高度评价了《红楼梦研究》的成就:“不仅是《红楼梦》的改版,而是把辨伪存真的工作更推进了一步;非但高程续补迥异原作,已成铁案;而曹雪芹未写完的书,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亦可以窥见大体。”这些对于读者阅读《红楼梦》都是十分重要的指导。文怀沙在《关于红楼梦的几点理解》为题的代序中,首先提出:“我们知道,文学作品既是社会现实的反映,因此《红楼梦》所描写的贾府,就不可能是离开时代社会而游离存在。”他进而指出:“周汝昌先生是辛勤地替这个有意义的工作奠定了基础。”周著《红楼梦新证》从较广泛的时空范围搜罗材料,为人们勾勒了曹雪芹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生活场景。

文怀沙对红学的贡献不仅于此,他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红楼梦是曹雪芹依据自己的生活感受,通过高度的艺术手腕,所唱出的封

建贵族阶级走向灭亡的挽歌”,是文氏的主题论。曹雪芹 “他的不可及处，乃在于忠实现实——现实主义的胜利”，是文氏的艺术论。“曹雪芹明明说出，他的志趣不是顶门扇,而是补苍天！这是何等的见识与抱负！”是文氏的作者论。“严格地讲,百十回的红楼梦,前八十回的盛,只是为反跌后三十回的衰,所以后三十回实在比前八十回为重要”,是文氏的版本论。“《红楼梦》所写,即是恢复小康后的局面,与曹寅盛时相去甚远”,是文氏的家世论。“自从发现了脂砚斋评本石头记以来,曹雪芹的创作心理过程,逐渐弄明白了”,是文氏的脂评观。这不仅在当时,就是时隔四十多年后的今天,也是十分宝贵的意见。同时更为重要的是,文怀沙提出了用唯物主义史观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红楼梦》。他明确指出:“要想研究或了解这部文学经典名著,和它的作者——曹雪芹,就必须从那个特定时代和那个特定社会关系的联系中去着眼了。”《红楼梦研究》出版以后，即赢得了一些学者的好评,也引起一些学者,特别是一些青年学者的批评,这本来是正常的现象。也许文怀沙当时未曾想到,由于毛泽东因李希凡、蓝翎所写批评文章发表中遇到的困难，对党内提出批评，并由此引发了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然而,在这场批判的高潮中,他还是按原计划出版了俞平伯的《脂砚斋红楼梦辑评》,并且认为出版这 “古典文学研究中的一种资料”,“仍然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让它有机会广泛地公诸于众,也是有必要的”。这体现了何等的理论勇气和学术胆识,也体现了文怀沙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坚定掌握和在古典文学研究中的娴熟运用。

日升月落,星移斗转,弹指一挥四十多年过去了。今天,当我们旧著重读的时候,早已布满历史封尘的往事,又逐渐清晰起来。文怀沙主编出版新红学重要代表作《红楼梦研究》,褒奖了知名学者的不断创新;出版集考证派之大成的《红楼梦新证》,既是对青年学者的提携,又是对红学研究的推动;而出版《脂砚斋红楼梦辑评》,既解决了学者研究中的资料问题,又将珍秘古藉普及到普通读者中去。正是这三本书的先后出版,红楼梦研究形成了新的高潮。文怀沙在红学上的学术魄力,实在令后人景仰崇敬。他对红楼梦研究的历史性贡献,应该得到充分地尊重和肯定。

（责任编辑　舒元璋）

# 孙中山为金少穆题挽联

● 钟　达

我的表叔金少穆系重庆市忠县人,青年时在日本留学,与孙中山是同学,相处甚好。后来孙中山组织同盟会,金支持并加入了同盟会。民国三年(1914年),孙在日本给金来电,要金去日本会面,以讨论救国救民的大事。金约好在日本留学回国探亲的马仁安一起赴日,不仅带足了路费,还带了不少现洋。他们动身走到夔门府时,金突然患急症,因医治无效,不幸逝世。孙中山得知噩耗后,十分悲痛,遂为金题写了一副挽联:

天不许再到东京生还忠郡
君岂忍远离西蜀死在夔门

# 漫说等级制、宗法制和家长制

● 李一氓

何谓等级?《辞海》(1999版)的解释是:“按社会政治地位的高低划分并被法律确认的不同社会集团，普遍存在于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等级和阶级既有区别又有联系,阶级按经济地位划分,等级按政治地位划分。”

等级既然是奴隶社会或封建社会专制制度下用以区别人们政治地位的一种排序,那就等于说,等级制无非是支撑少数政治上层人物施行专制的一种层次分明的社会架构。好像一座建筑物的层层砖石,没有底下重重叠叠的铺垫,专制政治就会轰然倒塌。

如此说来，等级现象无非就是人们的政治权利和社会人格的不平等现象。但它只存在于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吗?现实生活中是否已经消除了这种古老而陈腐的现象呢?遗憾,答案恐怕应该是:否!

先让我们看看，人分三六九等这一现象最初是怎么发生的。

研究古代社会的经典著作如摩尔根的《古代社会》(马克思和恩格斯给予这本书很高评价),恩格斯的《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都曾说明,在母系社会以前,本来是没有等级的。那时生产力低下,人们必须相互依存,公有共济,没有可能使任何人特殊。以血缘关系聚居的公社内,人们自由、平等、博爱,完全出于自然。阶级和等级的出现,是生产力提高到一定程度之后,在父系家长制家庭公社出现一个时期后才出现的。从生产生活方式说，这标志着人类由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的门槛”。(恩格斯语)

到了现代,除极个别未开化的民族外,全人类已基本上告别了野蛮时代。尽管在迈入“文明时代的门槛”以后,迄今一直有阶级和等级现象存在,但表现为什么样的阶级、等级关系,却又因社会发达程度的不同而不同,其性质不仅有先进落后之分,也仍有文明野蛮之分。

这里有两个情况:一是,即使在现代最发达社会,经济的不平等不仅依然存在，甚至由于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而出现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现象，但其中所体现的分配原则究竟是越来越不公平,还是越来越相对公平,这个问题暂可留待思考、争论。不过从生产方式或生活方式看,说知识经济社会是一种更文明先进的社会,恐怕争议不多。二是,完善的市场经济必须是公正公开公平的法制经济、文明经济,尽管今天政治不平等现象仍在不同国家有不同表现,但由于市场竞争必须是平等竞争,它只服从法律而排斥政治特权。故市场经济发育的程度,与人们的政治平等程度绝对相关,其间差别仍属文野之分。

前不久英国《金融时报》有报道说：十年前，欧洲大部分大学毕业生都寻求担任公职；今天大多数毕业生却更想投身私营部门。这个变化说明，即使在欧洲，十年前向官吏阶层“跳龙门”也还是热门。只是在知识经济时代的轮廓越来越清晰的今天，人们的观念才大大改变了，所寻求的已不是官阶和“铁饭碗”，而是发展个人才能的多样取向，实现自身价值的各种机会。

这情形也正在中国出现。中国多少年的传统观念是“学而优则仕”，因为“士为四民之首”，一经金榜题名，便为人上之人。解放后，一度流行的职业观也是以争取脱产当干部为首选。干部——官，在现实生活中和人们心目中仍然高人一等。观念作为客观世界的主观映象，不是宣说一下“在社会主义社会只有分工不同而无高低贵贱之分”，就可使等级差别在人们观念中的深刻反映轻轻抹去。然而，在我国日益融入现代市场经济社会，特别是知识经济社会骤然到来的新情况下，传统的人生观价值观迅即受到了有力冲击。过去，谋取高人一等职位的有为青年多以从政为第一追求，眼下却正把高学位高知识高技能高收入作为第一追求。宁舍“宦海”，而愿下“商海”，更愿孜孜不倦遨游“学海”，求得学有专长甚至一专多能，走学而优则开发市场开发新生产力富国裕民又能裕己之路，正成为大热门。三“海”地位，忽焉颠倒！

可见，比起自然经济时代，甚至比起市场经济初期亦即工业革命开始之际，现代市场经济所带来的，不仅是生产力的急剧变化，还有阶级关系等级关系及相应社会观念的急剧变化。这个变化意义之深远，甚至非今天所能充分估计。

在中国，等级制源于历史悠久的宗法社会，这使中国等级制独具特色。

中国宗法社会历史悠久，可能是又一个“世界之最”，从只有口头传说史的氏族社会晚期开始，截止近现代，历时应以几千年计。至少在周朝，宗法等级制就已臻完善，其后出于历代统治者的需要而日益强化，成为中国最重要的传统之一。宗法一词，按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中解释，“宗”是“尊祖庙也”。《礼记》说，“尊莫尊于祖庙”。“宗”字上头的“宀”(音 mian)，是房屋，可引申为庙；底下的“示”，当神灵讲。中国古代是把祖宗牌位供在庙中，当作神灵祭祀膜拜的。祖宗和祖宗所立的规矩至尊无上，可算为老字号“凡是”！

为什么大搞祖宗崇拜？个中缘由，说来话长。宗法制度本是古人在宗族中区别嫡庶长幼尊卑亲疏的制度，按等级依次分为大宗、小宗、内宗、外宗；大宗反映嫡长子及其子孙；小宗指次子、庶子及其子孙；内宗指同姓的女儿系列；外宗指姑、舅、姊、妹的女儿以及叔伯兄弟的女儿系列；大宗小宗为男性宗支，内宗外宗为女性宗支。由这样等级分明的排序，形成一个从宗族到社会的复杂系统，规定着每个人在系统中的世袭地位。祖庙牌位（或家谱）的排序，像一棵倒置的树，根在上而枝在下，越老的祖宗位次越高，而重嫡轻庶、重长轻次、重男轻女，是排序的不变原则。同一祖先的人就是同宗，有很强的内聚性和排他性，如此形成许多或大或小的利益集团或命运共同体。中国许多江湖帮和职业行会也大多具有宗法性质。他们尊奉共同的帮主或行头，敬之如父母，各有帮规行规，实行按资排辈等级服从和个人服从团体制。对第一代帮主行头，也一如敬事祖宗般祭祀膜拜。这类帮会，是宗法家庭的变种。

可见崇古是为隆今，认祖归宗是为利己；强调死人的地位，是为了据以规定后代活人的地位，为了权益的继承、垄断、再分配。

因此历代帝王无不大建祖庙，“左庙右社”，建在紫禁城前。现在北京故宫左前方的劳动人民文化宫，旧日叫太庙，即清朝皇帝的祖庙；右前方的中山公园即旧日社稷坛。历代皇朝都把祖宗神主与社稷（社：土地，稷：谷物，引申为承载万物的天下、江山）并列祭祀，意味着国家、子孙要时刻不忘家国一体，有责任使家天下世代传承垄断。一千年前那个有文才而不会治国的南唐后主李煜，亡国为虏之日拜别祖庙时写道：“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破阵子》）他最感到愧对的仅仅是祖宗。

宗法结构又可由血缘及于裙带，及于亲信，衍生出许许多多门阀宗派。中国历史上这种以私权授受关系结成的利益集团，除皇亲国戚外，还有勋贵权臣们盘根错节的宗支系列，各自结成巨大政治势力，割据并世袭权力。如东晋时王、谢两大勋臣家族世袭高官，使当时南京的朱雀桥边，乌衣巷里，尽是这两大家族的豪门巨第；唐朝武则天、韦后、杨贵妃的武、韦、杨家族，也都“姊妹兄弟皆列土”，（白居易诗）“炙手可热势绝伦”。（杜甫诗）但这还只不过是历史上门阀势力

的一些代表。这种“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现象,几乎成了中国宗法社会一个流祸千载的遗传性肿瘤，完全是以权力制造出来的政治不平等。

中国宗法等级制的历史特别长，与儒家思想的影响特别深远有绝对关系。儒家讲孝道,提倡帝王“以孝治天下”，在人民头脑中树立“父母之命不可违”、“顺者为孝”和家国一体的牢固观念。绝对的“孝”，扩大为绝对的“忠”；“父母之命不可违”延伸为“君命不可违”;即便一个九品芝麻官,也是“民之父母”，人民也应奉之以孝——服从。这么一种把国家家庭化的宗法经济术，使整个中国社会从家庭、宗族，到乡里、府县、国家,所有尊卑地位都按表面上温情脉脉的家庭般“亲亲”关系被严格规定下来。儒家讲“亲亲为仁”,(《论语》)把它罩上“仁”字道德外衣,从而使家长与子孙、帝王与子民、官与百姓之间的关系,是绝对主宰和绝对服从的冷峻关系。这恰恰是宗法规则之要旨。儒家讲“复礼”,就是要求一切按祖宗的既定方针办。违背祖宗之礼——规矩,就是“非礼”。孔子强调“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动。”(《论语》)违礼被视为“大逆不道”。这就不难看出,儒学不过是长期被奉为经典的宗法政治伦理学；超长期尊孔崇儒的结果,就是宗法制度宗法观念的超长期延续。

在世袭制下,嫡长子,尤其是家长指定的继承人,都是法定的正统。一经被认定为正统,便具无上权威,须普遍承认接受。这就是为什么皇位继承总要在先帝遗嘱上做文章。这一正统观，强化着一系列大小家长们不受挑战不可动摇的统治权。一座座由君权、官权、父权、夫权、族权,外加乡里耆宿们特权的大大小小家长们形成的权力金字塔，就这样矗立起来，无权的老百姓则在最下层垫底。而权力必须由下而上梯次集中,最后集中到最高家长——皇帝手中,形成了中国传统的世袭等级家长制社会。

家长制当然是人治，只不过是伦理道德化、法律化、制度化因而天经地义化了的人治。所以中国传统社会只有人治，从来没有过也不可能有什么法治。颠扑不破的逻辑是：人治之下无法治，或者说在人治之下,只有服从和维护人治的法“制”,是有法“制”而无法“治”的君主独裁法制社会。

我们不是有过法家理论吗?是的。不过,中国古代法家之法恰恰是最强调权力集中的帝王之法。法家提出“辩慧,乱之赞也”,认为人民有智而善辩就会助长动乱,这与儒家的“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理论异曲同工。所以法家主张实行“壹于农”,让国民一律务农,永远固定在分散的土地上,处于信息闭塞、视野狭窄、智识缺乏的条件下，才能达到“弱民”、“使民”。(《商君书》)

既然宗法制度所维护的是一种靠正统地位继承下来的特权，用以保证正统继承者的既得利益不致旁落，所以一切正统势力总是旧传统的坚决维护者,而成为社会革新的最大阻力。

既然在宗法社会一个人是出于正统还是支派,是嫡系还是旁出，决定着现实地位，因此，不仅正统出身,甚至具有正统思想者(哪怕打扮成维护正统思想的模样),都属正统一派人物,特别吃香。而敢于挑战祖宗传统的改革创新者，其言行必定动辄得咎；正统派的言行再荒谬再不得人心，以其是出于维护祖制祖法,属于立场正确认识有偏,往往不予追究。

既然一切是非均依权力金字塔上的位序而定,越往上真理越多，最高的家长有最终的是非裁判权和真理垄断权,人们便只能“唯上”,这个民族便永远不会是一个能够创新的民族。创新如果不是出自于上,或未经上头恩准,便鲜有可能表达,更无从实现,人们便唯有永远匍匐在一言堂下翘首祈望“吾皇圣明”,这个国家便永远不会是一个生气蓬勃的国家。

所以，创新与宗法家长制，与正统势力的霸权地位,与“唯上”,与“一言堂”,绝难两立。提倡创新,就不能同时又要求绝对的等级服从。

资产阶级革命比之以前的任何革命的一个重要不同之点,就在于它提出了“人皆生而平等”。这口号最初由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启蒙者洛克提出，由杰弗逊首次把它写入美国《独立宣言》，紧跟着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也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从此,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普遍把实现人的权利平等，作为具有法律性的立国原则之一。马克思恩格斯曾在《共产党宣言》中十分明确地指出:“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一切等级的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

这里，马克思恩格斯对资产阶级革命在消除封建宗法关系特别是等级现象方面所起的历史进步作用,

给予了充分的肯定。马、恩认为资产阶级革命最主要的历史贡献就在于把“天然尊长的”、“一切等级的”东西破除掉了,而对于破除的彻底性,不惜用“无情斩断”、“烟消云散”这样的词语来表述。

马克思还说:“当然,平等趋势是我们这个世纪所特有的。”所谓“我们这个世纪”,指的就是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全面发展的19世纪;所谓“特有的”,指的就是只有到19世纪才会发生而此前不可能发生的事物。这就是说,平等,只有在19世纪资产阶级革命全面发展的条件下,才能成为历史趋势;也就等于说,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任务或历史成果之一,就是消灭等级现象。

这就明确了一个问题:等级和阶级,即政治不平等和经济不平等,哪一个应先退出历史?这当然不是由人的意志来决定,而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状况来决定的。固然,今天的世界现实是,即使在一些发达国家,也还存在一定的种族、性别、财产的歧视,存在着世袭的王位和爵位(尽管王室贵族的政治权力已是象征性的)。这当然仍属于政治的不平等现象。但不容置疑的是,这种政治不平等与宗法制下的政治不平等绝不仅仅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分,而是有着质的区别。因此尽管经济的不平等甚至由于收入差距的扩大而扩大了,但有目共睹的事实是,资产阶级革命虽然没有取消阶级而只是换了新的统治阶级,但却由于在相当程度上破除了政治不平等,就空前地解放生产力,取得了惊人的社会效果。并且,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发达国家现存的诸如种族、性别歧视,乃至王室贵族的特殊待遇等现象,也必将和正在进一步消除。这样,事实已明确回答了上述问题:等级可以而且应该先于阶级退出历史。不首先破除宗法等级制(以及它的变种),就不可能出现健康的新阶级,不可能进入健全发达的市场经济社会。

中国没有经过资产阶级革命的洗礼。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按其性质本来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范畴,但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打倒了代表“三座大山”的政权以后,没有通过制度建设和思想文化建设,彻底清除几千年宗法制度特别是宗法观念的深重影响。当初,五四运动先驱们所呼吁的民主与科学(“德、赛二先生”)的制度建设和思想文化建设任务,与同时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战斗任务,是互为目的互为手段而不可互相取代的。仅仅更换政权,而不实现民主与科学的制度建设和思想文化建设,就不能彻底地反帝反封建,尤其是不能在积淀深厚的传统观念上彻底完成反封建任务和消除宗法文化的影响。反过来说,不反帝反封建,也不可能实现民主化科学化即社会的全面现代化。两者相伴相生,不可或缺,同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内容。这一点,在我们经历了20世纪下半叶的人类历史,作了横向纵向比较,检点利弊得失,并面对新世纪新形势的挑战的时候,就尤其有十分痛切的感受了。

我们曾试图通过分配的平均主义,早一点消灭阶级差别,甚至试图通过大面积地批斗和打倒“当官做老爷”的党政领导干部,批斗和打倒“反动学术权威”,甚至把多数知识分子(包括初中生)驱赶到农村从事最简单的体力劳动,把文化不高但出身好的普通劳动者提拔到领导岗位,来消除官民之间、智力体力劳动者之间的不平等现象。但其结果,却是社会的空前混乱和失控,是封建宗法家长制空前恶性膨胀,是“龙生龙,凤生凤,耗子生来会打洞”和“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类新式血统门阀等级观念的一度泛滥。

“文革”既然被确定为一场“政治大革命”,它首先搞乱了政治,并窒息了经济,那么拨乱反正也应该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并行。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对政治改革的重要性迫切性讲得很明确,强调得很到位。二十多年来,我们确实也作过若干政治改革的设计,进行了一定努力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无可否认的是,政治改革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官场腐败以及相当程度的干群关系紧张,等等,仍是久治不愈的顽症。我们认识到稳定是发展的前提,但腐败却是破坏稳定的主要因素之一。哪里有腐败,哪里的投资环境就不会健全,管理就不会清明,不难设想,如此下去,究竟会不会有助于稳定。

这些情况,都是古老传统养成的家长制遗风,很不利于发展现代市场经济,特别是不利于与世界接轨,不利于吸引投资,扩大开放。只有彻底涤荡宗法文化的影响,法律面前实行人人平等,市场经济的大厦才能健全稳固地矗立起来。

(责任编辑　程　度)

# 从清朝档案中看和珅

● 卢 经

和珅为清代大贪官，和珅被诛为清代大案。清代以“贪鄙成性、怙势营私、僭妄专擅”而被诛杀的职位最高的官员便是和珅。

近些年来，和珅的形象频频在戏曲舞台上和电视剧中出现，引起广大观众的兴趣。由于这些是文艺作品，难免有“戏说”和艺术加工的成分。历史上的和珅究竟如何，本文拟以清代档案为据，揭示其“庐山真面目”。

## 八旗子弟中的出类拔萃者

和珅，字致斋，姓钮祜禄氏，生于乾隆十五年（公元 1750 年），满洲正红旗人，出身于一个中等武官之家。其五世祖尼雅哈纳巴图鲁在清军入关的争战中，以军功获三等轻车都尉世职。父亲常保除袭世职外，曾任福建副都统。

和珅童年时期曾在家中与弟和琳一起接受私塾先生的启蒙教育，十岁左右被选入咸安宫官学读书。和珅博闻强记，不仅满、汉文字水平有了很快提高，还学习了蒙古文和藏文，为日后通晓汉、满、蒙、藏四种语言打下了坚实基础。和珅的书法、诗词、绘画也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在众多的八旗子弟学生中，和珅是出类拔萃者。

和珅于乾隆三十四年（公元 1769 年）踏上仕途。承袭三等轻车都尉，这年他 20 岁。第二年和珅参加乡试，没有中举，23 岁时被授为三等侍卫，挑补粘竿处，即上虞备用处，负责皇帝出巡等仪仗事宜。不久，他被调到銮仪卫充当侍卫，有了接近皇帝的机会。乾隆四十年，和珅被擢为乾清门御前侍卫，兼副都统。

## 一年六次擢升飞黄腾达

乾隆四十一年正月，和珅 27 岁，任户部右侍郎，协助尚书管理全国疆土、田亩、户口、财谷之政令；当年三月，擢军机大臣，开始步入中枢政务；四月，兼内务府总管；八月，调任镶黄旗副都统；十一月，充国史馆副总裁，赏戴一品朝冠；十二月，管内务府三旗官兵事务，赐紫禁城骑马，全家旗籍从正红旗抬入正黄旗。和珅如此被破格重用和快速提升，在清朝官吏中是极为罕见的。

和珅从乾隆四十年至嘉庆四年的 24 年中，担任军机大臣 23 年；以军机大臣兼步军统领 22 年；以军机大臣、步军统领兼户部尚书 15 年。在宫廷事务方面，他掌管内务府、圆明园、茶膳房、造办处、上驷院、太医院及御药房等事务。在经济上他除了任户部尚书外，还将崇文门税务监督大权牢牢控制在手。在军事上，他虽一窍不通，但常出任领军委以钦差，镇压农民起义。和珅长期担任京师步军统领等职，并控制着健锐营和火器营。文化上他曾担任《四库全书》正总裁及《钦定热河志》、《钦定大清一统志》、清《三通》、《清字经馆》、《石经》、《日下旧闻考》等书的正总裁、总裁。他还担任经筵讲官、教习庶吉士、殿试读卷官、日讲起居注官、翰林院掌院学士等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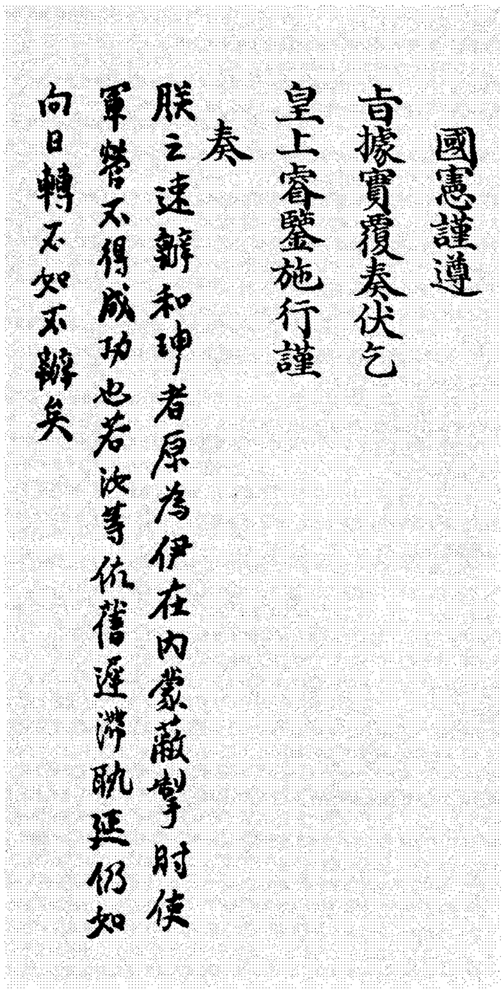
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和珅逐渐掌握了清廷的宫廷事务、行政、财政、军事、外交、文

化、教育等大权，成为乾隆的左膀右臂。

## 何以深受乾隆宠幸

和珅何以受乾隆如此宠幸？

从入宫侍奉乾隆开始，和珅便给皇上一个很好的印象。野史说，和珅长相酷似被乾隆赐死的一个妃子，且不论其真实与否，和珅长得五官端正，文弱可爱，说起话来声音洪亮却是事实，绝不像小说、戏剧中描绘得那样丑恶，令人讨厌。和珅首次侍奉乾隆，其“奏答甚合上意，奏对皆称旨”；乾隆问及其功名出身、乡试试题时，他边走边背，对答如流，“娇捷寻常”，深得乾隆赞许，“其知遇实于此”。在以后的日子里，和珅善于揣测主子心事，办事干练，自此“恩礼日隆”。


國憲謹遵
旨據實覆奏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謹
奏
朕云速辦和珅者原為伊在內蒙蔽掣肘使
軍營不得成功也若汝等依舊遲滯耽延仍如
向日轉不如不辦矣

嘉庆四年二月初五皇帝对处死和珅的解释

在封建专制体制下，大臣的进退，唯皇帝的个人意志是举。“忠君”为封建帝王用人的第一标准，和珅的言行举止正符合这条标准。据《朝鲜李朝实录》记载，和珅对乾隆“言不称臣，必曰奴才，随旨随令，殆同皂隶”。即使是后来位居大学士后，和珅仍像当年做御前侍卫那样恭谨用命，“皇帝若有咳唾之时，和珅以溺器进之”，与那些正人君子的大臣相比，古稀之年的皇帝自然更喜欢和珅这样殷勤周到的奴才，自觉不自觉地将其视如知己。

晚年的乾隆，眼睛里只有自己文治武功的业绩，蒸蒸日上的盛世；耳朵里只喜欢听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声音。和珅正是抓住了乾隆暮年“喜谀而恶直”的心理，投其所好，以博得皇帝的欢心。为此，和珅尽其所能，大事可以化小，“唯将吉祥之语入告”，甚至像镇压白莲教起义这样的大事，和珅明知是乾隆的一块心病，但从未将实情相告，而以“蒇功在即”蒙蔽皇帝。

分析和珅受乾隆宠幸的原因，除此之外，也必须看到和珅确有出众的才华，而且实实在在为大清朝廷干过几桩漂亮的事。这不能不使和珅在乾隆心目中的重量日增。

## 处理少数民族事务的得力助手

通晓汉、满、蒙、藏四种语言的和珅，具有处理民族事务的独特优势。据《八旗通志》记载：“去岁用兵之际，所有指示机宜，每兼用清、汉文。此分颁给达赖喇嘛及传谕廓尔喀敕书，并兼用蒙古、西番字。臣工中通晓西番字者，殊难其人，惟和珅承旨书谕，俱能办理秩如。”

和珅从乾隆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起兼任理藩院尚书，时时陪伴乾隆身边。乾隆每年到热河避暑山庄，常常接见各少数民族的王公贵族及其他上层集团人物，和珅每每在场。他多次帮助乾隆处理西藏、新疆以及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事务。

乾隆四十五年六月，六世班禅觐见乾隆，和珅参与接待。乾隆命在热河建庙，以备六世

班禅来时居住。和珅参与筹办，负责将“热河各庙及新建须弥福寿庙仪仗换新”。是年七月，六世班禅到达承德，乾隆在避暑山庄澹泊敬诚殿接见他。尔后几日乾隆与班禅会晤讲经、赐印颁敕、筵宴赏赐等，和珅均陪同参与。

九月初，班禅到达京师，乾隆准备为班禅贺寿。孰料十月二十八日班禅病倒，十一月初二日，六世班禅圆寂。乾隆前往凭吊，并亲自处理善后，和珅成了他的得力助手。

## 英人称之为“成熟的政治家”

乾隆四十五年以后，和珅多次负责接待朝鲜、英国、安南（今越南）、暹罗（今泰国）、缅甸、琉球（今日本冲绳）和南掌（今老挝）等国的使臣，负责全权处理与朝鲜及英国的外交事务。乾隆五十七年（公元 1792 年），英国派遣有丰富外交经验的英国驻孟加拉国总督马戛尔尼勋爵担任使团正使来华，目的是完成英国国王和政府的使命，在中国“取得以往各国未能用计谋或武力获致的商务利益和外交权利”，“设法增加我们对中国的输出，以及经常运送其它为中国人所喜爱的大不列颠及我们印度领地的产品和制造品”。马戛尔尼配备了精于军事和精通科学与技术的人员共七百余人及大批礼品而来。清朝官员开始并不了解其真正意图，还以为是恭祝乾隆皇帝万寿的“贡使”。乾隆谕令“至接待远人之道，贵于丰俭适中，不卑不亢”。

马戛尔尼使团于乾隆五十八年六月十八日到达北京。由于此时乾隆正在热河行宫避暑，特令使团赴热河谒见。双方首先在觐见皇帝的礼节上发生分歧。清朝坚持贡使觐见皇帝必须行“三跪九叩”的礼仪，英使坚持以谒见英王陛下的单腿下跪礼代之。双方都不肯让步，谈判几乎破裂。和珅与英国特使进行了艰苦的谈判和交涉，最后使英使同意按清廷礼仪行礼。事后英国特使评论和珅说，和珅在谈判中“保持了他尊严的身份……态度和蔼可亲，对问题的认识尖锐深刻，不愧是一位成熟的政治家”。

八月十三日，乾隆 83 岁生日的那天，在热河避暑山庄澹泊敬诚殿举行庆寿典礼，英使马戛尔尼由和珅等带领，“由避暑山庄宫门右边门进呈殿前阶下，向上跪捧恭递表文”（乔治三世女王国书），乾隆接受了表文，并向英国国王和使团正副使臣回赠了礼物。宴后，和珅陪同使臣游览了避暑山庄。

当英国国王向乾隆祝寿的表文译出后，和珅立即向乾隆报告英王有“遣使留住京师”之意。乾隆摆出种种理由，认为“其事断不可行”。其实在此之前，马戛尔尼曾与和珅进行“暂短的会晤”。但马戛尔尼发现和珅“虽然和蔼可亲，谦虚有礼”，却不肯答应他的要求，使马戛尔尼毫无办法。马戛尔尼千方百计想把谈话引入正题，但始终不能如愿。马戛尔尼后来回忆道：“我对中堂（和珅）的机智不能不深表钦佩。那天，我绞尽脑汁要求他讨论正题。他却总是竭力回避，每当有可能与我谈及正题时，他立即巧妙地躲闪过去，设法把我的注意力引向周围的景物，请我欣赏湖光山色，向我们讲解秀丽的山庄和亭台楼阁。”

八月二十六日，英使团回到北京后，马戛尔尼以英王的名义，通过和珅正式向大清皇帝表明了来华的真实目的：要求在舟山或宁波经商；在北京设立货栈；在舟山附近拥有一个小岛或空地保存商品；英商人长居广州；对英国商船和商品免税；允许英国人自由地在中国传教。这时的和珅以“惯常的机敏”，回避就英方提出的要求进行讨论，并向马戛尔尼解释皇上让他“立即启程”，是出于对他“健康的关心”。第二天，马戛尔尼再次会见和珅，和珅“惯常的客气踪影全无”，“他摆出一副毫不掩饰的持重和冷漠的神态”。马戛尔尼再次提出前述要求时，和珅以不给对方留下任何指望的口气，让他写成文书呈来。

八月三十日，乾隆连降敕谕，对马戛尔尼的要求逐条批驳，并发出廷寄上谕一道，认为英国人“递呈禀有越分妄请施恩之事”，马戛尔尼的行为是“无知”之举。这就是清政府在这次外交活动中的认识和收获。九月初三日，马戛尔尼向和珅辞行。据英人自己记述，马戛

尔尼使团此行受到了清政府“最礼貌的迎接，最殷勤的款待，最警惕的监视，最文明的驱逐”。英国政府的美梦破灭了。和珅杰出的外交才能在接待英使的过程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既维护了国家的尊严，又不失一位大国权臣的风度。

## 握有财权借机敛财自肥

和珅于乾隆四十五年任户部尚书，后又任内务府大臣和崇文门税务监督，实际操持着清政府的收支大权。

**和珅聚敛财富的主要渠道与手段：**

（一）独揽崇文门税关控制大权，从中渔利。明朝北京原为九门征税，清朝改为由崇文门统一征税。乾隆时期，为加强对这一税关的管理，特设正副监督各一人。这样的重任，乾隆自然要委以亲信。崇文门税关是户部所属全国三十个榷关之一，其索要苛刻位居全国第四。崇文门税关名义上隶属于户部，实际上由内务府控制，是皇家内府的进财机构。

崇文门税关还负责监督对京外获罪官员解京物品及京中不动产的变卖。清代王公大臣和各级官员犯罪，其家产多被查抄入官。抄家作为对官吏犯罪的一种附加刑，被广泛采用，目的是剥夺财产以抵赃或抵赔过失，所谓“不令其子孙坐享富厚之资”。查抄家产还作为收集罪证的手段，用以扩大株连。交崇文门税关变卖的最大宗是获罪官员在京置买的房屋、所开设的商号、银号、当铺等。官员获罪，这些不动产均被查封，勘估后“交崇文门召商交价认领开设”，价银交内务府广储司。

贪财如命的和珅在崇文门税关正监督任上供职八年，大权在握，为所欲为，在处理税务、经手罚没款、变卖罪官不动产等过程中，索贿受贿、贪污自肥不计其数。

（二）在罚缴“议罪银”中中饱私囊。议罪银又称“自行议罪银”、“罚银”、“罚款”，是乾隆中叶逐渐形成的。重要官员（多为总督、巡抚）或因犯渎职、违例、徇庇、侵贪、奏事等“过误”，自议缴银；或有过失需要“开复处分”；或根本并无过失却被怪罪，认缴巨额银两，以“贿买平安”。为免革职、参处，督抚们缴纳的“议罪银”，少则万两，多则几十万两。议罪银一般解交内务府广储司。也有一些作为南巡差务的开支，很少一部分留河工、海塘和军需之用。

“议罪银”的议罚权柄由乾隆独掌，但多由和珅从中“据情代奏”。和珅在皇帝和大臣之间斡旋，并掌握“议罪银”收缴的具体事宜，其作用非同一般。

“议罪银”的收缴，使内务府的进项大增，入不敷出的内务府，在和珅的管理下“岁为充盈积，反充外府之用”。和珅在为朝廷理财、敛财的同时，巧取豪夺，也为自己攫取了大量的钱财。

和珅到底贪污了多少钱财，至今也没有在清廷档案中找到一份完整的记录。这里，只介绍和珅被诛后查抄其财产的一些数字：和珅在京宅第（今前海西街恭王府内），房二百五十余间；花园楼台二百余座；铜玉鼎四十五座；端砚、宋砚七百余方；大小自鸣钟三十八座、洋表一百余个；东珠六十余颗；大小红蓝宝石五千余块；金银碗碟八千五百余件；各种如意三千余柄；金银唾盂、面盆一千五百余个；金银元宝两千个（每个重一百两）；金珠翠宝首饰二万八千件……

此后，又陆续查抄了和珅京城及京畿、热河等地的财产。其中京内外各处取租房二千余间；花园房、闲散房、寓所房一千余间；地一千二百六十六余顷。所开当铺十二座，本利银二万六千余两。

总之，和珅敛财之多，可谓富可敌国。故他被诛后，民间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之说。

## 诛杀和珅并非只因肃贪

嘉庆四年（公元 1799 年）正月初三日，乾隆病逝，嘉庆亲政，次日和珅即被革职拿问。初七日，和珅被拿交刑部严讯，京中家产被抄。十一日，嘉庆发布上谕，历数和珅二十条大罪，谕众知之，并令各督抚议覆。

读嘉庆发布的上谕，对我们了解和珅其人很有帮助。

上谕说：

“……朕于乾隆六十年九月初三日蒙皇考（即乾隆——编者）册封皇太子，尚未宣布谕旨，而和珅于初二日即在朕前先递如意，漏泄机密，居然以拥戴为功。上年正月，皇考在圆明园召见和珅，伊竟骑马直进左门，过正大光明殿，至寿山口，无父无君，莫此为甚。又因腿疾，乘坐椅轿抬入大内，肩舆出入神武门，众目共睹，毫无忌惮，并将出宫女子取（娶）为次妻，罔顾廉耻。年来剿办川楚教匪，皇考盼望军书，刻萦宵旰，乃和珅于各路军营递到奏报任意延搁，有心欺蔽，以致军务日久未竣。前奉皇考敕旨，令伊管理吏部、刑部事务，嗣因军需销算，伊系熟手，是以又谕令兼理户部题奏事件，伊竟将部务一人把持。昨冬，皇考圣躬不豫，批折字画间有未真之处，和珅胆敢口称不如撕去，竟另行拟旨。腊月间，奎舒奏报循化、贵德二厅，贼番聚众千余，抢夺达赖喇嘛商人牛只，杀伤二命，在青海肆行抢掠一案。和珅竟将原奏驳回，隐匿不办。及皇考升遐（即病逝——编者）后，朕谕令蒙古王公未出痘者不必来京，和珅不遵谕旨，令已未出痘者俱不必来京。不顾国家抚绥外藩之意，其居心实不可问。大学士苏凌阿两耳重听，衰惫难堪，因系伊弟和琳姻亲，竟欺隐不奏。侍郎吴省兰、李潢，太仆寺卿李光云，皆曾在伊家教读，并保列卿贰，兼任学政。又军机处记名人员任意撤去。种种专擅不可枚举。昨将和珅家产查抄，所盖楠木房屋僭侈踰制，其多宝阁及隔段式样皆仿照宁寿宫制度，其园寓点缀竟与圆明园蓬岛瑶台无异，不知是何居心。又所藏珠宝内，珍珠手串二百余串，较之大内多至数倍，并有大珠较御用冠顶尤大。又宝石顶并非伊应戴之物，伊所藏真宝石顶数十余个，而整块大宝石不计其数，且有内府所无者。至金银数目尚未抄毕已有数百余万之多，似此贪黩营私，实从来罕见罕闻。以上各款皆经王公大臣等共同鞫讯，和珅俱供认不讳。……”

嘉庆发布上谕两天后，和珅著“加恩赐令自尽”。和珅在狱中上吊自尽，时年五十岁。

## 为何大丧之日诛和珅

嘉庆在乾隆大丧期间诛杀和珅，并非仓促决定，而是等待了三年的“韬晦”。正如嘉庆所言：“和珅罪之大者，盖由事权过重”。和珅长期专擅，“弄权舞弊，僭妄多端”，嘉庆早在皇子时代便耳闻目睹。当时和珅出入宫时，伺高宗（即乾隆）喜怒，所言必听，虽诸皇子亦惮畏之。“内外官员畏其声势，不敢违拗。”三年训政期间，嘉庆对和珅的人品领教颇深，对乾隆朝中后期，国家财力耗竭，吏治衰败的政局深有所悟。要整饬内政，挽救大清江山，必须尽早诛和珅。

嘉庆急于诛杀和珅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乾隆末期发生于川楚陕一带的白莲教起义，“经历数年之久，糜饷至数千万而未蒇功”，嘉庆认为皆由和珅“在内蒙蔽掣肘，使军营不得成功也”。带兵大员掩饰虚捏，借此冒功升赏。而太上皇（指乾隆）则被和珅用“吉祥之语”入告，况且由于“圣寿日高，诸事多从宽厚”，已经没有精力顾及此事。嘉庆即位立诛和珅，为乾隆开脱，把镇压白莲教不力的责任都加在和珅头上，以此警告后任者，全力镇压白莲教，早日去掉嘉庆当政的一大心腹之患。

嘉庆在大丧之日立诛和珅，尽管他一再表白是“不得已之苦衷”，但其政治目的十分明显，就是通过诛杀和珅，杀一儆百，为“肃清庶政，整饬官方”，扼制“诸务废驰”的政治颓势寻找契机，恢复皇权的尊严。

嘉庆自知选择这样的时机杀一个重臣，必然会震撼朝野，所以嘉庆此时反复强调，“朕所为止一和珅耳，（和珅）今已伏法，诸事不究。”嘉庆的政治策略，就是为缓和当时日愈尖锐的阶级矛盾，并将统治集团的矛盾、失误完全归咎于和珅个人的“专擅”。

嘉庆的策略当时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但从根本上讲，诛杀一个和珅，是无法解决封建专制统治制度的一切弊端的。

（责任编辑　洛松　又新）

# 昆明—大理—丽江行

● 孙维熙

地处中国西南的云南省，是大自然的精心妙手和各族人民的勤劳智慧造就的神奇土地，其自然风光和民族风情都有独特的魅力。

新千年的第一春，我有幸随新华社组织的老同志旅游团沿昆明——大理——丽江线一游，真是赏心悦目，如临仙境。

**天下奇观——石林**

被称为“阿诗玛故乡”的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石林，位于昆明东南路南彝族自治县境内，距昆明 89 公里，占地面积达四十余万亩。常言说，“到了北京登墙头（长城），到了西安数人头（兵马俑），到了桂林观山头，到了昆明看石头。”这看石头就是去路南石林观光。昆明人也说，“不到石林等于没到昆明。”可见石林在昆明旅游中的地位了。

一进石林游览区映入眼帘的是一泓湖水，湖水清澈，水中屹立着座座石峰，著名的“出水观音”就立于水中。沿着碧草如茵的湖边漫步，令人乐而忘返。据记载，1956 年周恩来同志游石林之际颇为感慨地说，“有山要有水，有水就不枯燥了。”后来，人们根据周总理的建议，在原来的溪蚀凹地上修了这个湖，称为“石林湖”，它为石林平添了不少秀色。

据史料记载，明末清初，人们在今路南石林境内发现了这犹如莽莽丛林的大片危岩石柱，即今日之路南石林。石林是一种特殊的地貌形态。这种地貌称为喀斯特地貌——指地表可溶性岩石，如石灰岩，受水的溶解而发生溶蚀、沉淀、崩塌、陷落、堆积等现象而形成的特殊地貌。1966 年，中国第二次喀斯特学术会议建议将喀斯特地貌改为“岩溶地貌”。

石林分大小石林。“大石林”景区是通向石林迷宫的必由之路。迎面的大石壁上有两个鲜红的隶书大字“石林”。据介绍，原云南省主席龙云于 1931 年 3 月到路南县视察水利，题下“石林”二字，由随行的特邀顾问宿儒周钟岳代书：“石林龙云题”。1967 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康生到石林游览，毫无道理地提出将“石林龙云题”全部铲去，由于当时的历史原因只好把“石林龙云题”铲去。现在人们所看到的“龙云题”三个字是龙云的儿子龙绳文于 1985 年 9 月 22 日到石林访问亲笔书写的。

在石林中漫步，确实犹如在一所天然雕塑博物馆中欣赏大自然形成的精品：仰看双鸟渡食；忽而洞顶漏光；刚览犀牛望月、过一线天，又见凤凰迎风梳翅、唐僧打坐、悟空石、刘备迎客等等，真可谓千姿百态。

漫步到“玉鸟池”畔，迎面一座独立的石峰，宛若一位身材苗条的撒尼少女，当地人们亲切地说，它是“阿诗玛”的化身。远远望去确实像一位头戴撒尼头布，背上的四方篮依稀可辨的亭亭玉立的少女。

走马观花的石林游就要结束了。想到前人在石壁上题刻有“拔地擎天”、“天造奇观”、“群峰涌翠”、“云石争辉”等，那是一点也不假。

要知石林的美和情，必须身置石林中，领略石林的奇妙……你会觉得石林的每一块石头都有生命，它们以不同的姿态向游者表达它们亿万年来所经受的苦难和欢乐。游览过程中，我被这天然的奇观感动了，情不自禁地流泪了，我发自内心地祈求上苍保护这亿万年来为人类留下的天下奇观，也希望游者能爱护这“万刃刀剑指向天”的莽莽石林。

**登西山龙门**

西山林壑优美，四时风光滴翠。明代著名文人杨慎赞美它："苍崖万丈，绿水千寻，月印澄波，云横绝顶，滇中一佳境也。"

西山"龙门"是由"三清阁"和"龙门石窟"两部分组成。"三清阁"是一组九层十一阁的建筑群。它由三清境、灵官殿、真武殿等部分组成。"龙门石窟"则包括了揽海处、慈云洞、运华洞、达天阁等，是云南省最大、最精美的道教石窟。整个石窟开凿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到咸丰三年（1853年）才完成，历时七十二个春秋。

从"三清阁"曲折而上，经过千仞峭壁上凿成的石廊，到达达天阁，这便是西山风景区中最优美的龙门。

"龙门"坊就石雕成龙头，圆柱状如木柱衔梁，涂金敷彩，金碧生辉。达天阁顶棚，雕有仙桃一株，碧叶红果，累累下垂。令人惊叹的是，石洞内的神龛、香炉、花瓶、神像、云纹、白鹤、碑刻等都是天然岩石镂空精雕而成。细细观察，惟有魁星手中的笔是另外放上去的。相传，一位匠人整整雕凿了十年，最后凿到魁星手中高举的朱笔时，不慎凿断。他痛苦万分，一气之下纵身从龙门跳下滇池，以生命殉了自己的事业。

"龙门"处在一道天然绝壁上，鬼斧神工，如刀削斧劈。从山脚到龙门垂直高度三百多米，登龙门要攀登一千三百三十三级石阶，经历一番艰辛才能达到，让人们体会到"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的真谛。然而对我们老年人来说，大可不必去试探攀登的艰难，乘缆车而上，沿龙门石壁小道而下较为稳妥。一旦登上"龙门"，眼前豁然开朗，整个昆明市、整个滇池一览无余，顿感天青气爽，胸襟开阔，仿佛站在了人生一个更高的起点。

**"海内第一长联"**

到了昆明，不登西山观"龙门石窟"是憾事，不造访"大观楼"观"海内第一长联"更是憾事。"海内第一长联"即昆明大观楼一百八十字长联，作者是乾隆年间昆明寒士孙髯。

据记载，孙髯自小博学多识，但他亲眼目睹了科举考试的黑暗，愤然不再参与考试，一生中从未任过一官半职。他虽属诗赋名家，却不局限于舞文弄墨，还时时关心百姓疾苦。他生活清贫，晚年不得不靠卖卜为生。他的一生可谓坚毅乐观，傲然不屈。孙髯喜种梅花，自号"万树梅花一布衣"。史料记载，他与社会各阶层有较广泛的接触，从而敏锐地感受到封建王朝危机四伏、大厦将倾的时代气息。这一百八十字的长联中熔铸了苍烟落照中的断碣残碑，以萧瑟零落、凄风冷雨的自然景物形象地预示了封建统治的必然没落。

对联全文：

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披襟岸帻，喜茫茫空阔无边！看东骧神骏，西翥灵仪，北走蜿蜒，南翔缟素。高人韵士，何妨选胜登临，趁蟹屿螺洲，梳裹就风鬟雾鬓。更苹天苇地，点缀些翠羽丹霞。莫孤负：四围香稻，万顷晴沙，九夏芙蓉，三春杨柳。

数千年往事，注到心头。把酒凌虚，叹滚滚英雄谁在？想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伟烈丰功，费尽移山心力，尽珠帘画栋，卷不及暮雨朝云。便断碣残碑，都付与苍烟落照。只赢得：几杵疏钟，半江渔火，两行秋雁，一枕清霜。

上联叙写了大观楼四面的景色，五百里浩瀚的滇池……下联满怀激情地叙写了历史的演变，朝代更换，如早晨的云，晚上的雨……连幕帘都来不及卷起，就很快消失了。功德碑变成了断石残碑，到头来，只不过赢得了几声稀疏的钟声，一枕清冷的寒霜。写得何等的深刻。

据导游小姐介绍，毛泽东1958年在成都读了这幅长联后，甚为赞赏，能背诵如流，并作了"从古未有，别创一格"的批语。郭沫若1961年游大观楼时赋诗赞之："果然一大观，山水唤凭栏，睡佛云中逸，滇池海样宽。长联犹在壁，巨笔信如椽，我亦披襟久，雄心溢两间。"

历史上大观楼曾两度遭到兵火和大水毁灭，最后，由清朝总督岑毓英于光绪九年（1883年）命住持性田和尚重修，保留至今。大观楼多姿秀逸的景色吸引了无数文人墨客和游者，但自从具有深厚文化内蕴的一百八十字长联悬于

大观楼之后，各地游人络绎不绝，大观楼更为名闻遐迩了。

**蜚声中外的蝴蝶泉**

赴蝴蝶泉，必先乘船游洱海。洱海古称昆明池、洱海、叶榆峰等，因其状似人耳，故名洱海。南北长 42 公里，东西宽 3——9 公里，湖岸线长 117 公里，面积达 250 多平方公里。平均水深 10.5 米，最深处 21.5 米，属高原淡水湖，居全国淡水湖第七。

我们在洱海行舟达三小时之久，然后乘车奔蝴蝶泉。蝴蝶泉坐落在苍山云弄峰下，距大理古城 24 公里，自从《五朵金花》放映之后，蝴蝶泉驰名中外。蝴蝶泉的面积约 50 平方米，水深四米。泉水从池底鹅卵石缝中涌出。泉边有合欢树一株，横卧泉面。此树开的花似蝶，因此人们称它为“蝴蝶树”。每当夏季来临，“蝴蝶树”开花，苍洱之间的蝴蝶成群结队来此聚汇。令人惊奇的是万千彩蝶交尾相衔，倒挂横于泉上的蝴蝶树上，形成无数蝶串垂至水面。一年之中最盛之期是在农历四月十五前后，所以农历四月十五日被定为“蝴蝶会”。这一天，当地和附近的群众，特别是男女青年，结伴来蝴蝶泉观蝶，跳舞对歌，年复一年，形成了蝶聚人汇的盛况。明代著名地理学家、旅行家徐霞客于崇祯十二年（1639 年）考察蝴蝶泉后，在他的《滇游日记》中记载了如下文字：“泉上大树，当四月初，即发花如蝴蝶，须翅栩然，与生蝶无异；又有真蝶千万、连须钩足，自树颠倒挂如下，及于泉面，缤纷络绎，五色焕然。游人俱从此月，群而观之，过五月乃已。”徐霞客的观察何等细微，今天读来仍觉十分传神和迷人。进入蝴蝶泉入口右侧立有徐霞客的石雕像，上述文字迄今在蝴蝶泉入口甬道的巨碑之上。

关于蝴蝶泉的由来，大理白族人中有多种传说，最为动人的属雯姑与霞郎化蝶的故事。相传，神摩山下这眼泉水原名“无底潭”。潭边住着父女俩，女儿名雯姑，为人善良。一天，雯姑正在泉边梳洗。突然，一只带箭受伤的小鹿跑到身边，呦呦哀鸣，似在求救。雯姑把它抱在怀里。这时一个英俊小伙子来到潭边，正是他射中小鹿。看到雯姑抚着小鹿的箭伤，深受感动，他急忙拔出小鹿身上箭，并敷上药。他告诉雯姑，他名叫霞郎，家住在神摩山上，靠砍柴打猎度日。他们俩人相爱了，常在“无底潭”边相会。当时大理有个被称为虞王的霸主听说雯姑漂亮，要纳雯姑为妾，雯姑不情愿，虞王就派人抢亲，并打死了雯姑的父亲。小鹿奔上神摩山，咬着霞郎的衣角拽下山。霞郎救出了雯姑，逃到“无底潭”边，后边有虞王所派的人追赶，走投无路之际，俩人一起跳进了深潭，小鹿也随之跳入潭中。雨后天晴，潭中飞出一对美丽的蝴蝶。从此之后，“无底潭”被人们称之为“蝴蝶泉”。

（作者孙维熙是新华社高级编辑）

（责任编辑　程　度）


## 欢迎邮购《炎黄春秋》精品书系及近年合订本

为满足广大读者要求，我刊编辑部组织力量，从1995 年以前 45 期的 650 万字中精心筛选出 150 万字的文章，分类编辑了一套五卷本《炎黄春秋》精品书系。各卷分别为：《历史谜案揭秘》、《政坛高层动态》、《重大决策幕后》、《名流写真》、《血荐轩辕》。

全套 116.10 元。另加书价的 10%的挂号邮寄费，欲购请直接汇款。

**《炎黄春秋》发行部地址：**

**北京东城区雍和宫大街戏楼胡同 1 号**

**电话：**（010）64072452　**邮编：**100007

1997 年合订本：
简装：49 元；精装：52 元
1996 年合订本：
简装：49 元；精装：52 元
1998 年合订本：
简装：51 元；精装：56 元
1999 年合订本：
简装：51 元；精装：56 元
2000 年合订本：
简装：51 元；精装：56 元
（免收邮费挂号邮寄）

# 庆祝《炎黄春秋》创刊十周年

◀ 郑克明 作

▲ 续志先 作

▼ 叶天津 作

# 炎黄春秋

YANHUANG CHUNQIU

刘少奇与何葆珍烈士

“剿共英雄”卫立煌的人生巨变

教育家张宗麟的坎坷一生

漫说等级制宗法制和家长制

从清朝档案中看和珅

1936年的四川大饥荒

国内统一刊号:CN11－2581/K　邮发代号:82－507　定价:4.80元

ISSN 1003-1170

06>